



报人生活杂忆

——石西民新闻文集

重 庆 出 版 社

1991年·重庆



责任编辑 邹光海
封面设计 王高武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姚北桦 王淮冰编

报人生活杂忆——石西民新闻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插页8 字数183千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

ISBN 7-5366-1524-8/G·524

定价：3.40元



報人生活雜憶

一九九〇年

陸定一題



1930年，石西民在上海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沪东区特约通讯员，时年21岁。



1935年，在上海参加“一二·九”运动游行。右1为石西民。



京華咫尺久相疎喜
得南鍼兩冊書知止
求真須自勵
豈魚不羨淡佳居

中宣部八二年七月贈公中外古今年輕有为
政治人物选輯二、外圍一些政治要人退休后的社会
活动二兩書讀后有感

漢書云東漢房江太守羊續拒

不屬送魚乃符魚高懸屋樑直至晒中發臭送禮三電頓息余意如作長安布衣則仇琳自在即元此勞矣

一九八六年春石西民書



序

张友渔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石西民同志记述他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斗争实践，和他晚年对开展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对建设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思考和探索。

石西民同志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有在各种环境下从事新闻工作的斗争实践。1930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被派担任秘密出版的党报《红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可说是和新闻工作开始结缘。1936年，他被聘担任具有爱国民主倾向的《申报周刊》编辑，正式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了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从1937年冬《新华日报》在武汉筹备出版，石西民同志就参加了党报工作，以后又担任编辑主任、采访主任等领导职务。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直到1946年11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被迫撤回延安的9年中，西民同志一直在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为党的新闻事业坚持战斗。石西民同志不仅有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也有在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1938年6月，他作为《新华日报》战地记者到前线和敌后采访，在到达新四军总部后，就被委派参加《抗敌报》的筹建工作，并在新四军总部的教导



队创办了新闻训练班，为新四军建设新闻工作队伍作出了贡献。1946年冬，他被迫从南京撤返回延安后，又参加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领导工作，继续在新闻战线上作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1949年4月南京解放，西民同志被任为南京《新华日报》社长、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从而又取得了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建设人民新闻事业的宝贵经验。正因为西民同志有在各种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从事新闻工作的斗争实践，通过研究、比较，使他能够全面、清醒和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工作中的成就和失误，给今天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以启迪。在《报人生活杂忆》一文中，回顾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时，他在充分肯定党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伟大作用的同时，虚心、坦诚地检查当年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指出：“那时王明顶着共产国际吓人的头衔，又是长江局的领导人，他在武汉颐指气使，推行一套右倾投降的政策。”由于王明的干扰和影响，因而使“《新华日报》在武汉时期确实宣传了一些右倾错误观点，影响很坏，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教训。”在承认这种干扰的同时，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王明的干扰毕竟就是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报馆同志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和斗争。综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宣传报道的主要方面是好的。我们不能因为有王明的干扰就简单地否认了这一时期报纸的全部工作。”联系王明对党报宣传的干扰，西民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坦白襟怀，记述了党报一次宣传失误的教训：“抗战初期，王明、康生从苏联一回来，就通过作报告、写文章，声色俱厉地指斥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破坏抗战的汉奸。”《新华日报》宣称陈独秀是“汉奸”后，引起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疑惑与不安。石西民同



志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陈独秀在近代革命的历史功过后，严正地指出，王明、康生的指斥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诬蔑不实之词。“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是一个降敌叛国的汉奸。”由此，“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报纸一定不能在充分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政治结论；如果我们的意见不符合事实，一定要允许讨论。否则，我们的报纸就担当不起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这一光荣的称号。”

石西民同志根据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对我国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对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他希望报刊史料的搜集，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认真注意“我们历史上有许多为推动国家改革而作出重大贡献的报刊和著名的报人，他们的光辉业绩和经验教训，很值得今天新闻界同人学习和效法。他们所写文章对当时人民思想影响的强烈，对推动社会历史所具有的理论威力，就值得在改革声中的今天报刊同人深思。”新闻史的研究，“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的工作中，要更加重视真实性原则。资料要求立准、立确，因为这是研究的基础。”“客观材料，特别是事实要立准确，绝不能无中生有，小大由之。”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上，他热情呼吁加强抗战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他指出：“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是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祖国纵深地区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破天荒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士兵、工人、农民发生血肉联系的时代。……也是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和新闻研究空前发展的年代。”延安《解放日报》整风改版后，“提出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为中心内容的办报思想，和重庆《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同



志所总结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报纸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等办报思想，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丰富了我国新闻学的宝库。”

对于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站在时代前列、推动时代前进的报刊和新闻人物，西民同志都充分肯定他们在发展我国新闻事业上的贡献。他高度评价史量才先生的爱国热情、民主追求和《申报》对中国文化学术的重大贡献。对为中国进步文化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俞颂华先生，表示了深切的追怀和敬意。在祝贺《文汇报》创刊50周年时，他认为《文汇报》能对人民事业作出贡献，是因为“经常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紧紧地依靠读者，尊重读者，因而赢得了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文汇报》的工作效率、革新精神、艰苦奋斗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仿效称道的地方。”

我和西民同志相识将近半个世纪，在党的新闻战线上曾经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抗日战争期间，当我参加《新华日报》工作时，他是报社的采访部主任，在重庆新闻界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记者。工作中他无畏艰难险阻，勇挑重担。抗战爆发后，他两度担任战地记者，深入前线和敌后，以他敏锐的观察、犀利的笔触，报道前线和敌后将士浴血奋斗的英雄事迹，激励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受到新闻界同行的称赞。西民同志勤奋好学、知识面广，在党报、党刊上，他经常撰写日本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上恪尽一个新闻战士的职责。西民同志为人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不矫饰，不矜持，党报的年轻同志都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兄长。在采访工作中，他认真贯彻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重庆各报的进步记者为核心，团结一切爱国和有民主要求的新闻同业，在新闻界逐步建立起宣传报道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1945年重庆的胡世合事件、1946年较场口事件中，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目标下，重庆新闻界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斗争的规模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法西斯气焰。40年后，他追怀往事，仍然满怀激情地说：“为了推进抗战的胜利而广泛开展民主运动时，进步新闻战士之间的肝胆相照、团结战斗，在抗战以前的中国新闻界很难有这样的规模和深度。这种在民族解放民主建国的共同目标下的大团结，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破天荒的事。”

1953年后，西民同志被调离新闻工作岗位，改做宣传、文化方面的工作，但仍然以极大热情关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十年浩劫期间，他被非法囚禁7年多，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成立，我和西民同志被战友们推选为会长和副会长。此后，西民同志为撰写党报、党刊史倾注了很大的心力，使《新华日报史》和一批有关的史料得以陆续出版。

西民同志勤勤恳恳为党工作50余年，他诚恳正直、才识卓越，在建设人民的新闻事业上作出过可贵的贡献。《报人生活杂忆》既是风云变幻时代的雪泥鸿爪，也是一个革命的新闻战士为崇高理想而不惜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的记录。我想，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史学工作者从本书作者对新闻史的研究、对建设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思考和探索中，是能够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教益的。

西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展读遗篇，40多年前



艰危与共的战斗岁月有如昨日。写此短文，也是抒发我对老战友的怀念。

1989年4月



目 录

- 序.....张友迪
- 报人生活杂忆..... (1)
- 峥嵘岁月
- 《新华日报》生活的回忆 (76)
- 一部国共二次合作时期的百科全书
- 纪念《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创刊45周年 (91)
- 党报史上的光辉一页..... (96)
- 毛泽东同志与《新华日报》 (112)
- 周恩来同志与《新华日报》 (118)
- 《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序..... (124)
- 关于《新华日报》放在南京出版的决定问题 (129)
- 关于新闻写作问题
- 在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全军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 (131)
- 增强党性 深入群众
- 学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138)
- 缅怀邵飘萍 学习邵飘萍
- 在邵飘萍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43)
- 纪念《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 (145)



| | |
|--------------------------|-------|
| 党的好朋友——俞颂华先生 | (147) |
| 潘梓年同志与《新华日报》 | (151) |
| 忆《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华岗同志 | (160) |
| 红色管家数此人 | |
| ——怀念熊瑾玎同志 | (167) |
| 学习恽逸群同志 | (175) |
| 忆刘述周同志 | (181) |
| 悼念人民的新闻战士浦熙修 | (185) |
| 悼念田伯萍同志 | (190) |
| | |
| 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 | (193) |
| 漫忆“国新社” | (197) |
| 祝《金华报》复刊 | (201) |
| 祝贺与希望 | |
| ——为《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而作 | (203) |
| 祝《世界经济导报》诞生五周年 | (205) |
| 祝《文汇报》五十寿 | (207) |
| | |
| 缅怀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日子 | (209) |
| 南罗两国之行 | (220) |
| 旧梦偶忆集 | (229) |
| | |
| 附 录 | |
| 石西民诗抄 | (232) |
| 石西民年表 | (240) |
| | |
| 后记 | (263) |



报人生活杂忆

我从事新闻工作有十多年的历史，直到新中国成立二三年后才离开了新闻岗位。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完全同新闻工作割断联系。在我一生中，与新闻工作可算是有缘的。

据说回忆只是老年人的爱好和习惯，可是往事如烟，能记得起来的也只是一鳞半爪，何况有些事也并不是随便可以写出来的。既然《新闻记者》慨然给我以篇幅，那么写点从事新闻工作过程中的小浪花，希望不至于太损害读者。

一

《红旗日报》与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同志的冤案终于平反了。我的心情与同志们一样感到激动。我脑子里常常浮起两个形象；其一是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召开通讯员会议上潘汉年同志的形象；另一个就是1955年他被捕前夕的一个晚上，在北京饭店与我聊天时的情景。

我是1928年初秋从浙东老家来到十里洋场上海求学的，当时仅16岁，初中刚毕业。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社会，寻找自己应走的道路。我贪婪地阅读创造社、太阳社出版的诗歌、小说，并开始养成了每天翻读大量报纸的习惯（这个习惯



至今没变)。从这时起我就梦想以后能做一名新闻记者。

1930年春,党组织调我任沪东区委宣传部干事并兼《红旗日报》沪东区特约通讯员,这是与新闻工作结缘的开端。那时正是立三路线时代,“左”倾盲动,我也干了不少幼稚的事。可是,我对《红旗日报》的同志(是哪些同志在办至今不了解)的勇敢献身精神,不能不油然而敬仰。《红旗日报》是对开一大张,在租界里出版。这样一大张共产党的日报,无论从编辑、印刷到发行,真是处处荆棘。租界当局镇压十分残酷。报纸数度遭受破坏,被迫停刊,人员被捕,而又数度重新恢复出版。对一个幼年的革命政党,路线错了,损失令人痛心,很多牺牲没有实效。可是一个革命者在四面都是敌人的环境下,能从容等待路线正确再出来革命吗?这样一想,同志们这种顽强战斗、百折不挠的精神,至今使我非常敬佩。

在那秘密工作的年代,我这个特约通讯员平时与报纸编辑部毫无联系,写了几篇沪东工人运动的通讯,有的也登出来了。但是是什么人送去的,报社在哪里等等,我都一概不知。

那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去公共租界五马路的一家旅馆,参加《红旗日报》各区通讯员会议。我按照事前约好的暗号来到会场,这是一家中等的中式旅馆,屋子里已坐了几个先来的陌生人,桌上堆着一副麻将牌。此时已快到上午9点,我看房间的主人像是刚起床,正在吃一碗肉丝面,穿着织锦的长袍、马褂,消瘦的身材。有人轻轻告诉我,他就是潘汉年,负责主持这次会议。

潘汉年是创造社成员,我早已从书报上知道他的名字,见面却还是第一次。而有趣的是这头一个印象却并不好。我



看房间里的情况，明明是搓麻将搓到深夜，迟睡迟起，加上他一副上海“小开”的打扮，这种“腐败”的现象，使我心里觉得非常不痛快，心想，这哪里有半点革命者的气味！以后我才懂得，这是我自己太年轻幼稚了，对当时复杂的斗争和应付环境而必需的伪装都不了解，因而对一个革命者产生了误解。这个幼稚病经过很久才明白过来。那天的会议，结果因为风声险恶，没有开完，潘汉年同志就通知大家赶紧走了。

俞颂华先生与《申报周刊》

我真正从事新闻工作，始于1936年1月，在上海《申报》担任《申报周刊》编辑的时候。

《申报》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资办的一家著名报纸，社会影响颇大。《申报周刊》是《申报》的一个附属刊物，由俞颂华先生主编，开始是月刊，1936年初改为周刊出版，每期随报附送，不另收费，所以发行量是很大的。

我进《申报》，完全是偶然的。1934年到1935年，我因察北抗日同盟军失败而回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不知怎么，有一篇稿子投到《申报月刊》竟为俞颂华先生所赏识。他那时正在物色编辑人员，就把我约去报社谈话，当场找了一篇文章叫我翻译。来往了两次，居然很快决定要我去任编辑。

就在我去《申报》工作的前夕，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下影响到了上海。大概在12月25日，上海各界也举行了盛大的反日爱国游行，我也参加了。队伍在南京路上受阻，这时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把队伍带到宝山路东方书店广场（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开了大会，接着继续游行。在经过北四川路时，遭到事先布置的租界大



批逮捕及乘三轮卡车的气势汹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殴打、冲击，不少人受伤，队伍无法通过，只好被迫折回宝山路，高呼口号而散。恰好《申报》也有记者参加了这天的活动，并拍摄了照片。

1936年1月，我去《申报周刊》就任这天，新的一期刚刚出版，我看见在封里的时事照片页上，赫然刊登着我的一张照片。我站在两个受伤的青年中间，正在振臂高呼抗日口号。我心里想：这下，我的饭碗要“砸”了。过了三四天后的一个下午，俞颂华先生在编辑部其他同人下班后，把我约到他办公桌前，指着那本周刊上的这张照片说：石先生，这是不是你？我回答说“是”。他说：想不到你竟这样激烈！我要早知道，真不敢请你来工作了。他还说了《申报》、《申报周刊》影响很大，在这里工作，特别要谨慎等等话。我以为要被辞退了，结果并没有。自这次谈话后，俞先生一直没再提这件事，对我的工作却是信任有加。

俞颂华先生今年是90整寿。我至今还是非常怀念他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无党无派的典型知识分子。他平时谈话不多，遇事稳重，操守甚严。1919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汹涌澎湃的思想、政治巨变。他长期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也曾在大学任过教。从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开始，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在主编《申报月刊》与《周刊》时期，就我所知，他发表了不少介绍苏联建设和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章。尽管他不是那种激昂慷慨的人，但他有自己的见地。在《申报周刊》期间，他与文化界许多著名进步人士，包括邹韬奋在内，都很熟悉，有交往。我和他共事的近二年时



间里，他不仅热情地支持宣传绥远抗战，关心爱国运动，也支持编辑部写同情农民痛苦遭遇的文章和短评。他自己还在1937年春奔往陕北访问，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当时《申报月刊》和周刊有一个经常撰稿的托派分子郑学稼，以日本问题权威自居，作风恶劣，写的文章浅薄无聊。我们向俞先生说明了这些情况后，俞先生从善如流，终于把这个托派分子的文章排除出刊物之外。

抗战发生以后，俞先生的生活十分坎坷。我在重庆看到他时，他正在黄任老（炎培）处主编《国讯》。生活艰苦，身体已病弱不堪。这位默默为中国进步文化工作作过贡献的老先生逝世于1947年。黄任老曾称许他是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我和俞先生的短暂相处，使我得益很多，不仅帮助我学到了编辑业务方面的知识，更有意义的是，从他的为人使我认识了在性格、行事上有别于邹韬奋、章乃器等人的另一类正直知识分子，感到尊重和了解这种朋友，团结他们共同奋斗的重要。同俞先生相处的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生活，特别是对我解放后在与知识分子相处时应该如何待人接物方面得到很多教益。

第一次当战地记者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呼声，激荡全国。申报馆要派记者往华北战地，苦于一时找不出适当的人。俞颂华先生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很快与另一位摄影记者从上海乘火车北上了。在陇海铁路的火车上，我读到了郭沫若同志排除万难归国的新闻，心情很不平静，特别是



读到他那首步鲁迅原韵的《归国杂吟》“又当投军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时，我止不住热泪潸潸而下。

我们途经郑州、石家庄都小作逗留，拜访了一些人，最后来到保定，这是华北的军事重镇。当时的还有其它报纸的记者，孙连仲就在保定的曹锟花园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胡吹了一通空话，说已构筑了一条从沧州到保定、由保定到德州的“之”字型防线，来阻止日寇的进犯等。瘦高个子的国民党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也在会上讲了一番芦沟桥及宛平县里与日寇发生冲突与交涉的经过。他们的讲话有个共同特点，都避而不谈前线的战情。记者们纷纷要求到前线去采访，孙连仲始终不同意。后几经交涉，总算答应让记者坐火车到琉璃河车站看看，说这里已是最前方，不能再前进了。我们在琉璃河耽了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一支部队，也没有人来向记者谈谈前线情况，一点战场的气氛都没有。在空洞洞的车站无聊地转了几转后，只好又回到保定。第一次作战地记者是失败的。当时一脑子想写一些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战地故事，结果完全成了泡影，没有写出一篇有价值的通讯或电讯稿。检查原因就是不明白当时局势的特点，只是后来知道，当时前线岑寂，原因是日寇忙于侵占平津，国民党当局还在幻想。如果当时弄清这个特点，我还是可以写出另一种新闻或通讯来的。

在保定逗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周小舟同志。那是在一家旅馆里，一天，来了一个瘦瘦的穿着长袍的年轻人，递上一张普通名片，我们就谈了起来。等到谈投机了，他又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参谋”的字样，



见此名片后，我格外高兴，因为我长期在白区工作，多少年来渴望与红军来的亲人会面，此刻感到非常亲切。这位曾受不公正对待已经逝世的同志，作为第一次不期而遇的一个红军代表的美好情景，至今还牢牢地留在我脑中。

在从保定回上海的途中，火车在南京下关车站停车时，形势突然显得紧张，一派临战情景，我看到了沈钧儒、黄炎培两位先生，他们是从上海赶来南京商谈抗日大事的，由于他们心情沉重，行色匆匆，我只与他们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

火车遇到空袭，折转苏嘉路到达上海南站停车，正值8月13日上午9时，炮声震耳，“八·一三”战争爆发了。

上海战事爆发后，《申报》准备在武汉办一个分馆，请俞颂华先生任总编辑，俞先生约我参加武汉报纸的筹备工作。当年11月我到武汉这个抗日后方重镇，当时文化人云集于此，爱国活动活跃，开会、讲演忙个不停。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一个党报——《新华日报》，我奉组织之命离开《申报》前去参加筹备工作。俞先生也被《申报》辞退离开了武汉。我的新闻工作从此换了一个新的天地。

二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的隆隆炮声，宣告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在此以前，我党为实现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公开出版中共政治机关报的问



题，也提到了会议上。经过激烈的斗争，这个问题与其它几项关于中共合法地位和权利的重大问题，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承认。因此，《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后来并成为国共两党关系的晴雨表。

《新华日报》先是在南京筹备出版，不久即因战事紧张而迁往武汉。我参加《新华日报》的战斗行列，就是在武汉筹备的初期。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终于在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三镇正式创刊，从此开始了艰难、曲折而又闪耀着胜利光辉的战斗历程。《新华日报》在武汉共出版287期，到1938年10月24日出完最后一期报纸后，迁往重庆出版。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后来有些不同，当时第一版每天都用四号字刊登一篇社论，报头左侧经常刊登当日社论中的警句，右侧则是密切配合社论内容的战斗性很强的漫画。第二版为要闻版，以国内新闻为主，我在武汉时就担任这一版的编辑工作；第三版主要刊登国际新闻，由何云同志编辑；第四版为副刊，当时叫作《团结》，由楼适夷同志编辑；主管专栏文章的是吴敏（杨放之）同志。陆诒担任采访主任，许涤新负责《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新华日报》的社长自始至终是潘梓年同志，总经理为熊瑾珥同志，武汉时期报纸总编辑为华岗（华西园）、吴克坚同志，章汉夫同志担任编辑主任。

《新华日报》创刊之后，根据工作的需要，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在这两个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编辑部、经理室、营业部、印刷部。各部（室）下面又有采访课、编辑课、校对课、广告课、发行课、服务课，等等，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1938年4月报馆成立了党支部，8月又成立了职工会。当时，报馆工作的骨干力量，多数是经党



中央交涉而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同志，几乎都没有办报经验。我记得，报纸出版后头些天，我们在汉口大陆里一幢小楼上整天忙着写稿子、编稿子，常常是从傍晚一直忙到第二天天亮，稿件还没有弄好，拼版要搞到红日三竿，别家报纸都在街上叫卖了，我们还没有付印。由于没有计划，每版常常剩下一堆拴好的小样(新闻稿)，弃置不用。编辑累得够呛，工人意见很大。总之，遇到的困难不少。但是我们毕竟是共产党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办报规律，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效率提高了，出版时间提前了，发行量也上去了。后来，大家把各环节的要求，概括成“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后来又加上一条“销得多”，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成为各环节的工作准则。报纸创刊一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发来电报，突出肯定了这一口号。

《新华日报》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全面抗战的旗帜，它激昂地宣布：“我们坚信在伟大的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力量更广泛的动员，更严密的组织，更亲切的团结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是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战胜日寇，维护我们珍贵的民族生命的。”它坚定的表示：“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从后来的办报实践看，《新华日报》创刊伊始给自己确定的这些严峻而光荣的任务，是圆满地完成了。



一张为中国人民爱读的报纸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它出版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党中央指出：“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因此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今天新的条件之下，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正过去那种观念，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一）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此处指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笔者注）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党中央文件还指出：“各地方党部应当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新华日报”，“各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应尽可能定一份新华日报，并帮助推销和发行”，“帮助建立通讯工作”，“以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在1938年10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继续办好《新华日报》的问题，并把这一内容写进了全会的决议。潘梓年同志担任《新华日报》社长，是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批准任命的。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驻国统区的最高代表，长期领导了《新华日报》的工作。这许许多多的事实，都清楚表明了党中央对这张报纸的高度重视，那种把《新华日报》看成是地方性报纸的意见，显然是不确当的。至于十年内乱中把《新华日报》打成是



“汉奸报”，“投降报”，更是对历史的颠倒了。作为党中央的报纸，《新华日报》坚持了我党关于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武汉时期，《新华日报》在宣传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报纸创办不到4个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署名马克西莫夫的文章《中国人民喜爱的报纸》并配发了《新华日报》的版面照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间在汉口出版了。销数有5万多份，就是最有影响和最老的中国报纸，也没有几种能有这样大的销数。据路透社电讯的报告，现在就是中国最辽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这个报纸。自从《新华日报》出版的第一天起，它便广泛地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的旗帜。《新华日报》成了中国人民所爱读的报纸，进步的分子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敬重它，并很注意倾听它的呼声。《新华日报》正像中共其他出版物一样，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反日力量和发展及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中，起了伟大的作用。”

王明对报纸的干扰

回忆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不能回避王明对报纸宣传的干扰和影响。那时王明顶着共产国际的吓人头衔，又是长江局的领导人，他在武汉颐指气使，推行一套右倾投降的货色。由于政治水平不高，许多人一时还认不清王明这套货色的实质，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对王明的家长制作风实在是深恶痛绝。王明说是要按欧洲的经验办报，实际是要通过报纸突出他自己。他经常要求报纸刊登他的又臭又长的文



章，署名一会儿是王明(陈绍禹)，一会儿是陈绍禹(王明)，还要配发他的照片。对于这种做法，大家很是不满，暗暗地乃至公开地抵制。王明感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找碴子训人，一骂就是半天。社长潘梓年同志是位性情宽厚的人，也被王明折磨得忍无可忍，公开顶撞了王明，掀了他的逆鳞。王明的恶劣作风，引起了同志们的普遍厌憎，同时，被他训斥的同志也注意到，王明把报馆的同志叫去痛骂时，从来没有中共长江局其他负责人参加，这更可看出王明的独断专横。后来，王明要从组织上下手，以派戕地记者的名义，把华岗、章汉夫等同志挤出报馆，还企图把潘梓年调回延安。幸好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责令他离开长江局的领导位置，他的险恶用心才被制止。

由于王明的干扰，《新华日报》在武汉时期确实宣传了一些右倾错误观点，影响很坏，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教训。但是，王明的干扰毕竟就是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报馆的同志们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和斗争。综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宣传报道的主要方面是好的，我们不能因为有王明的干扰就简单的否认了这一时期报纸的全部工作。由这件事，我感到，党的领导者犯错误，党的机关报不受影响是很难的。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还有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那就是关于陈独秀是不是汉奸这个问题的宣传。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革命时期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过“托派”组织，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是一个降敌叛国的汉奸。可是，在抗战初期，王明、康生从苏联



一回来，就通过作报告、写文章，声色俱厉地指斥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破坏抗战的汉奸。当时，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新华日报》上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疑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作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后来，还是周恩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减轻了这起事件给党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事隔多年，我还常常想起这件事，并深深感到，我们的报纸一定不能在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政治结论；如果我们的意见不符合事实，一定要允许讨论。否则，我们的报纸就担当不起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这一光荣的称号了。

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出版。从那以后，报纸一直在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领导下工作。《新华日报》屹立在嘉陵江边，更加高亢有力地向着国统区人民发出真理的声音。

三

初到南昌

1938年6月，受到王明的有意排挤，我跟《新华日报》其他一些同志先后离开武汉报纸的编辑岗位，去前方当战地记者，我被派往江西，我这是第二次当战地记者了。当时正是抗战初期，民气昂扬，我盼望能够到前线去，真正成为“前



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虽然对王明的拙劣行径感到愤懑，但总的说，心情还是很兴奋的。我记得，报馆还给我办了一张“战地记者证”，那上面赫然盖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大印。

我出发时，徐州已经失陷，日寇铁蹄踏进了中州原野，进逼武汉。武汉外围的战线，长江以南还在马当、彭泽那一边，离九江尚有一段距离。我先到南昌，住在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办事处）里面，认悉了当时主持分局工作的曾山、黄道等同志。他们都是老红军。在分局机关还认悉了一些新人，如朱镜我、薛尚实同志，这些都是久在白区工作的老同志。朱镜我主持着分局的宣传工作，这是一位非常诚恳朴实的文化人，我早在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就知道他的名字了，他是创造社的一个小伙计。我们一见如故，非常谈得来。

黄道同志告诉我说，5天前我们发起召开了一次大型座谈会，国民党的元老李烈钧也参加了，大家对开放民众运动，发动全民抗战，保卫武汉，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了。可惜你不在，不然把这情景向外报道一下多好。当时的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有一幢房子，有几十个工作人员，现在能回想得起来的，只有那时还很年轻又英气勃勃的担任党的青年工作的陈丕显、黄知真等同志。

当时的南昌，还没有明显的临战气象，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是一个老官僚，浮沉宦海，对做官相当有经验，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战既是外行也不热心。那时各方记者



云集，范长江、孟秋江等同志都在南昌，还有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的记者，大家相处得也还可以。中央社的记者叫韩待珩，这个被鲁迅骂过的人物是一个浪荡子。一般来往，也无太多顾虑。有一次，熊式辉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去参加了。当时战云密集，正是武汉会战前夕，我问他有什么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打算和办法？他顾左右而言他，大讲起他提出的四句口号，叫做“不准敌人走江西的路，不准敌人住江西的屋，不准敌人吃江西的米，不准敌人喝江西的水”。说起来堂而皇之，实际就是扒公路，烧民房，运粮食，堵水井，结果把老百姓搞得流离失所，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动员民众”？特别是扒公路这一条，不但没有阻滞敌人的进犯，反而给自己的军队调动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拆了一个大烂污。熊式辉还强调说：“民众动员不能由民众自动的去做，而要有政府统一办理”。这些高论，实在听了好笑，我就用客观报道的方法写了一篇通讯《江西省的动员民众办法》，登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他的那套官腔。

尽管如此，地下火还是在运行，南昌既有了共产党的公开领导机关存在，还有江西名人回到了南昌，如许德珩、王造时等，文化界如夏征农、孙席珍等也在开展一些抗日文化工作，妇女界如雷洁琼等加上一批北平的流亡大学生，各种抗敌宣传文化活动还是进行得很热闹。记得当时夏征农、孙席珍等同志的住处，就成为我们这些“无冕之王”的落脚点，长江、秋江等都经常在那里高谈阔论。

蒋经国先生那时也在南昌，有几个进步的熟朋友在他手下做事，如现在仍在上海的笪移今同志等。蒋经国先生同记者特别是同长江、秋江和我见过多次面，还约到南昌东湖边



上一个什么招待处作过长谈。这位蒋先生那时大概政治上还在观测动向，他的势力也还没有培养起来，羽毛未丰，所以肯与各方面人往来，同流亡大学生也经常有来往，态度比较随和，没有“公子”架子。但在政治上除抗战之外，对其它问题很少表示态度，讲话也常常不着边际，令人感到莫测高深，使人一眼就看出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那次谈话是被敌机的几个炸弹给炸停了。

我从南昌随记者群到了九江，那时九江的最高指挥官是张发奎，前线尚无什么大战事，九江更是像一潭死水。我们几个记者闲闷无事，就相约上庐山看看。那是“七七”周年纪念的前夕，从九江出发，说是有公共汽车，又说有人力车，我们一路走一路问，直到庐山脚下，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问原因说是公共汽车都被拉去运兵了，人力车因为抓壮丁，纷纷躲藏起来。庐山脚下的莲花洞原来说有滑杆可供上山，一到又是踪影全无，都被拉壮丁拉得不敢出来做生意了。国民党的拉壮丁实在是使老百姓天怒人怨。我记得后来在赣北前线采访，一天晚上正行进在公路上，汽车灯一亮，就看到一长队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壮丁，胳膊上缚着绳索串在一起，被荷枪的兵士押上前线。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我真是说不出的难受。“七七”周年纪念日是在庐山牯岭过的，我们胡乱转了一阵，看到一些为阔人准备的房屋都闲着没人住，处处显出战时景象。“七七”早晨就有三架敌机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觉得该回南昌去看看究竟。

赣北战场

大概从当年7月底8月初起，赣北战场在日寇不断进攻



下日趋紧张。首先是九江陷落了，这是敌寇大举进攻的信号。作为战地记者，我的采访活动也更加繁忙起来。这期间，我在赣北一带见过不少国民党将领，如薛岳、吴奇伟、李汉魂、王耀武、冷欣等人，我去向国民党高级将领采访，从来不是独自一人，总要找个把别的报社记者同行，但确也没有一次受到闭门羹的待遇。后来同他们部队的八大处管接待的一些处长相识了，在深入前线采访时，有时也只是通过那些处长单独一人前往，现在回忆起来，有几点还是很清晰的。国民党这些高级将领对新闻记者一般态度都还很热情，这恐怕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很大关系，他们虽然没有坦率地讲出希望，可是总是愿意报纸通讯社替他们做些好的宣传。我是心里有数，这些人都是十年剿共的“名将”，所以为避免发生不愉快，处处不出头。但其实《新华日报》记者这块共产党招牌是清清楚楚的，我注意到这些人倒也没有公开表示任何区别对待。他们一般也根本不谈党派关系。在这些将领中，李汉魂先生是特别随和，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到战地采访他，他在一间满壁挂着军用地图的简陋屋子里与我谈话。他很带感情地说：“我们坚持抗战必胜的唯一条件是坚持抗战到底。只要我们能坚持，抗战必然有前途。”他还说：“我敢相信，这一种坚持，不怕经济力量脆弱的敌人不崩溃，国际上的形势不怕不更变得与我有利。而且我们只要有人有枪有粮食，抗战从一期二期三期，甚至继续到九期十期都可以打下去。”杀敌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我把这次采访到的情况写成通讯《战地访问李将军》，于第二天发回报馆，很快就见报了。李汉魂先生的夫人吴菊芳女士那时就是他的贤内助，经常回旋于记者之间。几十年后，我从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回国访问，吴



女士仍然是一个活跃人物。

在战区后方的乡村里，在总部所在地，这些将领中有几位是很好客的，记者总是座上客，满满地摆上一桌酒席（当然大多数是罐头）我在恭与其盛的同时，常常想起唐宋诗人写的军中宴。这在我后来到新四军中采访时是看不到的。战士的辛勤艰苦，特别是我目睹的拉壮丁的惨状，与将军的豪宴，还有那些管军需总务的处长，经常在南昌的征歌酣饮，我不能不说实在是很不调和的两种场面。

但是，我也应该说，对神圣的抗日战争，他们那几位高级将领在当时确实还是相当认真的，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那就更显得坚决。那些营团连长和士兵在激烈的战斗中的英雄气概，至今还是令人神往的。座落在德安到星子这条战线上的金轮峰下有一座无名高地，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据守在那里，日军向这座小高地每日发炮不下3000发，并派出飞机投掷燃烧弹，把整个山头的土都烧焦了，这个无名高地遂被称为“火烧山”。这个团的士兵在火烧山不食不眠与日军恶战三天三夜，伤亡甚众。我闻讯后曾赶去采访。在德（安）星（子）公路战事紧张时，我来到战地指挥所，国民党某师长对我说：“我今晚即上前线指挥作战，与我部下共存亡，只有这样，我才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下。”当晚，他率领一连卫队上前线，我亦随同前往。采访中得知，一个叫张德强的士兵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横倒在日军区域里。他以手代脚，滚入树林，一连三天，白天以尿解渴，晚上到田里挖山芋充饥，到第四天爬到自己阵地附近，当他发现有日军在修筑工事，就用仅有的两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缴获了几支步枪，返回队伍。我把采访到的这些材料都写成报道寄回报馆。那时我不



能像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那样有利用电讯设施发稿的便利，如果写消息用平信邮寄，寄到报馆早就成了明日黄花，所以我多以战地通讯的形式反映战事实况，这样还可使报道增强现场感，并可补充消息的简约。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经常要往火线上跑，越是战事激烈的地方越是要去，这就难免冒一点生命的危险。有一次采访归来，刚遇到一个隐蔽的炮兵阵地，就碰上日军两架轻型轰炸机前来轰炸，我还没有选择到掩蔽地点，炸弹就响了，我就伏在一门大炮的炮架底下。日军轰炸机见地面没有对空射击，愈加肆无忌惮，俯冲扫射，飞得很低，那驾驶员甚至把头伸出机窗向下张望。阵地上浓烟滚滚，好几个士兵被炸死了，我却从灰土中爬出，没有受伤。

《新华日报》对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努力作战这些事实，是做过许多报道的。到后来，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形势变化，《新华日报》记者的活动备受限制，是不能出重庆青木关一步，也就谈不到深入前线采访报道了。当然，公平而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是积极的，有功的，也是人数最多的抗战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当时只有几万人），这一点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的。

四

到新四军去

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战局重心已西移至粤汉路北段一带，南昌已非时局重心，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撤退，各报记者星散。当时《新华日报》已移重庆出版。我得知，报馆同



志撤退时乘坐的江轮于途中遭日机轰炸，潘美年、李密林同志不幸牺牲(后来才具体知道共牺牲25人，其中报馆同志16人，余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同志)，心中悲愤交集。这时，中共东南分局的同志们劝我同他们一道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既可到前方作战地采访，又可帮他们创办一张报纸。我几经考虑，决定不回重庆而到皖南军部去。

我于1938年11月离开南昌，行前给报馆几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不曾料想，经过40多年的战火和动乱，这封信竟然还能保存下来。去年，有位同志在搜集《新华日报》史料时发现了这封信，并送给我看。兹录于后，从中似可窥见当年一个党报战地记者的思想、工作的某些方面：

西园 宝权

梓年 汉夫 诸同志：

克坚 涤新

在赣闻美年密林两兄遇难，深为哀悼，报馆迁渝后，粤汉路形势又极紧张，将来通讯诸多困难，赣局今已非重心所在，目下敌亦无大举，故暂维持残局，南昌市民已撤退一空，弟留赣工作，甚感无重大意义，经与此间东南同志相商之下，决跟随彼等赴皖南，将来挺进前方沦陷区域，此乃弟素昔所期望者，前曾函告。在彼方除从事新闻工作外，间或可另贡献棉力襄助彼等创刊报纸。道远未克征求兄等同意，即自作决定，心殊不安，然军电纸电局不允拍发，邮递反复不知何日，客观困难，希加原谅，是幸。弟自前方返南昌，瞬已旬余，不幸病腿，所寄通讯，恐皆成为空幻。弟书籍一部早已赠诸报馆，尚有铺盖一，大衣一，皮箱一，此物请西园兄代为保存，若不能保存，则随意处理，送人亦可，自用亦



可。勿此

敬祝

努力

第西民 十一、九、

我离开南昌后，先到金华暂停。当时的金华是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我的老朋友骆耕漠、邵荃麟在那里主编一个大型刊物，叫《东南战线》，团结了大量的有志青年。我住在他们编辑部，经过他们又认识了严北溟同志，他是当时金华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化人，跟国民党的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也有很好的关系。金华有一些进步的文化活动，在那里见到了不少老熟人，他们都是从上海撤退到浙江去的进步文化人。我在《申报》工作时的老同事王闻识，也在金华见到了，他正在浙西前方，主持一张由浙江省政府办的报纸。他是广西人，看起来是受到黄绍竑信任的，想做一番事业。

我到金华不久，黄绍竑派车来约我去他的郊外住处谈话。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是打算要去访问这位主席的，但是他却先来邀请了。我去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想了解一些江西战区的情况以及政治情况，我也趁机问问他对浙江的抗战有何方针大计。黄绍竑是桂系的重要人物，不顽固，愿意与进步的人士包括像我们这些公开的中共党员交朋友。听他讲话的口气，是想在浙江干一番事业的。可是浙江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一个桂系人物，要在蒋介石的老家做出一番事业，确实是很少可能的。我不相信会出现奇迹，我也始终没有看到发动工农群众的坚实措施，因而也没有可能向读者报道点什么“气象”。



金华是我小学念书的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这次重来，已经相距14年了。当年的金华，非常闭塞，我头脑中印象仍然十分深刻的是那个教会办的医院，有几个施药的外国嬷嬷；那座在莲花井附近的，白粉墙上与木制栏杆上画着阴森、恐怖的地狱惨状的庙宇；还有那偶尔看到的大规模的迎神赛会。除此之外，就是每逢“五七”等国耻纪念日，我们小学生也手拿三角纸旗，口喊反日反帝口号，跟在省立第七中学、第七师范学生后面游行的情景。现在，一切都有了变化，浙赣铁路通车了，金华成了一个大站，好多旧时的景物已无踪影，而日寇已深入国土，金华变成一个东南抗战的重要后方了。

在金华遇到了从上海撤退的黄源同志，他听说我要去新四军军部，也表示愿意去看看。我们几个人，黄源、邵荃麟还有一位女同志汪瑛和我，一道坐上新四军的军用汽车，由金华到达皖南的岩寺，这是新四军的兵站所在地。然后由岩寺步行，经黄山脚下，沿青弋江向泾县出发，到新四军军部去。

在新四军军部

皖南山区沿青弋江的旅程是非常吸引人的，沿途青山绿水，风景独好。同行的也是在路上照顾我们的是一位红军老干部，年纪比我们要大一点，非常朴实、诚恳，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途中路过小河口，这是军部的一个后方，医院设在这里，后来我们办的《抗敌报》的印刷厂也设在这里。小河口很小，坐落在青弋江边的山沟里，住民不多。我们沿青弋江向北走，江面也缓缓宽大



起来。又经过茂林，这是一个大镇，镇外路边集中了几十座贞节石头牌坊，这是道学家毒害妇女的可怕记录。皖南是出朱熹的地方，也是出大学者戴震(东原)的地方，看到这些密密麻麻令人恐怖的牌坊，也就明白为什么戴震要大声斥责“理学杀人”的缘故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村，住在招待所里。照当时流行的做法，象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人的小集体到达，就要举行各种欢迎会，要登台讲话，军首长要接见。南昌新四军办事处的同志都比我们先到。朱镜我同志已担任军宣传部长。在做了几天客人之后，邵荃麟同志因浙江有事要回去了。黄源同志确实有如一块未琢的美玉，他在那里过着没有想象过的生活，处处吸引着他，最后决定留下工作了。我呢，一到这里就怀着向大后方人民报告新四军健儿纵横大江南北，奋勇杀敌的英雄业绩的急切心情，开始了采访活动。当时，新四军虽然组建不久，但已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指战员们甚至在南京城郊与日寇展开了游击战，以赫赫战果杀出了军威，振奋了民气，震慑了敌人。我很快写出了通讯《活跃在京芜的新四军》，具体报道了新四军的几次重要战斗。这篇稿件于1939年初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我希望能尽早地到前方去进行采访，但朱镜我同志要我留在军部，建议我先帮助他们把报纸办起来，还劝我兼上宣传科长的职务。最后我答应先办报再去前方，科长与当记者有矛盾，请他另外物色人，我也搬到军宣传部与他们住在一起。

军宣传部所在的那个村子很小，一二十个年轻人，一清早还未爬起来，抗战歌声就震动屋瓦。这段生活至今令人神



往。新年过后，我就开始筹备组织《抗敌报》的出版工作。《抗敌报》当时是一张四开的小型报纸，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快就正式出版了。我只主持了开始几期的编辑工作，后来就上前方去，没有再管这件事情。由于年久，当时在编辑部一起工作的几位同志，现在只记得有逝世不久的上海市党校校长陈一诚同志，还有姜庆湘同志。报纸出版是与印刷厂的建设分不开的。我曾到小河口去住过几天，对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同志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和干劲，终于在山沟里建起了一个小印刷厂，这个印象至今很清晰。

《抗敌报》每期的编辑出版，都得到了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和朱镜我同志的热忱关心，袁国平同志还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我在新四军包括到江南敌后采访，整个时间不到一年。如果说在那里我多少实践了在南昌时和朱镜我同志相约，帮助做点事的话，就是帮助办了一份报纸，发起了出版“新四军一日”，还在新四军教导队创办了一个新闻训练班。我在教导队教了一段时间的课，当时薛暮桥、罗琼、夏征农等同志都在这里教书。遗憾的是，1939年夏因重庆来电报要我回报馆，没有等到第一期训练班毕业，我就匆匆离去了。

现在回忆起当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生活的那些日子，仍然难以忘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皖南的崇山中，在抗日烽火里，吸引了多少英气蓬勃的知识青年，走上民族解放的大道，并且使那个沉寂的山区，成为青春火热的革命青年成长的摇篮。



五

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去

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陪叶挺同志到达皖南。那天天气很好，军部各单位负责人在项英等率领下，骑马30里，到章家渡江边迎候。这次活动在我头脑里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当周恩来、叶挺同志过了章家渡与前来欢迎的同志见面时，项英同志特别表现得恭敬。我看到项英同志的举动，完全是下级见到上级的真诚态度，心头暗暗觉得一喜。因为叶挺是北伐名将，第四军就是声威赫赫具有“铁军”光荣称号的北伐军，叶挺这个第四军的主要将领，现在来担任新四军军长，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人选，项英同志能够以真诚态度相待，怎能不令人欣喜。可是，很快另一个印象又使我感到有些迷茫。那是在欢迎的大会上，我十分注意倾听叶挺军长的讲话。在他讲话时，态度恳切，感情真挚，但又使人感到似乎有些沉郁，令人担忧领导层的合作。

我去看周恩来同志，他正在理发，我就将我的工作打算向他作了汇报。他要我早点到前方去，多向大后方读者报道这支红军改编的部队——新编第四军的战斗和各种工作情况，特别要我多报道一些江南敌后的斗争情况，以鼓舞大后方的人民，提高大家抗战的胜利信心。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促使我在3月初就动身去苏南陈毅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同行的是徐平羽同志，他正在一支队从事宣传工作。



与陈毅同志相处

从皖南走到苏南，一路上杏花春雨，典型的江南春色。我们说说笑笑，走了五六天，就到了一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我的采访工作，当然首先要向大后方的读者介绍陈毅将军。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陈毅将军访问记》，是我最早的一篇新四军将领的访问记。

陈毅同志这个风云人物，在当时就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他手不释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手中拿着的就是一部线装的《庄子》。在红军老干部中，这是非常突出的。他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谈吐中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深刻的形势分析和高度灵活的斗争策略，乃至他那热情、坦率、豪爽的性格，那种谈笑风生、善于运用语汇的风度，使人感到可敬可亲。在我的一生中，同党的领导干部接触也不算少，可是细细想来，使我感到最亲切，在他们面前可以放心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即使说错了受到批评，内心也只有感到舒畅而不会产生任何顾虑心情的，换句话说，在领导者面前，不会感到像古文大家韩愈讲的“足将进而趋，口将言而噤”的，一个周总理，一个陈老总是最突出的。这两位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和他们那种真诚像水晶一样透明的人格，真是像一块磁铁把人吸住了。

我在一支队采访期间，陈毅同志的一次谈话，长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是一个春雨如丝的上午，乍暖还寒，我们二三人在一间幽明的小屋子里，围一盆炭火，听陈毅同志纵论江南抗战形势。作为一位军事家，陈毅同志先给我们勾画了江南游击区的自然环境：北面是滚滚长江，对开展游击战是一大障碍；京沪铁路与长江平行，更缩小了我北方活动的地



区，东西南三面，四个大湖，小湖泊、运河、公路交织如蛛网，在这样一个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战争，是十分困难的。接着，陈毅同志果断地说：“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游击战主要条件是人力，人力可以战胜地形条件的不利。江南虽然地形条件困难，但是日寇的滥烧滥杀已激起了千万大众的仇恨。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会使敌人如陷孤岛！”陈毅同志告诉我们，一支队初到苏南时，有人看到他们装备很差，就对他们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有一个好心人甚至对他说：“陈司令，你的司令部只有七枝枪，怎么能够抗日呢？日寇一包围来，你们是逃不掉的，我劝你们改换服装，穿便衣吧！”陈毅同志正气浩然地说：“我们堂堂的国家正规军，怎能脱下军装改换便衣？”就在苏南一般民众震惧于南京失守，大军西退，敌人深入而人心惶惶时，新四军一支队开始了战斗。

一说起打仗，陈毅同志的眼里闪射出兴奋的光芒。他用强有力的声调说：“我当时首先指出，一切当前的困难，都可以由战争的胜利来解决，而且也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解决。我们武器不够，但是战争的胜利可以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我们人力物力困难，但是战争的胜利，可以得到人民抗战信心的提高和踊跃参加，慰劳援助。我们要以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战斗的胜利，来创建江南模范抗敌根据地，来配合全国战局。”陈毅同志向我们讲述了一支队几次战斗的经过。他那绘声绘色的话语，使我听得入了迷。他告诉我，从1938年6月15日到8月15日，两个月里，新四军一支队与敌作战30余次，屡战屡捷。新四军曾一度攻入句容城，在城门口就击毙敌军30余人，城内伪维持会完全烧毁，烧死汉奸武装和



日寇很多，残部狼狈逃出。新四军还动员了17万民众，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镇江到句容，丹阳到句容，金坛到丹阳，镇江到江阴的四条公路彻底破坏了，使敌人仅仅能够保持京沪铁路和溧武公路。在新四军的有力打击下，日寇部队寝食难安，汉奸组织闻风丧胆，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大大高涨起来，江南游击战出现了新局面。

日寇在屡次遭我痛击后，改变了战略，挖空心思搞了一个“梅花桩”式的堡垒政策。所谓“梅花桩”，就是敌人通过修复被我破坏的公路和修筑新的公路，并利用河流湖沼错综的水网，把地区划分为几小块，搞得像棋盘格子一样，然后在每一小棋盘格子里又布置像梅花点般的工事据点，派少数兵力固守，以此缩小我活动区域，增加我活动困难，对我实行封锁战术。陈毅同志轻蔑地说：“敌人搞‘梅花桩’，我们讲辩证法。他采取新措施想乘我之弱打击我，但又暴露了自己的新弱点。敌人到处设据点，就把自己集中的兵力分散了，运送子弹给养、交通均感不便，这是挨打战术。敌人是外来民族，据点敌人不能不与我民众发生关系，我就可乘机袭击他。”新四军抓住敌人的新弱点，经常消灭敌人守备比较疏忽的据点，袭击它的运输子弹给养的队伍。“梅花桩”战术不但没有赶走新四军，反而成了敌人自己的坟墓。讲到这里，陈毅同志朗声大笑起来。

陈毅同志又讲起了江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讲起了对国民党政府设立在江南游击区的行政机构的意见。他颇为气愤地说：“今天游击区的行政机构还是抗战以前的老作风，等因奉此的公式主义。这种弊病在平时还可以马虎过去，但在战时就不行了。为了适应战争紧迫的要求，任何



一件事的决定和实行，都需要当机立断”。陈毅同志针对这些官僚机构的弊病指出：“游击区的行政今天特别需要独立性、创造性，需要党政军民协同的统一战线的最有力的动员组织，更需要有新的财政经济政策，这是保证游击战更大胜利的基本条件。”后来，在我回到重庆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著作以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文件之后，我才进一步理解，陈毅同志这些有关军事、政治的思想观点，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意见是多么的一致。皖南事变后，全党都清楚了解，项英同志犯了错误，而正确的代表是陈毅同志。现在回顾1939年春陈老总当时那番谈话，就更清楚了，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陈毅同志侃侃而谈，不知不觉间三个小时过去了。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那英武豪爽的形象和这次长谈的美好印象，就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间。

在苏南时，我还陪陈毅同志去东坝拜访过新到任不久的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冷欣此前在江西赣北前线活动过，我在赣北采访时认识他。陈老总去拜访完全是礼节性的，也没有什么好谈，所以约我这个记者作伴。我们在去东坝途中和在东坝一个小旅馆里，天南地北地谈了很多。我发觉他那时对王明的真面目尚很少了解。可是最早告诉我毛泽东同志情况的是陈毅同志。他第一个向我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在苏区时的好学不倦。陈毅同志说，每逢行军，毛泽东同志的两箱书挑总是跟着他走的，每到一地，毛泽东同志都要收集可以收集到的报纸，而且看报时总是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谁都没有他看得那样仔细。有几次敌情的判断，就是靠分析



报上所载的各种动态得出的。他还说，最近毛泽东同志还给他写了信来，劝他多读书，等等。我在武汉《新华日报》时候，报社的同志经常受到王明的斥责，大家对他的作风非常不满，因此非常尊敬毛泽东同志，但对毛泽东同志并不了解。当我听到陈毅同志的这些介绍时，自然非常感动。

对“两面派”的争取

我在江南新四军采访期间，陈毅同志和其他新四军领导同志，都向我介绍过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许多感人的故事，至今难忘。

日寇在江南一面烧杀抢掠，一面施展政治阴谋。他们大肆恫吓民众不得与新四军往来，挑拨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坐收渔人之利。新四军开进江南之后，面对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以很大的注意力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陈毅同志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正和一个来访的绅士交谈时，参谋跑进来告诉他：“与这位绅士同村的另一绅士已组织人要杀这个绅士了。”他听了很惊奇，马上派人把那位绅士请来询问究竟。那位绅士来了，承认确有此事，并指斥另一绅士是汉奸。陈老总当面指出这种举动的不对，对双方晓以大义，使他们握手言和。两位绅士甚为感动，安然回去。像这类事情当时确有不少。新四军一到，许多地方绅士就送来互相攻击为汉奸的函件，要求军队惩办。有些人对新四军多方包围、请客，甚至暗示可以奉送金钱，等等，想借军队力量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新四军认为，这不仅是地方势力的内哄，更是日寇政治阴谋造成的现象。所以新四军坚持原则，各方调解，决不偏袒。由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运用，



地方民众的团结一天天地巩固起来。

陈毅同志团结韩紫石老先生的事迹是我们党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范例，早已为大家所知道。在苏南时期，还有一个纪振纲转变的故事，多年已不为人所提及。而争取纪振纲正是陈毅同志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取得光辉成果的第一步。抗战初期，江南处在敌我尖锐搏斗的环境下，出现了不少“两面派”人物。这种两面讨好的“两面派”，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自我表白为“明保曹操，暗保刘备”；有的则说什么“身在日本心在中国”，“大丈夫能屈能伸”；有的心头还存民族大义，但又顾虑财产，在苦闷中两面敷衍。总之，这种“两面派”当时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人们概括说：“江南有七多：麻将多，茶馆多，澡堂多，大刀会多，土匪多，青帮多，两面派多。”新四军认清了“两面派”动摇、媚敌、降敌的行径，同时也看到，这些人还没有死心塌地做汉奸，因此就有争取的可能。新四军通过文字和口头的宣传，反复说明这种“两面派”的态度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是不允许的，晓以民族大义，同时又直接间接地派人做“两面派”的工作，尽可能地把他们争取到抗战阵营中来。新四军排除种种阻碍，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使许多两面人物转变了态度，沉重打击了日寇“以华制华”的政策。纪振纲的转变即是最有影响的一例。

纪振纲是金坛附近规模宏大的茅农公司的经理，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实业界人物。他在南京失守时，招集了一百多名从前线撤下来的广东籍士兵，连同他原有的守备队，计有三百多人枪。他是当地影响最大的一个“两面派”。新四军开到当地后，一再派人去规劝他，向他说明：“在这抗日战争中，应做民族英雄，为国家民族尽力，两面应付是不好的。”纪振



纲听到这些谆谆劝导，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他既有民族正义感的一面，但又惧怕参加抗战而失掉他20年苦心经营积累起来的40万的投资。就在他犹疑、苦闷的时候，日寇武装把他抓到金坛去，威胁利诱，提出三个条件，要他表明态度：第一脱离与抗日军队和政府的关系；第二委任他为镇江等七县的“剿匪”司令；第三要他组织伪军，每月给他五万元。纪振纲想起了新四军对他的忠诚劝告，回到茅农公司后，伪称儿子有病急须送上海治疗，举家逃往上海。行前，他给新四军写了一封恳挚感人的信，说明他绝不作汉奸，说明他不得不走的苦衷。他指命百多个广东战士携带武器开到新四军，托新四军转送他们回原部队参加抗战。他在信中祝望新四军努力杀敌，并表示他到上海后就转去抗战后方为国家效力。他还写信给亲友，鼓励他们牺牲一切，参加抗战。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我还一直记在心上。像纪振纲先生这样拥有数十万资财，而能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上，毅然出走，不做汉奸，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纪振纲先生的转变，生动地反映了陈毅同志执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功和才华，也反映了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中各阶层人士的觉醒。

在江南新四军采访期间，所见所闻一直使我处于兴奋和激动之中。我把这些令人感动的材料尽量写进我的通讯报道，寄回重庆报馆。这些昨天的新闻，今天已经成为历史。

六

一次没有成功的夜袭

我在新四军的这段生活，真是称得上丰富多彩。我经历



了许多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结识了一些新四军将领和许多可亲可爱的战士。除了陈毅同志之外，罗炳辉同志也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罗炳辉同志是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这位红军名将我是第一次认识。他是一个爽直而又带点粗豪性格的人，有一点中国农民性格的特征。

一天傍晚，罗炳辉同志率领一支部队要去袭击从据点出来骚扰的一股日寇，我跟着他的指挥部一起行动。到赣北采访以来，我经常在火线上活动，对战地生活并不陌生，但实地参加游击队夜袭敌寇却是第一次，想到即将发生的激烈战斗，心头产生了一阵阵的兴奋和激动。在夜幕的掩护下，一队队战士精神抖擞地出发了，一路上只听见唰唰的脚步声。我们急步行进数十里，包围了谍报所说的日寇肆虐的那个村庄。日寇20余人早已闻风逃走。在一间堆满柴草的房子里，罗炳辉同志听了各路的情况的汇报后，决定收兵回营。仗没有打成，而罗炳辉同志的指挥调度，却处处显出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将领。当然，扑空的失望心情，自然是大家相同的。但是，这次没有成功的夜袭也使我更加真切地感到，在新四军游击战士频繁的打击下，苦于兵力不足的日寇初到江南时的那种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已经大大地收敛了。

说起日寇的这一变化，我不禁想起了在新四军中采访日军俘虏的一段往事。那还是我住在新四军军部的时候，每天都看见几个日军俘虏毫无拘束的自由行动，在卖香烟糖果的小铺子里也常碰到他们，驻地的小孩子们一边叫着“日本鬼子”，一边和他们嬉戏打闹。这些情况，引起了我这个记者的兴趣。一天下午，在新四军敌工部同志的陪同下，采访了四个日军俘虏。他们的名字是山本俊一、田烟戈造、后藤勇、



香河正男。他们来中国前，有的是渔民，有的是厨师，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大学生。他们没有想到会当兵到中国来打仗，更没有想到会成为新四军的俘虏。他们很真诚地对我说，这场侵略战争不但害了中国人民，也害了日本人民。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物价飞涨，他们在家时日子已经很艰难，被强征入伍后，家中只剩老弱妇孺，不知怎样挨过这日子。说起这些，这几个俘虏都流露出凄凉的神色。他们还告诉我，在新四军里感受最深的就是官兵平等，再就是对俘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都是日本军队所做不到的。经过在新四军中短短的一段生活，经过新四军的教育，他们都认清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阀，因此都踊跃地写告日本士兵书，积极参加反战宣传活动。我把这次采访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道，寄回《新华日报》。这四位日本朋友如果还健在，也都是古稀老翁了。

在采访中，经常有些新四军战士向我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战事故事，听来活龙活现，生动感人。我涌起一个念头，要是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寄给《新华日报》发表，不是更有助于大后方人民了解我们英勇善战的新四军吗？后来我果然看到了战士们写的新闻报道，其中有一篇是记述新四军博望（安徽当涂县的一个乡镇）战斗的经过，一篇描写了新四军在天溧路（江苏天王寺到溧水的一段公路）上的伏击战。我把这两篇通讯加了一个总标题《火线下的报道》，还写了一段按语：报道神圣的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业绩，“除了战地新闻工作者加倍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努力开展在全国南北战场上亲自在与敌人肉搏奋战的战士中的通讯工作。我们相信，从战士活生生的血的斗争中来描写他自己所参与的



战斗故事，一定是有血有肉的。”“积极地来帮助前线战士写作，……帮助战士的写作尽可能获得发表机会，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战地通讯工作上，将随着抗战的新阶段而放出异彩来。”这可以说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对党的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的朴素认识。

到敌人后方去

在那次没有成功的夜袭之后不久，我动身到敌人后方去，目的地是丹阳的访仙桥。同行的是一位老红军，由陈毅同志派往访仙桥管文蔚部任参谋长。支队司令部派了两个侦察战士保护我们前行，并带有支队司令部的好几封介绍信，是给沿途一些打着抗日旗号或是两面应付的地方武装势力头头的，请他们逐段派人将我们护送过境。

当时苏南敌后地区，国民党势力纷纷后退，日寇在占领这个地区之后，除留下守交通据点及重要战略城镇的小部队之外，大部队都向西推进，因此敌后不少乡村市镇，政治上出现真空状态，一时鱼龙混杂，各种地方势力蜂起。江南大市镇多，每一个市镇，总有一个什么司令。这些司令往往都是：日寇不来，就控制市镇，收税称霸；日寇来扫荡，则撤往僻乡躲一下，待日寇返回驻地，又进入市镇。我到敌后去，沿途就见了不少马、牛、羊司令。他们一般都在市镇的最大茶楼酒馆见客办事。

我们每走到一个市镇，就先打听某某司令在什么地方。街上自有人接洽，把我们带到一个茶馆或酒楼上去，拣一雅座坐定。茶房泡上茶来。不久，一个个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等先后走上楼来，每来一位，总要拿起茶壶往客人与陪客



面前的茶杯里斟一斟茶，然后从口袋里拿出纸烟，一支支分发，嘴里说一声“请”。然后就赐酒吃饭。我们除掉表示一支队司令员、副司令员对他们的问候外，主要是要求他们能派人带路和介绍前一站的司令，或者请派轮船送我们到下一站。这些地方势力，由于切身利益，也总是要向我们表示他们对新四军“友好情谊”，对于我们提出的具体要求，一般也能给以满足。因此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和障碍。这些地方武装势力，可以在新四军和日伪军的夹缝中苟存一时，却难以久安，政治、军事形势一有变化，他们就摆起来，开始分化。后来听说有的被改造为人民军队，也有的变成了打着“忠义救国军”旗号的汉奸武装。

夜过封锁线

我们在途中很快就发现，那两个20岁左右的侦察员真是令人感到可爱。他们身穿便服（我们还是穿的军装），身上挂两颗手榴弹、一支驳壳枪，除此之外就是浑身是胆。一路上我听他们讲了不少与敌人突然遭遇的惊险故事。他们说，身上带了这两样玩意儿，就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地方都敢去闯了。

但是，过丹阳附近的三条封锁线（公路线、运河线、沪宁铁路线）时，我心头不免有点紧张。这三条线靠得很近，日寇据点又多，戒备甚严。那里虽然有我们的游击队，可是北边离长江不远，南有铁路、运河、公路的封锁，人地生疏，在这样的平原地区活动，情绪自然会显得紧张一些。我们在带路人的带引下，在运河旁的一处隐蔽地点挨到了傍晚，待到敌人收岗回营后就偷渡过去，接连过了三条封锁线，天色



也黑了下來。帶路的人回去了，我們繼續向訪仙橋前進。

我們趁着暗夜趕路。突然，對面來了幾個人，一見我們人影，馬上躲到稻田里去。護送我們的偵察員高聲喝令他們快些出來，不然要開槍了。他們陸續走了出來，一盤問情況，才知道他們都是訪仙鎮上的商人，因為日寇突然進襲才逃了出來。我們得知日寇已進入訪仙橋鎮，深夜無法前進，只能就近找一個偏僻小村莊，叩門借宿。在這兵荒馬亂的戰爭時期，夜半敲門借宿，老百姓是很不歡迎的。我們敲了半天門，沒有人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試叫說，我們是過路的新四軍，請借宿一宵，天亮就走。這一着居然成功了。屋內出現了亮光，一位老者開門把我們讓進去了。老婆婆也起來，為我們燒水送茶，非常親熱。後來才知道，這對老年夫婦有一個兒子去新四軍參軍了。他們知道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的好軍隊，聽到我們講是新四軍，就來開門。

第二天一早打聽到敵人已撤出訪仙橋，我們繼續出發，上午9時到達，很快又被帶到一個酒樓上吃了早點，然後見到了當時江抗的司令員管文蔚同志。這是一支新建立的游擊隊。我在那里住了好些天，寫了訪問記，向大後方讀者介紹了南京附近的人民組織游擊隊英勇抗敵的情況。後來由原路返回一支隊，再回到皖南軍部。在這裡，碰到楊帆、吳大琨等同志率領從上海來的慰問團，老朋友見面又是一番熱鬧。

江南游擊區一個多月的生活，除掉報道工作得到豐收之外，我個人的好處也是非常多的。這就是對游擊戰爭，即是在平原地區也是可以站住腳，可以取得勝利的認識十分深刻。只要游擊隊與人民血肉相聯，受到人民擁護，雖然一時力量不強，又處在敵人心臟地區，仍然可以取得勝利和不斷壯大。



在沦陷区统一战线工作十分复杂重要，而做好了威力无边。以上这些体会对我以后从事编辑工作以及学习毛泽东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到军部以后，我仍然在教导队上课，也为培养第一期的新闻训练班学员忙碌着，生活过得紧张愉快，真是有点“乐不思蜀”了。可是有一天，项英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说，重庆来电要我回报馆工作，并让我到参谋长那里拿路费。我整束行装，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新四军的同志们，告别了我生活了半年多的江南根据地，踏上了返回重庆的路程。

七

生活书店——我们的好“兵站”

离开皖南新四军军部，踏上了赴重庆的旅途。当时兵荒马乱，我真不知道究竟从哪条路线走比较便捷，只能边走边打探。我就这样于1939年7月底动身，第一站目的地当然是金华。

毕竟是年轻，溽暑步行，中午也不休息，沿着青弋江，经过黄山山脚，步行到岩寺，然后搭军用交通车到金华。这里的政治空气比半年前显然更沉闷了。由于南昌早已失守，势非经过赣州绕道不可，我在金华“生活书店”友人处，问清了沿途“生活书店”的所在以及负责人姓名，就乘火车经上饶再搭长途汽车经南城、宁都等地，抵达赣州。一路上都是依靠“生活书店”的朋友们帮忙，到赣州也是住在当地的“生活书店”里。赣州地僻，又兼政治形势的变化，当时已没有多少



知名的民主进步人士在这里活动，我只见到老熟人雷洁琼女士，她还留在此地继续奋斗。这时的赣州已成为蒋经国发迹的基地。

到赣州第三天我还准备以《新华日报》特派记者的名义去拜访赣州地区行政专员蒋经国。在专员公署的衙门里，见到蒋经国当时的秘书长（此人是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同学，对中共态度友善，解放后留在上海，没有去台湾），他偷偷告诉我，当晚戒严，全城检查，他说，你不要久留了，蒋经国也不要见了，赶快离开这里。我在这位素昧平生的专员公署秘书长的关切下，匆匆回到“生活书店”，与店负责人一商量，连夜就买船票，搭小客轮下吉安去。

我到今天还非常怀念那次旅行所接触到的“生活书店”的同志们。“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的进步书店，在抗战前的上海有很大的名气，为传播新文化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抗战时期，在中央领导下，“生活书店”与“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一起，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非常光辉的贡献，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种种残暴的摧残，书籍被查禁，书店被关闭，人员被逮捕。这三家进步书店在，十年动乱期间，竟被“四人帮”诬蔑为30年代的三家黑店，真是令人愤慨。而这三家书店的职工，解放以后长期没有被承认为从事革命工作，直到不久前，经过在三店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的长期呼吁奔走，才正式肯定参加这三店工作的同志为革命工作干部，压在心头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才开始放下。事情虽然解决了，可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当事人没有做好应做的工作，总不免至今仍有些憾然。“四人帮”这些丑类的胡说，现在没有人相信了，然而今天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当年三店工作人员为革



命奋斗的种种事迹，确实不太了解，这不能不说与我们这些后死者没有很好负起宣传、介绍的责任有直接的关系。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这三家书店确实是我们可信赖的朋友，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在我回重庆途中的这一段，处处都离不开“生活书店”朋友们的热诚帮助，我把沿途的“生活书店”当成了自己的家，就像自己军队的兵站一样。那个年代里，豺狼遍地，世态炎凉，可是我和“生活书店”的朋友们往往初次见面就心心相印，诚挚相待，真可谓患难相共。这岂止是个人之间的情谊，这是经过严峻考验而凝成的我们党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之间的血肉关系。这三家书店里那些为传播进步文化不畏艰险、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的人，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歌颂，把他们的事迹介绍给广大的人民群众。我解放后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建议作家与电影厂写作与拍摄三部人物传记片，一部是聂耳传，已经拍摄了；一部是鲁迅传，作者和电影厂都花了很大力气，还惊动了周总理，可惜迟至今日未能实现；再一部是邹韬奋传，想通过他来歌颂和反映进步出版战线的斗争事迹，可惜，这部片子到“文革”前我离开上海时，连脚本都没有完成，而最热心的金仲华同志又在“文革”期间被折磨死了。十年浩劫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我衷心期望他们在银幕上出现。

从吉安到衡阳

自赣州下吉安，船行平稳。半年前，南昌尚是江西省政治中心，种种情况晃如昨日，如今已沦为日寇南侵据点。国民党统治者逃往吉安，对抗战毫无热情，而反共却甚为猖獗。



船经万安，触景生情，不禁想起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那首传颂一时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来：“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位爱国词人追忆南渡金兵追迫隆裕太后在赣水逃难的往事，唱出了对人民苦难的真挚同情和对南宋当局纸醉金迷、不图振作恢复的满腔愤懑。此时此地，我默诵这首词，感动得心潮澎湃。到了吉安，我留住几日，这里的政治气氛不便于开展采访活动。见到不少从南昌撤退来的热血青年，他们面对沉重的政治压力都感到精神抑郁。当时的吉安成为江西省临时政治中心，一边是日寇飞机整天轰炸，居民们一清早就跑到城外躲避空袭，我所认识的几个从事抗敌后援工作的优秀青年被炸死了；另一方面，那时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CC、复兴社特务杀人如麻，许多抗日进步志士和中共党员被投入邻近吉安的泰和监狱，吉安成为黑暗地狱。反共的特务刊物相继在吉安出版。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我一天也不愿意多呆，一等到去衡阳的长途汽车，我就匆匆离开了这个可诅咒的城市。

由吉安到衡阳，汽车要经过安福、莲花，最后经界化院进入湖南境。所经之处都是红军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沿途山乡的土屋墙上还残留不少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引起我极大的欢乐，慨然亲临当年井冈山的斗争现场，可惜没有可能也不允许停下来作些实地考察。这样晓行夜宿走了几天，终于到达了衡阳，由此可以坐火车到桂林。桂林有八路军办事处，我决计先到桂林再定去重庆的路线。

抗战中的桂林

我是第一次来桂林。这时的桂林已成为仅次于重庆的大



后方第二个文化中心。我到桂林住在“国新社”楼上，当时范长江、胡愈之、金仲华、孟秋江等同志都在这里。我跟“国新社”的几个小伙子一起，大家睡在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可是老友相逢都有说不出的兴奋。桂林“国新社”的工作是长江同志在主持，一屋子年轻人，工作十分勤奋。我到时天气正热，每天下午都和“国新社”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到漓江去游泳洗澡。那时桂林漓江水尚有大半人高，可以行船。我1976年重去，已是水不盈尺，游览阳朔山水，要乘车走很远一段路才能行船。真是“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了。

《新华日报》在桂林设立了分馆，大约有五六个人在那里工作。这些同志是从广州分馆撤退来的，途中亦曾遭到日机轰炸，有几个人受了伤。他们艰苦跋涉到桂林后，在李克农同志的领导下，很快在这里建成分馆，通过义卖献金等活动，扩大了《新华日报》的影响，打开了工作局面。《救亡日报》正在这里出版。从吉安赣州这种地方来到桂林，感到政治气氛大有不同，抗日救亡活动在这里比较活跃。我们早在抗战前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农村》也在桂林继续出版。老朋友杨东莼同志与桂系上层一些人还能友善相处，他利用这个条件，积极开展工作，我到桂林时，他正主持着桂林师范专科学校，既担任校长又兼任广西地方行政干校的教务长，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包括好多《中国农村》的老友都在东莼同志的学校里任教，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姜君辰、张锡昌、秦柳方、千家驹、吴觉农等好多熟人都活跃在桂林文化战线上。

长江印象

我在桂林作短暂停留，每天生活却也十分忙碌，不是被



一些单位邀去座谈或报告东南战线情况，就是探视熟人，高谈阔论一番。谈得最多的是与范长江同志，这时，他已被排斥在《大公报》之外，全力以赴主持“国新社”工作。在这里索性说一点我头脑中关于长江同志的至今十分鲜明的几点印象。

我从1935年起就以钦敬和关切的心情，贪婪地读着长江同志发表于《大公报》上的旅行通讯，他对华北特别是西北边疆的每篇报道，都激起我心头热血奔涌。我第一次见到长江同志是1936年在上海。记得在一次新闻记者集会上，主席向到会者介绍了刚来上海的范长江，长江即席说了几句简短的话。这第一个印象非常令我惊讶，眼前的这位长江，不出我想象之外，他穿着长袍马褂，谈吐温文迟缓，带一些北方人的土朴无华，加上他那矮胖的身材，简直使我感到像一个北方的乡绅，又像北方店堂的大伙计。总之，头一个印象是其貌不扬，风度拘谨，不像一个文化人，更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慷慨豪迈的风云人物。

抗战军兴，在武汉我们又聚在一起了。这时长江发起创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我虽然由于在《新华日报》做夜班编辑，不可能去担负“青记”的具体工作，可是“青记”的许多活动，我还是参加了的。在这许多接触中，长江的形象在我头脑里真正起了变化，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位热情、可亲，谈笑风生，壮怀激烈而又善于合群的人，完全不是在上海初见时的印象了。后来我们一同在东南战地作采访，相聚在南昌与赣北战场，我们的交往就更多，相互了解也更深了，渐渐地我感到长江有一个善于团结人的长处。也正是由于他具有这方面的长处，许多新闻工作者乐于同他交往，长江也得以发挥他的组织才能，把广大新闻记者团结在“青记”与“国新



社”等团体中，在“青记”与“国新社”工作待遇微薄，生活艰苦，工作繁重，大家却乐此不疲，这与长江同志善于团结人是很有关系的。长江同志身上这种素质和能力，是很可称道的。

我从桂林回到重庆工作不久，长江去香港主持《华商晚报》工作，以后又辗转去了华东解放区。抗战胜利后，我们又南京梅园新村见面。那时周恩来同志带领我们从重庆到了南京，中共中央也电召在新四军的许多老新闻工作者回京沪一带办报纸，搞宣传工作。我们就这样在1946年夏秋之交重逢于南京。后来，由于和谈破裂，环境日非，1946年11月，我们同乘一架飞机飞返延安，在清凉山一起从事新闻工作，直到延安撤退。我们奉命到华北解放区建立新的新华通讯社总社，长江留在陕北，跟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行军。他带领一支精悍的新闻通讯队伍，为党中央抄收国际新闻广播，负责中央与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新华总社的宣传联系工作，直到1948年中央到达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我们又相聚了。在西柏坡，我和长江同住一个房子，工作之暇就是聊天。

我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政治，有时也交换一些新闻业务方面的具体意见。我很钦佩他在政治上观察问题的敏锐。他告诉我转战陕北的种种情景，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描述精彩生动感人至深。他描述了毛主席的指挥若定以及过人的记忆力。他说，毛主席对敌军队伍的番号乃至某一个师的指挥人员，兵力强弱，调动位置，都了如指掌，随时纠正参谋人员汇报时弄错的地方等等。他也描述了周恩来同志作为总参谋长坐在土堆上写电报发布指示的艰苦情景，乃至行军中遇到的种种惊险情状。当战士干部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表示担心的时候，毛主席总是从



容不迫地说：“隔一个山头，就是另一个世界。”如此等等，都使我激动万分，永难忘怀。可惜这样一位著名的有才华的记者，对这样一场伟大而亲历的历史事件，竟没有为后人留下一篇记述，令人感到遗憾。

话还是拉回到我在桂林的小住上来。我在“国新社”住了几天之后，就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在这里主持工作，这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而又使人乐于接近的人，他做事细心严谨，与人相处亲切、坦率而又谈吐幽默。他热情地留我在办事处住下，等待几辆华侨捐献的卡车到来，就要我押运回重庆。我们少不了也要谈谈敌后情况，我也询问了一些大后方的政治形势方面的问题，住了五六天，六辆华侨捐献给八路军的大卡车到了，我又开始了新的旅程。那次同行的有翦伯赞夫妇。华侨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事迹书不胜数，有的送来西药，有的送来车辆，还有的捐赠生活用品，情景十分感人，我亲自接洽或经手的就有不少起。解放后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所谓“海外关系”往往变成人们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很多年轻人或局外人根本无从了解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海外进步华侨是如何热情支持抗战的。可喜的是，这方面的失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我们一行数人乘坐卡车，行进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经柳州、贵阳、遵义、綦江，包括走过好多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名城雄关，渡过了咆哮的乌江，终于抵达抗战的陪都重庆。从此，我结束了战地记者的生涯，回到编辑部去当编辑主任了。



八

在化龙桥的山沟里办报

1939年初秋，我接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的委托，率领6辆华侨捐献的卡车和几十个搭车赴渝的同志，从桂林出发。克农同志一定要叫我带队，意思也很明白，我有一个《新华日报》特派记者的公开身分，而且又带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给的随军记者的证明书，有这样一个身份，便于沿途遇到什么麻烦时出面打些交道。

由桂林到重庆要经过柳州、贵阳、遵义等许多城市和乡村，过柳州后，越向前走越显得荒僻，到了贵州地界，异服殊音的苗族男男女女时有所见。沿途所经城镇很难看到一点抗日的气氛，好像根本不知道寇深祸急，国民党与地方军人政权只图苟安，不动员人民群众，实在令人浩叹！车行四五天，终于到达重庆山城。

9月初的重庆，天气仍然相当炎热。这时《新华日报》已经搬到市郊化龙桥山沟里，正在修盖简陋的竹编和泥土的平房，作为办公与住宿之用。我从此就有将近4年的时间，主要是担任编辑部主任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里我要稍为叙述一下我离开一年多以来《新华日报》的基本情况。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同一天在重庆出版，做到了报纸连续出版，中间没有一天停刊。《新华日报》与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部分同志从武汉撤退时，乘新升隆号轮船在湖北嘉鱼附近的燕子窝遭敌机轰炸，《新华日报》潘美午、李密林、项泰等近20位同志壮烈殉难。他们是第一批为



人民的新闻事业献出生命的新华人。

《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经历了1939年5月3日至4日接连两天几十架日寇飞机对重庆市区的狂轰滥炸，报馆被毁。其它报纸同样陷于出版困难。这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借口机器、房屋、纸张困难，提出重庆各报联合出版，成立一个联合编辑部。在当时客观困难情况下，《新华日报》派了章汉夫等同志参加联合版的编辑部，在内部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出面直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傖交涉早日结束联合版，恢复《新华日报》单独出版。《新华日报》的同志还自己创办了“新华壁报”，几乎是每天出一期，同国民党控制新闻出版的企图作斗争。由于各报共同努力，联合版出版到8月份结束，《新华日报》于1939年8月13日在化龙桥恢复出版。

那时的《新华日报》还不是人员最兴盛的时期。社长仍然是潘梓年，总经理是熊瑾玎，华岗同志在我到重庆后不久就被派到西康去做统战工作，吴克坚同志任总编辑，副总编辑章汉夫。编委中，许涤新同志主持《群众》周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吴敏（杨放之）还是主持专栏文章，戈宝权管文艺，陆诒管采访部。我主持的编辑部办公室就是夜班编辑办公室。每天傍晚开一个编前碰头会，章汉夫同志主持，编委、各部主任都要参加，谈谈情况和编辑中的问题。会完各自散去，编国际国内两版新闻的同志和我留下工作。我除了管发稿外，就是写短评，有时跑到排字房去与工人商量拼板。等到版快拼好，就去把章汉夫同志唤醒来看大样。我因为做夜班，白天除需要写文章和外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不再管其它的工作。章汉夫同志是主持日夜两班的核心人物。

1939年到1940年期间，日寇为了逼降，轰炸是相当频繁



的，有时一天要来几次，化龙桥山沟里也挨过不少炸弹。敌机施虐可苦坏了我们这些编报的人，有时警报整夜不解除，我们就得一直躲在防空洞里。报馆的防空洞就在编辑部对面小山坡的下面，洞里点起蜡烛编报，偶一为之可以，长时间搞并不是办法。因为一则洞小人多，空气本来不好，不适宜燃烛铺桌工作，何况炸弹在附近落下，一阵气流冲来，蜡烛熄灭，无法工作。经常是警报解除了，天也亮了，别人还可以补睡一下，做新闻编辑工作的同志再疲惫，也必须把当天的报纸编好。排字印刷工人同志一样都非常辛苦。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重庆各报社之间的关系还是不算太坏的。譬如各报社的主要干部定期举行聚餐会，一起吃顿饭。不拘一格地聊聊有关的事情，大家还都是谈笑风生。各报之间还举行球赛，也举行过排字、浇版、上印机的技术竞赛，《新华日报》都取得了第一名。最有趣的是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经理张明炜在一次陷于断纸困境时，只好来向《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熊瑾玎商借。《新华日报》慨然允诺了。后来国民党当局知道了这件事，感到太丢面子，便把张明炜免职了，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一个接一个，新闻同业之间的这类来往，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几乎就完全没有了。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新华日报》的迫害是逐年加剧的。1939年春，《新华日报》因避日机轰炸，最早迁到高峰寺，在那里办了一个印刷厂。化龙桥开始出报以后，高峰寺那个印刷据点也没有撤销，留下一些同志在那里排印党的书刊，包括延安的《共产党人》等。1940年2月，中统特务突然把报馆在高峰寺的林肖碇、姚黎民等13人五花大绑抓了去，想不露声色地秘密处死。幸好被我们侦知关押之所，经多番交涉，



才于被捕两个星期之后释放回来。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对面山坡上有一座办事处用于接待来往暂住同志的民房，特务武装也曾到那里搜查捕人。在国民党当局心目中，除掉红岩、化龙桥报馆、上清寺、曾家岩周公馆等几处是中共公开机关，采取严密监视外，只要发现别处有中共的机关或人员，他们是一定要无情摧残的。叶剑英同志常常说：“我们这些人是身居虎口安如泰山。”

站在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斗争的最前线

《新华日报》创办9年多，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斗争，始终站在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最前线。

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吸取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专制之长，推行了一套新闻检查制度，从地方县镇到陪都重庆层层设置新闻检查机构，对报纸新闻言论的控制步步加紧。在与它的斗争中，《新华日报》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一直不放弃审查原稿的大权。开始时，检查官在送审的原稿上用红墨水涂抹他们认为忌讳的字句，拿回来后，我们根据自己的估计和需要，把被红墨水抹去的文字照登出来，有时为防止他们来纠缠，我们也用红墨水在被涂的地方旁边打上红三角，搞得真假难辨。检查官渐渐看出用红墨水不行，就改用很浓的黑墨汁涂，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墨笔在被涂沫处旁边写小字，检查官还是奈何不得。后来检查官索性用剪刀剪掉原稿上被删字句，一张稿纸常常被剪得像一个蜂窝。尽管如此，我们还有对付的办法。听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这类被审稿件的原件，倒是国民党当局铁的历史罪证了。



在我们夜班编辑室里，经常要研究送审的时机，审回来稿件的取舍。譬如说，那些字眼最受忌讳，换个什么代用词来解决？被无理删改的字句何者要留，何者遵检？都要一一盘算。特别是整篇被扣免登的，我们怎样处理？遵检、违检、开天窗，留标题等等，要分别情况采取对策。有时明知送审通不过而报纸又必须登载，那就根本不送审，例如193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的《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谈话里，鲜明地提出了我党对反共磨擦的严正态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新华日报》为违检登载这篇文章，遭到国民党当局强令停刊一天的处分，但政治上却是我们胜利了。1940年5月13日晚上，我和编国内版的同志看到一条报道河北灾情的消息，憋着一肚子对国民党当局的气，标了“衮衮诸公竟坐视”这么一个三栏大标题，这一下子气得新闻检查局的检查官哇哇叫，结果5月16日被勒令停刊一天。这件事与刊登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不同，为了这么一个标题而报纸被停刊一天，实在也只表示着我们当时的年轻气盛，并不高明。与此类似的事情，我记得还有一件，“皖南事变”后，报馆人员疏散，除夕之夜，我们编辑室的一位同志也要走了，我作了一首壮行诗送他。可是不过几天，我这首诗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不是非常幼稚而且太不警惕了吗？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新闻专制，抨击其暴行，我们还编发了一些古时特别是清初雍正乾隆时代的文字狱的史事，读者都能体味到文章的矛头所指，而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却莫之奈何。谈到这里，不能不使我想起为进步出版事业奋斗终生、当时正在重庆为反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进行搏斗的邹韬奋



同志。

韬奋同志与新闻检查官的斗争

邹韬奋同志对中国进步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他那完美的人格，都将永远留在新中国特别是从事图书出版事业的同志们的记忆里。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主持的生活书店和由他主编的《全民抗战》刊物，不断遭到国民党的摧残打击。韬奋同志是国民参政员，他在参政会内大声疾呼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新闻图书检查机关里，他也常常为争取救回被删扣的文章，与新闻检查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一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从重庆出走为止，他几乎以最大的精力在同国民党当局的摧残文化事业、钳制言论自由作不屈的战斗。

一个平时待人十分谦和诚恳的文弱书生，在同检查官作斗争时，显得那样雄辩而又英气勃勃，藐视反动势力如敝屣，使得对手狼狽窘困无以复加的，我特别推重二个人，一个是《新华日报》的章汉夫同志，一个就是邹韬奋同志。他们两人稍有不同的是，韬奋同志比较严肃，一字一句都理正辞严，使得对方无言可对；汉夫同志有时多一点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里摘录一段韬奋同志与检查官的对话。《全民抗战》有一篇评论法国政府投降纳粹的文章，最精彩的内容是揭露法国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和统治地位，害怕人民革命，献媚纳粹，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丑态。送审时，新闻检查官恰恰把这最重要的段落删掉了，因此韬奋同志亲自登门“讲理”：



邹：要求说明那篇文章被删的理由。

检查官：文章里面有“阶级”的字样，很不妥当。

邹：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有资产阶级为世所公认，为何不可用“阶级”两字？

检查官语塞，仍说：最好不要用！

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也不讳言外国有资本家。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为什么三民主义的发展到今天，作家提到法国的资产阶级，都有人发抖，这是什么道理？

检查官：（经入内请示后）那篇文章指法国迅速投降是由于要镇压国内革命，要保全财产，是有意暗射中国的情形，很不妥当。

邹：这是法国的事实，有什么不妥当？法国投降是事实，但是中国政府在领导抗战，为什么分析法国投降就是暗射中国情形？你的话实在侮辱政府，侮辱了整个中国人民！

检查官：（嗫嚅地）我们对于法国的失败，实在是应该同情的。

邹：我们对法国的失败应该同情，对法国的投降绝对不应该同情。只有中国的汉奸对法国投降才表示同情。

最后逼得黔驴技穷的检查官无言可对，只好认输。

韬奋同志就是这样高屋建瓴的在战斗。他面对的是一个横蛮反动透顶的政权，从根本上说是无理可讲的。在韬奋同志的面前，曾有这样的检查官凶横地叫嚷：“你和我讲理没有用，只有处于平等地位的彼此才可讲理。我是主管机关，我怎么说就得怎么办！”国民党当局还曾以封店捕人为恫吓，强要向



生活书店派“党代表”常驻监督。面对这些威胁，韬奋同志毅然决然地拒绝。生活书店50多个分支店，在韬奋同志愤而离渝之前几乎全部遭到封闭，好多无辜店员被捕。正如出走前夕韬奋同志所说：我愤怒得目瞪口呆，眠食俱废……在这种地狱似的凄惨环境中，再粉饰场面实在是莫大的罪恶！

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韬奋同志在重庆的战斗，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高大形象。

九

1940年6月初，周恩来同志由延安返回重庆，在重庆工作的同志们都感到分外高兴。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整整有一个年头。他在一年前回延安后不幸摔伤了手臂，转到苏联去治疗，回国后不久就从延安返回重庆，继续领导我们战斗。正在这个时候，一股对日投降妥协对内加紧反共的逆流在发展着。

在“皖南事变”的日子里

敌后的磨擦事件越来越多，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压也越来越猖獗，在1940年10月和1941年1月，先后以何应钦、白崇禧两个国民党军队的正副参谋长名义，发出了臭名昭著的“皓”电和“齐”电，限期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全部抗日军队开往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否则就是违抗“军令”和“政令”，气势汹汹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军部9000人北撤途中，受到国民党预先部署堵袭的大军围歼，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达到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



最高峰。在国民党心脏地区重庆，一场抗击反动横逆的紧张战斗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展开了。

我们得知新四军被袭击的消息是在《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纪念集会上，参加集会的周恩来同志刚刚收到一份电报，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份电报的内容很简单，事件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我们已经明白，形势很严峻了。周恩来同志勉励大家要坚定信心，勇敢战斗，他以会场上突然熄灭而后又恢复光明的电灯为例，强有力地讲：“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要到来！”此后，周恩来同志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急电制止袭击新四军北撤部队的军事行动；一面布置《新华日报》要用各种宣传手段，把国民党蓄意袭击在江南英勇作战的抗日部队的消息发布出去，以引起中外舆论的重视。《新华日报》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紧张地动员了起来，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下决心要排除各种艰难，打好这场宣传仗。

1月12日，即《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的第二天，我们就在报纸上透露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消息。但是，《新华日报》随后编写的所有的有关报道，统统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押。报馆四周山坳里和通往公路的小径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军警特务。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悍然发布命令和谈话，诬称新四军为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新四军番号撤销。国民党政府强令各报在第二天（18日）刊登这个乱命。乌云压城，寒流滚滚，《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从社长到报童全体动员，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激烈而又机智的斗争。

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奉令于1月17日晚派出大员，坐守在



《新华日报》。这位大员色厉内荏，他晓得要《新华日报》刊登那个乱命和谈话是不可能的，也不敢开口，而是宣称奉令来看看《新华日报》是否刊登了违检的新闻和言论，并表示要等到报纸印出来看完样张才回去复命。这位检查老爷本来还提出要到印报的地方亲眼看看，章汉夫同志对他说：报纸在防空洞中印刷，那里潮湿阴冷，场地狭小没有坐处，空气也不好，还是请你坐在会客室里等着，待第一张报纸印出就送给你看，也许是这位检查老爷怕辛苦吧，也就同意了。我们的章汉夫同志在会客室里陪着他。这位检查老爷，受够了章汉夫同志的义正辞严的责问和冷嘲热讽，气焰扫地，狼狈得很，好不容易挨到天快大明，看完送给他的那张报纸，发现没有违检的新闻之后，讲了一通什么“国家大事不必多谈。总请你们原谅，希望大家都没事，对我好，对你们也好。”一派虚弱的腔调，认为可以放心回城去交差睡觉了，可是这天一清早在重庆街头发售的《新华日报》，在二三版赫然刊登了周恩来同志亲笔书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大块题字。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检查和封锁一齐破了产。这赫赫的25个闪光的大字，把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罪状永远刻在了耻辱柱上。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在坚决抗击国民党当局政治高压的同时，对新闻舆论界的同行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力争使他们在新闻报道中主持公道。我清楚地记得，1月17日那天夜晚漆黑如墨，潘梓年同志打一盏灯笼行走在崎岖的山径，我们到《新民报》、《新蜀报》、《商务日报》等报馆的编辑部，痛切说明“皖南事变”的经过，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和态度，向他们提出真诚的呼吁和希望。实践证明，反共不得



人心，在那个严重的时刻，民营报纸几乎没有一家去吹捧国民党的乱命。我们在重庆新闻界的统战工作，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政治反击，重庆地区的斗争在激化。根据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布置，我方人员陆续疏散，《新华日报》也走了不少人，留下来坚持到最后的，都作了坐牢甚至被杀头的准备，表现出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由于新闻检查的日益横蛮，《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但是，只要国共两党不宣告最后破裂，我们就要坚守住党在国统区这块唯一的公开舆论阵地。为了适应斗争环境，《新华日报》自2月1日起改出半张，报纸以启事的形式公开声明：“本报因奉命免登之稿件过多，难于安排，若勉强维持原有篇幅，既虚耗同人精力，更难副读者之雅望……”这也是一种抗议。报纸虽然减少了一半篇幅，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并不放松压迫，报纸上还是照样开天窗。我们想尽办法，在报道的字里行间或借助标题加以发挥，反映人民群众对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愤懑。3月参政会后，反共高潮被打退了，《新华日报》的进一步疏散计划没有实施，在艰苦的战斗中，《新华日报》的同志们锻炼成长。

新华日报馆里的生活

《新华日报》自武汉创刊时起，编辑部除陆诒同志是薪金制外，其他同志包括经理营业部门的干部都一律实行供给制，公家供给伙食，每月发少量的零用钱，从社长到一般干部大体上是过着一样的生活。印刷部的工人同志由于是报馆买下



一个印厂的物资，随之吸收的该厂的印刷工人，所以实行的是薪金制，但也是低薪金制免费供给伙食。如果生病吃药住院则全部由报馆负责。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可是很有保障，许多报馆的编采人员特别是工友，很羡慕我们实行的公家负责医疗费用这一点。在《新华日报》馆，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同志之间充满平等友爱和互相信赖的深挚感情。

我们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精神生活却相当丰富多彩。首先是学习空气很浓厚，从编辑、记者到行政人员和工人，按照不同的文化程度建立了几个学习小组，学理论、学政治、学外语、学文化。上课时的老师与学生，对业余活动时则成了一起打球或摆龙门阵的朋友，知识分子与工人真正打成了一片。在学习和日常工作、生活中，也有激烈的争论，也有对缺点错误的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都没有影响同志间的感情，而是加深了革命情谊。《新华日报》确实成为一座熔炉，虽然还不曾完全实现周恩来同志提出的“要成为多面手”的号召，但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这座熔炉里锤炼为有理想、有干劲、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战士，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新闻队伍就这样成长起来。

使人永远难以忘记的，还有那些真诚帮助我们的各界朋友。这样的朋友真是不可胜计。我记得，当时在重庆的黄鼎臣、薛映晖、左昂等几位医生，给《新华日报》的同志看病不收诊金，连贵重的药品也免费。我们报纸上有一个《社会服务》专栏，很受读者欢迎，这个专栏里的“医药问答”方面的稿件，多半是这几位医生提供的。为了打破国民党在纸张供应方面对我们的封锁，《新华日报》办起了纸张供应基地，总



经理熊瑾珥同志主持其事，他在进行经济方面的活动中，得到了许多当地朋友的切实支持。我们有律师义务为报社作法律顾问。我们在紧急疏散时，不少朋友帮助解决交通等方面的困难……。我常常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认识朋友的可贵，而当他忘记了朋友时，他实际上也就忘记了革命。

《新华日报》每年都举行一次创刊纪念活动，一方面，在此之前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在这一天总结工作并提出改进的办法；另一方面，像招待亲戚一样在化龙桥报馆住地招待平日支持我们工作的朋友。最近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我国著名林学家、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长梁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当年，梁希先生就是在重庆《新华日报》过他的60岁生日，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了这次活动。梁老是参加过同盟会的老革命家，他在重庆接触了《新华日报》及其工作人员后，很受感动和启发，从而走上新的历史道路。像梁老这样的知识分子朋友，是不少的。重庆《新华日报》那艰苦的生活，火红的战斗，令人神往。

浓雾中的话剧之花

1941年至1942年冬春之交，国际形势有很大变化。在欧洲，苏德战争爆发而且战事激烈；在东方，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全球反法西斯战线已经形成，中国抗战坚持到这时候，可以说形势异常有利了。然而重庆的政治空气依旧是死气沉沉，加上物价飞涨，大家生活在多雾的山城，感到十分压抑。这个时候，为纪念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25周年举行了话剧公演，郭老的诗剧《棠棣之花》首演成功，像一枝奇葩，透过浓重的迷雾，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张瑞芳、舒



绣文的表演十分出色，两周连演八场，观众踊跃，盛况空前。紧接着，郭老又写出了历史剧《屈原》和《虎符》。1942年3月，《屈原》一剧由金山、白杨等演出，顿时轰动山城。一曲《雷电颂》，抒发了观众积郁在胸中的政治愤懑，山城街头，常有热血青年大声朗诵：“你爆炸了吧！爆炸了吧！”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下令禁演。然而文化战线上的这场斗争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笔。郭老的史剧有如他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都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当时，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新华日报》出版郭老史剧的评论专刊，亲自组织人撰写评论并修改稿件，这桩桩件件的事实，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党的领导者如何领导文艺创作，领导报纸工作的光辉榜样。而郭老对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是那样尊重，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敬爱，这种伟大的战斗友谊将成为千古佳话。

八年抗战时的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仍然如十年内战时的上海一样，占着绝对的优势，国民党费尽心力拿出的陈铨的《野玫瑰》之类的货色，是不足以同进步文化匹敌的。对于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应当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可喜的是，现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

十

《新华日报》创刊之初，确实有点像书生办报的样子，编辑部的主要工作人员都缺乏办报经验，又碰上王明的种种干扰。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这样一张公开在全国发行的大型党报是空前的大事，但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对整风



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的评语，完全可以用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华日报》：这还是一份不成熟、“不完全”的党报。

《新华日报》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依我看，1938年1月创刊到当年10月迁往重庆，是它的幼年时期；从重庆出版到1942年整风改版，是它在两次反共高潮的激烈战斗中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战斗的锻炼成长时期；而从整风改版以后则走上成熟时期。无论在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方面、还是在报纸宣传业务和版面编排上，整风改版后都有明显的进步，开始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在后来，特别是在1944年以后声势宏大的民主运动中，在反对蒋介石推行内战，卖国、独裁的激烈斗争中，《新华日报》真正成了“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实现了周恩来同志平日所期望的“要起一个方面军的作用”的战斗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

1942年春，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改版，使《解放日报》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同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改造党报的通知。毛泽东同志亲自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除了谈到《新华日报》发表的张申府的文章，《解放日报》已经转载，并认为张申府提出的“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电报特别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加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等等，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和这个指示，为《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指明了方向。



《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1942年初开始紧张准备的，周恩来同志多次到报社来作整风报告，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和大家一起检查和讨论改进报纸工作的办法。5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整风改版征求批评的社论，第二次又以显著版而刊登了《本报特别启事》，列举八个方面征求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9月18日，《新华日报》正式改版。在准备改版的过程中，还认真研究了英、美、法等国共产党的党报和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博采众家之长。

整风改版确实起了明显的作用，这首先是在办报的主要同志的头脑里，比较彻底地清理了王明对报纸工作曾经起过的恶劣影响，也比较认真地、联系实际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说的这个联系实际的学习，是包括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在1943年从延安发来的对《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所犯宣传上丧失立场和某些思想错误的批评在内的。董必武同志当时曾亲自领导报社进一步作了工作检查，并召开有关人员的座谈会，对某些同志的思想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经过整风学习和改版，《新华日报》言论的思想性、战斗性增强了，冗长空泛的文章减少了；报道解放区的新闻编写得更系统更有针对性；开拓了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来源，党报比较好地解决了替别家通讯社办报的严重缺点，显示出自己的鲜明特色。新闻和言论的文风也更加口语化群众化，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此外，从改版第一天开始创办的《新华副刊》，非常受读者欢迎。今天来看，也仍然可以说是民主革命时期党报副刊中办得最好的一种。它的作者、编者很多都是第一流的。



改版以后，增设了《团结》副刊，周恩来同志为它写了发刊词《〈团结〉的旨趣》。这是一个专门以党员和非党的革命同志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刊。周恩来同志写的发刊词，还彻底地阐明了整风和报纸改版的重要意义。《友声》专栏是专门登载朋友们的言论的，经过整风改版，写作的人和所论的方面都比以前更广更受读者的重视了。一向拥有广大读者的《青年生活》、《妇女之路》两个专刊也办得更有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辟了《读者园地》，使广大劳动人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有一个“申诉自己的遭遇和痛苦的说话场所”（这是当年征求读者意见时读者强烈要求的原话）。

总之，《新华日报》经过整风改版，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了。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压迫也难以遮没它发出的光彩。《新华日报》的言论，包括国际述评，都引起各国通讯社的重视。

详细述说当年整风改版的情况，当然不是本文所许可的。这里引用一段1942年9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中的话作为结束。社论在列举了报社工作中的缺点之后指出：

“总之，我们还没有使报纸充分具有中共党报的品质，人民大众喉舌的作用，虽然环境的困难，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主观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

今后怎么办呢？其主要方向是要使报纸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使《新华日报》真正做到不仅是中共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的报纸。举凡抗日党派、团体和人民有关团结抗战进步的主张和办法，我们当尽量予以登载。对于阻碍抗建大业言论和行动，当予



以严格批评，而对斥敌诛奸，更不给以丝毫宽假。”

改革后的《新华日报》，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的方向前进着。

报社人才最兴盛的时期

在9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的干部流动不少，但领导干部基本没有变化。“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报社实行了大疏散，这是为了应变，按照周恩来同志拟定的最后留下坚持的，只有社长潘梓年和编辑部的两个党员干部，其他绝大部分干部都要陆续撤离。在那个十分悲壮的时刻，在一灯如豆的编辑室的深夜，我曾为一位第二天即将离渝的编辑同志写下一首壮行诗，后来刊登在《新华日报》副刊上。

赠 别

莫道深情如醉，
除夕却逢离别。
云山万里，
何处是甜乡乐？
夜正黑，
但长虹在手，
壮志不灭。
看中华儿女斩荆棘，
热血头颅抛掷处，
旭日东升急。



待重逢，
共饮三百杯，
试比谁英杰。

由于党中央发动了猛烈的政治反击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迫使国民党当局把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缓下来。报社最后撤退的计划没有实行，结果是留下了80个人。这是《新华日报》人数最少的时期。

1942年2月，报纸由日出半张恢复到出版全张。这时前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疏散到香港、缅甸等地的夏衍、张友渔、胡绳、戈宝权、徐迈进、陆诒以及乔冠华、李普等相继回到重庆。除夏衍、张友渔仍不用报社工作人员名义在报馆外活动外，其他同志都回到了报社。到了1943年以后，从桂林、云南等地来了一批骨干如廖沫沙等，又从延安派来了林默涵、刘白羽、周而复、李亚群等人，从四川省地方党组织派来了孙敬文以及成都燕京大学毕业生李慎之和谢韬等人，加上坚持在报社工作的章汉夫、许涤新、熊复等几十个编辑部的干部（吴克坚、杨放之同志已于1942年、1943年相继离开报馆去延安），编辑队伍就相当强大了。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委、外事、青年、妇女各组对《新华日报》直接支持的人力还未计算在内。

报纸有了正确的办报方针和党的坚强领导，又有这么一批得力的干部，因而在1944年后的民主运动猛烈发展时期，真是如鱼得水，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威力，当年脍炙人口的《新华副刊》、《国际述评》以及博得好评的国内外新闻的编采和版面安排，都是与这些同志的辛劳和才干分不开的。



1945年底和1946年初，《新华日报》正在准备派出大批干部到上海去办总馆，到南京出版《新华日报》，把重庆的报纸变为中共四川省委的机关报，党为重庆《新华日报》又补充了一批得力干部。这期间，报社领导发起了全社各部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报纸的活动，以迎接新形势下党报宣传任务。时间已经过去三十五、六年，当我在重庆红岩纪念馆重睹保存下来的几份检查总结工作的发言稿时，不禁心绪万端。那残存的发言稿，记录着当年那些二十几岁的青年天不怕，地不怕，满腔热情，永不满足，无情批评报纸工作中缺点的无畏精神和大胆创新的干劲。那生动的语言，实在令人感动。

在反动势力压迫下战斗，在周恩来同志的长期直接领导下成长，《新华日报》同人开创了自己的办报风格，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办报经验。这些经验如今尚有哪些值得吸取，这就有待于研究党报史的同志们去认真发掘了。

毛泽东同志赞小报童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工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舞台上塑造了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当时风靡海内的要算是话剧（后来改编为电影）的《报童》。我想，这不是偶然的。这几年来，我在与当年曾在重庆工作和生活过的党内外老同志老朋友的接触中，常听到他们深情地谈到《新华日报》的报童。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同志和原重庆《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同志都曾对我说过：“我那时天天都能看到《新华日报》，可是至今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送来的报纸，你们的报童真是了不起！”这确实不是溢美之词。



国民党最高当局曾做出对《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卖”的决定，“皖南事变”期间，又以重金收买了重庆派报工会头子邓发清，唆使他拒绝派售《新华日报》。为了冲破国民党在发行上对《新华日报》的严密封锁，报社在原有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发行队伍基础上，招收了一批年龄在十几岁的报童。这些报童都出身于贫苦之家，有的流落街头，小小年纪就饱受人世辛酸。他们来到《新华日报》，看到这里人们吃一样的伙食，过一样的清苦生活，无论是“先生”还是工友，都平等相处，亲密相待，这些切身感受，比许多空洞道理更使他们受到教育和感动。他们在党的温暖怀抱里成长起来了。慈父一样的熊老板（熊瑾玎）和营业部的同志们，为培养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发行队伍，倾注了最多的心血。

重庆是有名的“火炉子”，盛夏三伏溽暑难耐，而这些报童就在暑热熏蒸里奔波于山城和市郊的大街小巷，到了冬天，气候阴冷，报童们又常常顶着启明星，披一身霜花，去为读者送报。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对报童们说来，几乎算不了什么。困难的是，他们天天要对付特务、警察、流氓的恐吓殴打。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报童被特务打得满脸是血，摔倒在一个深沟里，他爬上来照样和特务据理抗争。事后，我们在报上公布了这一事实，读者纷纷谴责特务暴行，向报童表示慰问和支持。有的报童被抓到国民党警察局，面对威胁利诱，不为所动。连国民党军统特务都在暗地里说：“《新华日报》的人骨头最硬！”

那年月，《新华日报》的读者是要上“黑名单”的，有的人想看报又不敢订报。报童们就想出许多办法保护读者，比如按事先约定的地点把报纸悄悄送去，再由读者自己取走。有



时负责这条送报路线的报童换人了，读者照样能按时收到报纸，却不知报童易人。时间长了，读者和报童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甚至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报童，委托他们代购物品，而报童都能做到货钱分厘不差。读者热情关心报童，保护报童，常常有读者来通报我们的报童被打、被抓的消息。有的读者给我们写来稿件，不便邮寄，就委托报童捎带。报社印发了秘密的小册子或传单，也都由报童采取巧妙的办法送到读者中去。可以说，报童不但是发行战线的尖兵，也是机动可靠的小交通。

1945年1月，在我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影响下，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拥护我党主张。《新华日报》刊登了这篇宣言，在重庆引起轰动。国民党到处派人扣报，可报童们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当天报纸发行任务。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很快知道了这场斗争的情况，怀着欣喜的心情，赞扬了《新华日报》。当年八九月，毛泽东同志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特地来到《新华日报》在民生路的营业部，与在那里的报童亲切会见。报童们见到自己敬仰的领袖，真是欢喜若狂，一个小家伙竟一连三次和毛主席握手。

1980年我去成都、重庆访问，和这些报童相聚。他们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想，应该感谢那些辛勤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塑造了《新华日报》报童这一闪射光辉的形象。我还想到，在修撰《新华日报》史和党的报刊史时，也不能忘记为报童们大书一笔。



十一

1944年是我国民主运动剧烈发展的一年。作为它的背景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东半球或西半球的战场上，同盟国都取得了辉煌胜利，法西斯三巨头之一的墨索里尼已经垮台了，太平洋上的战争日益接近印度支那半岛。恰恰在这个时候，日寇为了保住它的大陆运输线，发起了一次战役进攻。结果是蒋介石的部队一触即溃，连失洛阳、郑州，又失长沙、衡阳，到当年年底，日寇再占桂林、南宁，国民党军队更是望风而逃，日军深入贵州独山，连重庆也为之震动。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再一次令爱国人士大大失望。而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却顽强地抗击着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中共的国际国内威信更加提高了。作为标志的是，当年4月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参观，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也于是年11月访问延安。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大后方人民纷纷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中共中央的代表林伯渠同志9月间在参政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很快成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包括国际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重庆的民主运动，随着1945年初胡世合惨案的斗争，已经深入到工人、市民中去、成为广大的群众性运动。由于时局的急剧发展，到了8月，苏军对日宣战，日本宣告投降，就迎来了一个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新局面。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



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的宣传报道

毛泽东同志于1945年8月28日由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山城轰动，举国瞩目，全世界都在注意从这里传出的重大信息。关于重庆谈判的种种情况已多有记述，我这里只就《新华日报》当年的宣传报道作一点回忆。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创办的政治机关报，在亿万人民敬仰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到达重庆谈判之际，究竟应该怎样宣传？《新华日报》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采取了在版面上不直接多用笔墨，不用重彩渲染的报道方法。因此，有关毛泽东同志在渝期间的活动，除掉到达那一天的号外和参加中苏文化协会酒会活动的生动特写外，一般对毛泽东同志会客、拜访乃至两党代表谈判情况，都只采取简洁的类似新闻公报的报道形式。报纸运用的是周恩来同志早就提出过的那种“烘托式”的宣传方式。所谓“烘托式”的宣传，据我的理解就是不由报社写大块文章歌颂毛泽东同志，而是大量刊发读者投书，表达人民群众欢迎毛泽东来渝，希望和平真正实现的共同心愿；或者发表读者（包括海外读者）向毛泽东表示深挚爱戴和良好祝愿的文字；报道国统区各界有的寄来药品，有的捐助非常有限的金钱，表示对党的领袖对解放区军民的敬意等方面的花絮；在副刊上发表一些颂扬毛泽东同志的短小诗文，等等。总之，所占篇幅都不大，但版面编排十分精心而又不虚张声势，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不要看轻了这些短小的报道、来信和诗文，字里行间都是充满了广大读者的赤诚期望和爱戴。

不在版面上大规模地宣传报道毛泽东同志本人和他在重庆的言行，而只是在有限的新闻中，表达毛泽东同志对国内



和平的热烈追求与信心，这样的宣传取得了好效果。中国人民是务实的，他们首先要看事实。这一点周恩来同志说得最透辟：宣传工作要做好，第一位的就是事实的真实。抗战胜利后人民群众最盼望的是和平、民主、团结。蒋介石在落后的人民群众中也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毅然来到重庆，应邀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一事实本身就最有力地证明了中共的和平诚意，证明了中共的相忍为国。这就是最有力的宣传。难怪毛泽东同志一到重庆，国民党顽固派长期散播的什么中共蓄意发动内战之类的谣言，顿时全部破产。

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不论是同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会面，还是回答记者问题，最引人关注的话就是“和为贵”！给人以全力以赴为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顾全大局，力争和谈成功的突出印象。他在张治中部长代表政府举行的欢迎会上高呼“和为贵”！他在与左派代表人物民主同盟的领袖之一沈钧儒谈话时，针对沈衡老感到国民党顽固派缺乏诚意，生怕中共上当受骗的忧虑心情，以风趣的语言说：这次谈判有如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这不是一开头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哪有办一件事，一开头就有一半把握的，可见谈判一定成功！（大意）路透社记者曾向毛泽东同志提问：“假如谈判破裂时……？”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毛泽东同志在重庆都是用这样斩钉截铁的语气象讲话而且在报纸上公布的。以毛泽东同志的身份在重庆发表这些讲话。使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家避免内战实现和平与民主的诚意大大昭示于天下，赢得了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而从另一方面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形势始终有充分的估计，没



有像陈独秀一跤跌在国共合作的单相思里，他在对党政军人员作报告时，则强调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高明所在。

《新华日报》对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的宣传报道所用笔墨虽不多，但毛泽东同志到重庆的政治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到后来，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全面内战，公正的人民群众都清楚地确认，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身上。我写到这里，想起50年代到苏联参观访问时，苏方曾一本正经地讲了一通“领袖宣传”的重要意义，回顾我们自己经历的种种，真有些感慨系之。我感到，如果说对领袖的宣传真的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的话，那么恐怕事实还是最重要的。一切华丽辞藻都是苍白无力的。

较场口事件与记者的抗争

1946年1月底，政治协商会议宣告胜利闭幕。2月10日，重庆妇女联谊会、青年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多个群众团体联合发起“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这个大会在当天上午9点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这天正当大批队伍举着团体机关的旗帜和彩旗进入会场，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预伏在台上台下的国民党暴徒一哄而起，抢当主席，抢先宣布开会，散发传单，直至大打出手。会场的指挥李公朴先生被暴徒打伤，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施复亮等去劝阻时也被打得很厉害；在台下，暴徒拿出铁石凶器逢人就打。等到周恩来同志赶到时，会场已乱成一片，许多参加庆祝会的群众队伍纷纷被迫离开。较场口暴行，是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政协会议决议的铁证，也是一场人民群众争民主争人权的斗



争。这起暴行本已引起群众激愤，而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的有关报道又颠倒黑白、血口诬人，更使重庆正直的新闻界首先是当场目击事件的记者们愤愤不平。这就引出了一场与国民党舆论机关的笔战和发公开责问信的斗争。

国民党蓄谋干了破坏较场口庆祝大会的勾当之后，又通过中央通讯社编造什么“大会推举”国民党御用的“市农会刘野樵为主席”，后来由于李公朴等人的捣乱而发生了“民众互相殴打”等谰言，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第二天(11日)重庆9家报纸的数10名记者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大家对中央社的歪曲报道非常愤慨，对被暴徒打伤的《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大公报》记者高学造等同人表示亲切慰问。会上一致同意公开揭露国民党中央社的歪曲报道，当场推举几位同人起草责问中央社的公开信，并决定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一定要使这一公开信的全文或摘要在自己所属的报纸上发表。这个登报的要求是要得罪庞然大物的“中央社”的，任务十分艰难。记者为争取在本报刊登这封公开信，展开了困难的斗争，有的甚至采取刊登广告的方式，终于使这封公开信在报纸上与读者见面，因而这封信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场斗争中，《新华日报》走在最前面，与《中央日报》进行了公开论战。这场斗争最后发展到重庆221位新闻从业人员联名提出《保障人权、忠实报道》的意见书，于2月17日公开见报，使国民党当局狼狽不堪，《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再也无力狡辩。

在这场斗争中，平日与《新华日报》记者接近的重庆进步记者是核心人物。重庆新闻记者之间从1944年起，逐步建立起互相交换新闻、互相支持的友好关系，在胡世合惨案发生



时，曾经成功地互相配合，在宣传报道上狠狠打击了法西斯特务势力。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时，新闻界的统一战线在广泛程度和斗争纵深上都有了显著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新闻记者之间是一种冷酷的竞争关系，而在重庆，经过我们党的努力，各报各通讯社记者之间在一定的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却建立起在新闻工作上互相支持的关系，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新鲜经验。写到这里，我特别想到《新民报》采访主任，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同志，她在这一斗争中是那样的刚强坚定。我也永远怀念当年奋斗在一起的42位新闻战士。

震惊山城的“二·二二”血案

较场口事件一波未平，紧接着发生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暴徒捣毁，工作人员被殴伤的流血事件。

1946年2月11日，正值苏、美、英三国巨头举行的雅尔达会议一周年，当时在美国继罗斯福任总统的杜鲁门的要求下，三国同时公布了过去尚未公开的雅尔达会议的协议。为了争取苏联在打败德国以后参加对日作战，这个协议中有若干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有关条款已由国民党政府外长宋子文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同盟条约中全部接受了，只是中国人民还不知其详。这次新闻一发表，再加上《大公报》的煽风点火，自然引起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

本来这件事应该由国民党政府出来向人民讲清楚，要求人民谅解。而实际却不然，国民党坐视一部分学生、知识分子起来进行反苏游行，并乘机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正是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诚实面目。事情不仅如此，为了加剧



反苏反共，破坏刚刚胜利结束的政协会议和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事件，当2月22日1万余人的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20分钟后，潜伏在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附近的特务暴徒百余人蜂拥而上，用石块投击《新华日报》门市部的玻璃窗，闯入行凶，将一至四楼的所有书报、家具、职工衣物统统捣毁、掠走，把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工作人员徐君曼、管佑民等打得头破血流。

暴行发生时，我正赶到营业部门前，目击特务行凶。被殴伤甚重的杨黎原同志，在被送往医院途中还一再询问其他同志的安全和伤势。徐君曼同志血流满面仍然挺立在大门口不为所屈。我曾一再与附近的公安人员交涉，可是警方推诿搪塞，采取令人难以容忍的敷衍态度，根本不愿有所行动。事前一日，我们还风闻有发生骚乱的可能，马上要求军警机关依法保护，可是临到血案发生，暴徒行凶达2小时，国民党当局竟袖手坐视。

反苏、反共、捣毁《新华日报》，对这伙反动家伙来说，当然是兴高采烈，又可以像较场口事件那样，去摆庆功宴席，领取奖金。然而这暴行却使更多的人清醒起来，认识到不能陶醉在政协会议成功、全国停止了内战枪声的欢喜里，反动势力永远不会甘心于人民民主的胜利，他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破坏！

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议，到会有40余位中外记者。先由我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暴徒行凶、军警坐视等情况作了报告，周恩来同志接着发表了非常深刻有力的讲话，并对国民党治安当局提出了严正要求。周恩来同志鉴于国民党特务暴徒是利用雅尔达



协议公布的机会煽动暴行的，所以他特别就爱国与排外为题，透彻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坚决赞成爱国，要求民族独立，但是不赞成排外的道理。他还深刻地谈到，要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务的阴谋加以区别；要把国民党政府中支持政协会议的与那些不满政协会议，挑起严重事端，想取消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区分开。他的这些透彻而又含情合理的谈话，使很多记者为之动容。

在爱国与排外这个问题上，有时确实会产生很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国，我们的民族曾经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百年屈辱，人民有强烈的爱国赤诚、民族义愤，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可是在某些复杂形势下，稍一不慎就容易发生错觉甚至上当受骗。在抗战时期，曾两次碰到这样的事：一次是上面讲的，另一次是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的时候，在大后方有些人，甚至包括左派中一些人也由于政治目光短限，或受到CC派的种种挑拨，对苏联非常不满。那时也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去向许多朋友做工作，指出他们上了国民党的当。左派的一些朋友经过说服，很快就觉悟了，其他的人后来受到事实的教育也有了改变。经过这两次教训以后，每当我碰到这类比较复杂的情况时，脑际常常浮起周恩来同志那谆谆善诱、善于作思想工作的平易近人的形象来。

（原载上海《新闻记者》1983—1984，7期）。



峥嵘岁月

——《新华日报》生活的回忆

去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给我来信，信里说：“去年四月份我们去京组织《新华日报的回忆》书稿，您当时有病，在南京休养，未能拜访。最近从北京来的同志说：您已回京，病好些了，因此我们请您也写一篇。原《新华日报》的领导同志大都已写文章，很多同志提到您，恳请您一定写。”

编辑同志的热情，令人感动。在我家的书架上，有着一本1959年原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回忆》，这是劫后幸存下来的。书的扉页上有熊瑾玎同志的几行亲笔字：“重庆人民出版社准备继续出第二辑，我寄赠你们这本书，是希望在第二辑上看到你们的文章。”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尊敬的熊老早已离开了我们。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给予它的一场浩劫，我既未能写出回忆文章，而《新华日报的回忆》第二辑也终于没有出版。

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了《新华日报的回忆》，现在又要出版《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面对着亡故老战友当年的期望和新的催稿信件，都使我感到应该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一闪耀着党的光辉的新闻事业。我重读着许多同志写



的回忆文章，一幕幕往事，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沉浮在我的脑际。不禁使我沉浸在往昔火热斗争的回忆里。许多事情，别的同志已经说了，我就不再多写，只能就几件其他同志谈得还不多的事情，来说一说。

—

我参加《新华日报》的战斗行列，是在武汉筹备的初期。《新华日报》在武汉，从筹备、出版到撤退，先后不到一年时间。这可说是它的幼年时期。

当时，参加《新华日报》创办工作的一批主要骨干，多数是经党中央交涉而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他们和其他同志，都没有办过报。编报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计划。当时大家在汉口大陆里一座小楼上，每天编稿子，写稿子，从傍晚编起，常常到了天亮，还没有发完稿子，排版总要拼到红日三竿。每版又总要留下大半版新闻，排了没有用。报馆的印刷厂，是刚刚买下来的一家小印刷厂，工人同志都是随厂过来参加《新华日报》工作的，并不熟悉共产党。出版还不到一周，国民党当局就唆使特务流氓来捣毁报馆的印刷厂，我们又要回击国民党的破坏。总之，创办初期，碰到的困难确实是不不少的。

《新华日报》是一个革命的熔炉。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没有多久，编辑部门，经理、发行部门，印刷部门的同志，很快就学会了检查和改进工作的办法。编辑同志和工人同志打成了一片，工人同志也发现这批编辑不像他们过去见过的那种盛气凌人的“编辑老爷”。印刷工人中培养出了第



一批共产党员。整个报馆渐渐就成为一个同心同德的战斗集体。

可是在武汉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的领导却被王明所控制。王明的领导作风完全是家长式的，架子大，盛气凌人，常常抓住一点差错，一骂就是半天。当时报馆的主要干部，从社长、总编辑、总经理起，对王明的作风都很反感。工作之余，大家谈论也很多，很不满王明那种浮夸的、好出风头的作风。那时，王明经常要发表谈话或文章，每次都耍报纸把它登在显显著的地方，还要登上他的照片。署名忽儿是王明(陈绍禹)，忽儿又是陈绍禹(王明)，也很不合中国人的口味。王明的老婆孟庆树，老爱跟在宋美龄的屁股后面，参加一些上层的妇女界座谈会、茶话会，每参加一次，同样要报纸在显著的地方登载出来，标题还要突出，稍不满意，王明那里的训斥电话就来了。平时，王明借故把报馆一些同志找去训斥的次数也很多。其结果，除了增加大家对他的作风厌恶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他每次把报馆主要同志找去痛骂时，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共长江局其他负责人参加，这也可以看出他的独断和专横。

由于《新华日报》的同志对他的作风不满，他就企图将这些不那么听话的主要干部全部排斥出去。他曾经决定并且实行了将报馆主要干部派往战区当战地记者的计划。章汉夫同志被派往河南第一战区当战地记者，何云同志被派往华北敌后，还有五、六个主要编辑干部，同一时期被派往大江南北各战区。连潘梓年同志也内定要调回延安。王明想大换班的用心是很清楚的。幸而党中央这时已发现了王明的政治错误，责令他离开长江局的领导岗位，他的罪恶用心才受到制



止。

现在回顾起来，王明的错误领导使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受到极坏的影响。报上发表过不少王明的右倾言论。我们的同志对王明的作风不是没有意见，相反意见还很大，而有些同志屡次受到王明责备，王明还企图将他们排斥掉。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大家的政治水平不高，还不能从政治路线上认识王明的严重错误。这个教训，直到重庆时期，在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其他同志的领导下，学习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之后，才逐渐明确起来。这使我们在重庆的工作和学习，特别是在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能够做得更认真些，更正确些。

二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出版。这时，国民党当局将它的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客观环境越来越险恶了。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种种无耻的、残暴的手段，并不能使《新华日报》减损自己的光辉；相反地，越经种种艰苦的斗争，《新华日报》却更加屹立在国统区广大群众的心头，成为他们前进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

令人特别难忘的是，《新华日报》的同志在同国民党斗争时，发扬的那种高屋建瓴，堂堂正正，压倒一切反动势力的英雄气概，和国民党貌似强大、装腔作势而内心空虚、软弱无力、处处被动的精神状态，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这里举几件事为例，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发出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和下令向新四军进攻的反动命令。《新华日报》必须用一切办法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这时，周恩来同志悲愤地亲笔书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准备在《新华日报》上刊出。就在这天夜间，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一个30来岁的检查官来到了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坐等检查第二天报纸的内容。《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同志自始至终在报馆的会客室陪着他。我当时是编辑部主任，还要发稿，布置战斗，不能整夜陪他，但也参加了一大段谈话。

双方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那个检查官点头哈腰地说：“我是奉命来的，目的是要求《新华日报》明天的报纸上，不要登载反政府的新闻和文章，希望你们体谅我的苦衷，明天报上没有什么事，大家都过得去，我也就好交差了。”

章汉夫同志态度沉着但义正词严地责问：“新四军是英勇抗日的军队，为什么政府军不守信义，对正在北撤的新四军突然发动围歼？你们作出这样亲痛仇快的事，居然还颠倒事实真相，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对我们送审的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稿也加以扣压，你们这样做，只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称赞。你们不让《新华日报》刊登事实真相的报道，道理何在？新闻自由权利在哪里？”

检查官支支吾吾地说：“国家大事嘛，我们也不必多谈。总请你们谅解，我希望明天大家都没事，对我好，对你们也好。”

章汉夫同志：“我看干这种事，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你过去在什么学校毕业？”

检查官：“燕京大学。”

章汉夫同志：“为什么干新闻检查官？”

检查官：“一个人总得有个职业嘛，我学过新闻。”

章汉夫同志：“你是个大学毕业生，看你年纪轻轻，什么事不能干？要去干这种很不名誉的差使。这对你有什么好？真替你惋惜！”

检查官涨红了脸，神态困惑地说：“唔，唔，啊，啊，哈哈，好说好看。”

章汉夫同志严正地警告他：“你们以为检扣了《新华日报》揭露围歼英勇抗日的新四军的真相的新闻，不准刊登，就可以一手遮天，人民就不会起来反对你们了吗？这绝对办不到的，我们明天的报纸上可以不登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但是这种倒行逆施的勾当如果不坚决制止，休想不受到惩罚。你们干的罪恶勾当，快要人神共愤了！”

检查官：“章先生，咱们是为了公事。我办完了就走，我无意来同你吵架。哈哈。至于说新四军嘛，不听中央军令，总是不对的吧！”

章汉夫同志又严正地反驳：“新四军奉我党中央命令北撤，有什么不对？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才下得了围歼一支抗日军队的命令。究竟要听什么命令？你说？”

检查官狼狈地说：“不谈这些了，章先生说明天报上不登‘免登’的新闻，那就好了。”

章汉夫同志：“我们明天一定不登揭露的新闻，但是你们也休想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就这样，我们说过的话算数。不登就一定不登，你走罢，半夜三更待在这山沟里干什么？”



检查官：“好，好，好！不登就好，大家都好。我再坐一下，等报纸印出来了再回去。”

章汉夫同志：“还不放心？共产党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检查官：“唉，唉，没有别的意思，职责所在嘛！”

章汉夫同志轻蔑地同他开玩笑：“你这样卖力，大概可以受奖升官了吧！”

检查官支支吾吾地说：“哦，哦，好说，好说。”

.....

.....

就这样，一时严肃，一时半开玩笑地同检查官周旋着。那个检查官一直是坐立不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狼狽万状，无法招架。那天的报纸，我们排了两种不同的版面，一种是印有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的，另一种是没有印这个题词，是为了应付那个检查官和密布在报馆外的军警特务的。他一看没有印题词的版面，就如释重负，溜之大吉。可是，就在他溜出不久，印有周恩来同志题词的《新华日报》已在大街小巷到处发卖了。

另一次，是国民党当局的要人陈诚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外记者坐了满满一屋子，《新华日报》记者也去了。陈诚走出来，点点头就开始讲起来，讲讲，话题就转到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谩骂方面来。一个跟班走上前去，在陈诚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陈诚的眼光马上投向在座的《新华日报》记者，嘴巴也非常不自然地改了口，把想骂未骂的话咽下肚去，改讲别的了。为什么一个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见到一个《新华日报》记者，说话就要改口？原因无它，就是由于国民党政



府总是色厉内荏，心虚得很，非常害怕被《新华日报》记者当场责问，使他下不了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当局派的内心是多么虚弱！

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却有另一种特色：我们对代表国民党当局的错误言论，只要是理论性的，属于研究探讨的问题，总是采取说明我们观点的讲道理的方法；国民党的御用学者却相反，他们手中缺乏真理，只能采取武断或破口大骂的办法，结果很快在群众中丧失影响。记得有一次，一个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北进还是南进的座谈会正在举行，国民党反动学者，自称为“日本问题权威”的龚德柏，又在夸夸其谈，大讲日本一定要北进。这个人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他的住地附近遭受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他就说日本飞机是奉命特地来炸他的住宅的，来显示他这个“日本问题权威”如何被日本看成重大威胁。在那次座谈会上，他不仅说日本军队一定北进，而且连哪年哪月哪日都给算出来了，说如果不灵验，愿意赌头。这种无聊透顶的把戏，只能说明国民党理论的空虚无聊。《新华日报》的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可能南进。这一下，可大大触怒了这个“权威”，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跳起来破口大骂共产党。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他越破口大骂，就越显得中国共产党说理精神的可敬，也越在会上暴露出他骄横无理的可耻面目。表面上的张牙舞爪，恰恰是反动势力内心虚弱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正因为真理完全在我们手里，尽管身居虎口，国民党又进行着疯狂的破坏和摧残，但我们始终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朋友到处都是，而且越来越多。



我们一直有着一批知名与不知名的甘心同我们共患难的朋友，民主党派的朋友（除青年党头头少数人以外），在许多重大政治斗争中，与我们互相配合，共同斗争。《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关心而且经常宣传民主党派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的正确主张，使我们的党报增色不少。广大的知识分子中，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不能忘记，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大学任教的马寅初先生，公开斥责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震惊了整个山城。他那时就同《新华日报》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在沙坪坝大学区，每当《新华日报》创刊的纪念日，一些老教授亲自带来几斤猪肉，到化龙桥来祝贺。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更同《新华日报》结下了不解的文字姻缘。更不用说郭老了，他一直是《新华日报》的重要撰稿人。

当然，《新华日报》还有广大工人、农民、劳动者的朋友。报纸经常要刊登他们受迫害、受苦难的新闻报道。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新华日报》是他们最忠实的代言人，是他们权利的维护者。报纸上刊登的这方面的许多材料，往往是受迫害、要求伸张正义的工人、农民自己送来的。《新华日报》的“读者服务”也办得非常广泛灵活，团结了不少读者。从1943年以后，每年《新华日报》过生日，虎头岩下，贺客盈门。球场上演出陕北的秧歌剧，歌声、掌声、笑声，荡漾在整个山谷中，山坡上万头攒动，都是四周的邻居，真是热闹非凡。

就连国民党党政机关中也有不少倾向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职员，他们也是《新华日报》的朋友。通过在城里的《新华日报》采访部或营业部，他们经常公开或私下给我们一些记录反动政府倒行逆施或人民疾苦的材料。



在重庆新闻界的同行中，《新华日报》同样到处都有朋友。“皖南事变”发生时，报社领导人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连夜分头到各个报馆，向各不同政治色彩的民间报纸负责人进行争取工作。我们介绍了新四军奉命北撤被歼的事实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和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希望各报不登中央社当天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反动命令，或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办法来表示态度，伸张正义。对那些中间派的报纸来说，是一个最严重、也是最困难的抉择。因为采取任何一步行动，都需要冒政治风险，需要勇气。事后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果的，有的报纸就是没有刊登国民党发布的乱命。当然，多数报纸还是登了，但从版面、标题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他们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冷淡和不满。至于在一般记者中，我们的朋友就更多了，因为这些记者多数是知识分子，比起上层人物来，他们的包袱较少，正义感较多，只要我们平时多做工作，与他们的友谊就会不断发展，直到配合斗争的地步。1946年，著名的较场口事件发生后，40多个报纸记者，包括《扫荡报》的记者，一致愤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新闻报道，联名发表致中央通讯社的公开信，揭露它的丑态，忠实地介绍较场口事件的真相。参加签名的记者，负责回去向本报负责人交涉，将公开信全文或主要内容在本报发表，实在不允许发新闻的，至少也争取到在自己报纸上用广告形式登出来。《新华日报》登了新闻，还写了专文向国民党中央社提出质问。这是一场有声有色的胜利的斗争，搞得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狼狈不堪。

当我们回顾《新华日报》同国民党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



重庆时拥有众多的朋友的情况时，应该指出：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的具体贯彻中，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大家知道，我们党在一段历史中，对统一战线政策是有过错误的，尤其是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长期没有正确解决。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无论解放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顽固派陷于孤立。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我党一笔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和发掘。

三

至于报馆内部，同志们在那艰难岁月中，生气勃勃，团结友爱，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情谊的生活，回忆起来，至今依然令人神往。

《新华日报》馆地址在重庆市郊化龙桥的虎头岩下，隔一个山坡，就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就是中共南方局所在的红岩，加上城里周恩来公馆的曾家岩，这“三岩”，全在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军警的严密包围监视之中。

《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经济十分困难，每天只能吃素菜淡饭。报馆的同志，除一部分工人同志每月发给很少一点薪金外，一般干部从上到下都只领一点生活津贴。尽管生活很苦，大家毫不在乎，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每当工作之余，学习会，歌咏队，篮、排球运动，墙报，下棋，各种活动非常活跃。逢到过节，还要演出话剧。后来生活改善了一点，办起



了小卖部，同志们业余有暇，可以花一点钱，去吃一碗面，肯多花点钱的，可以加一个鸡蛋，一杯大曲，一碟小菜，就可以摆起龙门阵来。在各种活动中，报馆各部门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都融合成一片，没有任何门户界限。

每当要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迫害，组织上号召进行一场斗争时，《新华日报》每一个部门的每一个同志，都是聚精会神地战斗如一人。而各级领导干部，也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大家从上到下怀着一个信念：坚决完成任务；一个意志：一定要战胜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一定要压倒他们的嚣张气焰，而决不被反动势力所压倒。

在“皖南事变”后紧急疏散的日子里，很多同志一个个离开报馆，荫蔽地离开重庆去投入新的战斗。当时编辑部的同志有好几个要走了，为了安全，谁走，什么时候走，事先都不宣扬。可是，当同志们知道要分手了，在共同编完最后一天的报纸后，走的和留的同志无限激情地赋诗言别：“待他年胜利重逢时，试比谁英杰！”真是壮志凌云！

《新华日报》的同志不仅政治上是坚强的，文化学习上也是任何别的报馆所不能比拟的。很多青年工人，贫苦农家的孩子，一进入报馆，就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分子也乐于做他们的教员。墙报上很快出现青年工人的诗篇。不仅这样，在业务上，《新华日报》比任何报纸排得快，出得早。同行比赛，《新华日报》总是第一名，而我们的设备又是最简陋的，这不就是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统一的实例吗？

《新华日报》是一个革命的熔炉，它把不少来自不同地区的人锻炼成长。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报的光荣使命，而且也党培养了一批治政、治文、治军的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中，继续为人民作出贡献。有的以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去，但他们的正气长留天地间。

在我们回忆当年的《新华日报》时，还必然会想念到《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罗世文同志，到华北敌后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在一次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的何云同志，在新升隆轮船上遭受敌机轰炸而死难的潘美年等16位同志，以及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屠刀下的许多同志，他们都以自己的热血浇灌了这朵不朽的光彩夺目的鲜花。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新华日报》的好几位负责同志都已先后逝世了。有长者风度的潘老总（潘梓年社长），生活朴素，态度谦和，同群众打成一片，被大家热爱的熊老板（熊瑾玎总经理），终年乐观、开朗，为全馆同志的衣食和出报物资而操劳。还有工作认真，不知疲劳，对敌狠对己和的章汉夫总编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在为新中国尽了自己光荣责任后，同我们永别了。他们都是把自己全部心血洒在《新华日报》事业上的领导人。

令人不能忘怀的是，1946年的秋天，当重庆的《新华日报》还在艰苦奋斗的时候，南京和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可能性又被国民党顽固派完全扼杀了。那年10月，险像环生，又一次像“皖南事变”时那样情景，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亲自安排新闻干部的疏散。我从南京到了上海，在一个公寓里看到了潘梓年同志和章汉夫同志，接着又在上海筹备《新华日报》的地址看到了熊瑾玎同志和很多从重庆去的同志。他们筹建《新华日报》上海版的工作做得又快又好，可是环境已经不允许出版了。大家痛恨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的摧残。我还同他们一起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闻一多、李公朴的追悼



大会。这就是他们为《新华日报》工作的最后一刻。

当然，最不能令人忘怀的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对《新华日报》工作的亲切教导和长期领导。恩来同志的领导，是《新华日报》战士在狂风恶浪中顽强奋斗的力量源泉，是指引我们胜利克服一切困难的火炬。恩来同志的领导作风是：对于干部政治上抓得很紧，但工作上又非常放得开手。抓得紧，就是中央每一个重要指示，他都及时向我们传达解释，并且结合国统区实际，使我们对重大的政治形势经常保持清醒的认识，知道努力的方向。“皖南事变”后，环境险恶，他每周把我们找到红岩去学习党史，由他主讲。恩来同志那种对党忠诚和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一直令人景仰。放得开，就是报纸日常工作放手让大家去干，他从不在枝节问题上多加干预。因此，《新华日报》的工作是非常活跃的。可是一发现重要错误，他就认真抓住，严格地进行教育，从不马虎。他对于干部历来是十分爱护的。“皖南事变”时，他的案头放的是一批批经过他亲自主持讨论确定的撤退和坚守阵地的干部名单。他关心每一个坚持到最后的干部的家属的安顿。1946年9、10月间，恩来同志在上海，又将沪、宁两地的干部撤退问题，一个个做了细致具体的安排。这种细致、具体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和对干部的爱护、关怀，负责到底的一贯作风，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的典范。

当年奋战在《新华日报》岗位上的战友们，如今几乎都已白发盈颠。让我们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永远不忘过去的峥嵘岁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金光大道，继续奋勇向前吧！



(原载《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2月版)



一部国共二次合作时期的百科全书

——纪念《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创刊四十五周年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创刊于抗战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时的武汉，距今已有45年了。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的这两个姊妹报刊，是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党报党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产物。在9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它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无数次的压迫与摧残，经受了敌机轰炸破坏的严重打击，克服了物质上的种种困难，一直到它被封闭的最后一天，始终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理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的报刊，在宣传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一系列斗争中，真正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它教育了一代青年走向进步，走向光明。它扩大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把广大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它的有力宣传下，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和反内战运动。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国家机关、党派组织、群众团体乃至科教文组织中的许多著名的非党领导干部，都是当年与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党组织一起团结战斗的好朋友。在周恩来同志的教导下，《新华日报》与《群众》起了它应起的扩大统一战线的作用。从已谢世的沈



钩儒、张澜、黄炎培等先生到现在仍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史良、朱学范、胡厥文、胡子昂、黄鼎臣等等，这些当年《新华日报》最亲密的朋友，都把这张党报作为他们发表政见的园地。郭沫若同志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被列为整风文献，最先发表在《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报纸刊登的冯玉祥、马寅初先生写的抨击黑暗统治和斥责发国难财丑行的诗作和文章，曾经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至于广大知识分子，更是把《新华日报》当作最好的朋友，他们的苦难，在《新华日报》上得到反映，引起社会的同情共鸣；他们的文章、诗歌、小说在《新华副刊》上发表，受到读者的重视和欢迎，许多自然科学家义务为报纸编辑科学副刊。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发出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有力地、巧妙地支持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几天之内，就有300多位著名人士参加签名。这里不仅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顾颉刚、梁希、金善宝、潘菽、蔡楚生等著名作家和学者，还有徐悲鸿等著名艺术家。这份宣言，签名者阵容浩大，义正词严，当它在《新华日报》刊登以后，震动了整个国统区，使国民党反动势力惶恐万分。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新华日报》与《群众》究竟在群众中起了多大政治影响作用，难以用几句话来说明，这里只举一件事。当年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们回忆说，《新华日报》尽管出版在武汉和重庆，离他们很遥远，可是在报纸出版三四个后，他们就能辗转看到。那时他们与党中央联系极困难，看到《新华日报》如获至宝。他们从《新华日报》上了解党的主张和抗战形势，以《新华日报》内容作为战士的学习材料。在



行军中，他们用油纸精心包裹每一份得来不易的《新华日报》。一张报纸在部队中传阅二三个月仍然完好无损。他们深情地说：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靠着《新华日报》掌握了斗争的方向。

《新华日报》与《群众》创刊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里。这样的报刊，不同于当时苏联的《真理报》，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党报，它与解放区出版的报纸也不相同，而具有许多特点。尽管如此，当年它赖以成长壮大的最宝贵的一些经验，有着普遍的意义，即在今天仍然是极有借鉴价值的。

什么是《新华日报》最重要的经验呢？以我个人看来，首先，就是它坚定、准确地联系实际地宣传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正确指示，向国统区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新华日报》创刊初期的一段短暂时间，曾有过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干扰。但是，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新华日报》的工作同志非常幸运，大家在斗争中学习并得到提高，在宣传上没有也不会迷失方向。其次，《新华日报》无时无刻不在为密切联系群众而多渠道、多方面地开展工作。报纸的内容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相依，对人民群众为争取切身利益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总是及时报道并给以坚决的支持，因此，人民群众真诚地拥护报纸提出的政治主张。除此之外，建设一支坚强的能战斗的办报队伍，也是极关重要的。《新华日报》与《群众》的工作人员在9年多的风风雨雨里经历了严峻考验，证明了能在强大压力与横逆来临时，坚定不移，绝不弯腰；而当人民群众遭到压迫



与残害时，则旗帜鲜明地代表群众讲话，满腔热忱地为群众服务。同志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工作条件极差，可是在重庆所有报纸中《新华日报》办得最有特色，印得最快，发行得最早，许多印刷条件很优越的报纸也无法赶上它。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当年称赞《新华日报》起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这是不无原因的。

前面说过，《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当然要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战绩。《新华日报》忠于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战初期，当国民党政府还把主要力量用于抗战的时候，中共中央对之寄以希望，《新华日报》热情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报道了徐州会战。《新华日报》当年在武汉普海春餐馆曾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从徐州战地归来的包括国民党报社记者在内的各报战地记者，只有我们的报纸才有这样的胸怀和气魄。在武汉外围战斗渐趋紧张时，《新华日报》又派出一批战地记者去前线采访。就我自己来说，就被派往九江、鄱阳湖西岸一带，访问了李汉魂、王耀武等许多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并深入连队，多次报道他们的战斗经过。《新华日报》对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宣传，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在《新华日报》上还多次登载了国民党一些领导人士的抗战言论。《新华日报》的报头，是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的，一直到报纸被封闭之日也没有更换。然而，193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情况发生根本变化，《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不能走出重庆青木关一步，更不用说允许记者到战区采访了。《新华日报》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封闭，除了宣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宣传解放军自卫



战争之外，始终坚持动员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一贯主张。所有这些，在《新华日报》上忠实的记录着。是国民党当局破坏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蓄意依靠外力发动内战，倒行逆施，终至丧尽民心，逃窜台湾。一切热爱祖国，关心国家统一的人们，都可以从《新华日报》的记录中认识中共一贯真诚的严肃的政治态度，从而更加理解今天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祖国举行国共谈判的号召的诚意。

《新华日报》与《群众》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报刊史，也是党史的一部分，是现代历史的一部分。它记录了一个伟大而艰苦的时代。它是那时的一部百科全书，人们将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生动材料，特别可贵的是可以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斗争实况的记载。

当年战斗在《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同志们，如今多是白发老翁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新华日报》和《群众》的光荣战斗历史，将长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原载《人民日报》1983年3月9日，原题为《火红的岁月》）

注：

此文发表后，作者写在剪报上的附记：为了纪念，在字数限制之下，我还是写了一篇短文，表达自己的心意。可惜怀念当年几位领导人的一段文章，限于字数删去了；怀念牺牲在日寇、反动派的炸弹、屠刀下的战友的一段也删去了。蒋介石到台湾后自认“允许新华日报出版是一大错误”，蒋是最“忠实”读者……一节又删去了，薛岳、吴奇伟名字也删了。



党报史上的光辉一页

今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45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时间最长的一份机关报。它经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险恶而复杂的环境下，发挥了“集体宣传员、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的巨大作用。

党中央从《新华日报》创刊一开始，就很重视这张全国性的公开的机关报。1938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各地党组织的通知中，就通报了《新华日报》是党在当时条件下所建立的“全国性的党报”，规定每个支部要订阅《新华日报》，每个党员要读《新华日报》，每个地方党组织要把《新华日报》上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论文当做党的政策和工作的方针来研究。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新华日报》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过，《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我们党的又一支方面军。《新华日报》所体现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办报风格和办报经验，在今天，仍然给人以启发和教益。

—

《新华日报》诞生于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时刻，是中



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第二次合作的产物，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向中国本部大举进犯，不久南京陷落，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战局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武汉正式创刊。它庄严而激昂地宣告：“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从此，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在国民党统治区肩负起了宣传抗日救亡、振奋民族精神、动员各界民众共赴国难的责任。

《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垄断，以本报专电、战地通讯等形式，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真实情况。创刊号的头条消息，就是八路军在山西前线抗击日寇的捷报。在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一周年的时候，报纸以大量版面报道了这两支人民武装力量的赫赫战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通过这些报道，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指出的人民战争的前途，燃起了胜利的希望。因此，每当《新华日报》发起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战将士的义卖献金和捐款慰问活动的时候，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热烈响应。

尽管《新华日报》一出版就面临着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创刊七天就被特务分子捣毁了印刷厂，但是仍然顾全大局，对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积极表现，如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武汉外围之战等，都如实地报道，坚持了我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光明磊落态度。这一时期，《新华日报》记者到各战区采访也还不受歧视。记者写了许多报道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抗战事迹的战地通讯，在报纸上发表，同时，作为合作者，对于国民党统治者不发动民众，不实行政治民主，扰民侵民，大抓壮丁，不关心伤兵等问题，也作了善意中肯的批评。所



以,《新华日报》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到了1939年,国民党实行限共、反共的政策,情况就不同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被剥夺了到战区采访的权利,甚至不准我们离开重庆,不准走出青木关一步。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新华日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力量,开辟自己的新闻来源,千方百计地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报道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雄业绩,用胜利消息鼓舞和振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定他们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念。

二

《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实际情况,正确地宣传了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赢得了民心,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回顾《新华日报》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一、宣传我党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方针,坚持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二、宣传我党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三、在国际问题上宣传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支持苏联和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正义战争。在解放战争初期,主要是:一、宣传我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路线方针;二、揭露并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阴谋;三、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新华日报》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运用正确的宣传策



略和宣传方式，获得了巨大成功。

《新华日报》刚刚创刊的时候，许多人对它还抱着惊奇疑虑的心理，但是由于报纸所宣传的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意愿，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为《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一遇到重大事件总要看看《新华日报》，了解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抗战一开始，就存在着是只靠军队的片面抗战，还是动员全民的全面抗战的大问题。《新华日报》坚持不懈地从各方面宣传党的全面的全民抗战的主张。抗战初期，“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的思潮在国民党统治区某些人中相当盛行，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从1938年10月7日到9日连载了周恩来同志为报纸写的长篇文章《论目前抗战形势》，阐述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文的思想，具体说明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报社还把《论持久战》和周恩来同志这篇文章作为“新群”（《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丛书，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更加嚣张，形势险恶。我党针对当时情况，在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洽口号。《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很快把这一口号传达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中去，使之成为他们的共同心声。

为了把党的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传达到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中去，《新华日报》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在无法刊出自己的言论和新闻报道的情况下，刊登了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和题诗：“为江南死



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的丑恶行径，把我党的严正立场说清楚了，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新华日报》不顾反动派的种种迫害，甚至冒着被查封的危险，刊载了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刊载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叶剑英、贺龙、聂荣臻、邓颖超、吴玉章等我党我军领导人的文章。此外还大量刊载了延安《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斗争是十分激烈而复杂的。《新华日报》运用灵活的斗争艺术，把合法与非法、遵检与抗检等各种手段配合进行，既要保证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政治主张必须及时地广泛地传播出去，又要力争报纸能够不被封闭。可以说，《新华日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超出了人们当时的预料。

在国民党统治区，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曲折的。《新华日报》除了正面阐述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外，更重要的是紧紧结合人民群众切身的体会和利益来进行宣传。这样做最能吸引广大读者，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引起他们对我们党的政治主张的普遍关心。比如，在关于抗议特务分子无理枪杀重庆电力工人胡世合和关于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罢工运动的宣传报道中，《新华日报》通过深入的调查，及时发表新闻报道，揭示事件真相，具体反映了工人群众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沉重压榨，揭露了国民党特务、警察的种种法西斯暴行，从而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抗争。这两场大规模的斗争都获得了胜利，轰动了山城和西南地区，震撼了反



动黑暗势力，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的威望。

三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从实际执行上讲，周恩来同志是最光辉的代表，而他在重庆时期领导统战工作的实践活动，又是最光辉的一段。《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在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方面展开了丰富多采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华日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对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表现了十分真诚的态度，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新华日报》的报头是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的。《新华日报》刊登过孙科、孔祥熙、邵力子、张治中、白崇禧、陈诚等，乃至蒋介石的某些抗日言论。张冲（淮南）先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为实现团结抗战做过有益的事情。1941年9月，张冲先生病逝于重庆。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围歼新四军北撤部队，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可是《新华日报》仍然出了张冲先生纪念专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写的代论《悼张淮南先生》，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以抗日战争的大局为重，以国共合作为重，对于做过好事的朋友始终不会忘却。对于国民党内由于不满意蒋介石消极抗日和独裁专制而备受打击排斥的人士，《新华日报》更是关心他们。我们的记者经常去拜访冯玉祥将军和其他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并在报纸上反映他们的政见，发表他们的文章和诗作。



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国民党中的左派，倾向进步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是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周恩来同志总是教导我们，要尊重这些朋友，倾听和反映他们的意见，有事情和他们一道来做。在反动派肆意践踏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新华日报》拿出大量版面，刊登民主党派和各界朋友的稿件，为他们提供了一块比较自由的讲坛。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友声”专栏。这个专栏全部用来刊登来自朋友方面的文章，在观点上也并不强求与共产党完全相合，只要在总的方向上与我党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就尽量予以发表。“友声”专栏就发表过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长篇论文。马老以淋漓痛快的文字，痛斥四大家族和奸商“当存亡危急之秋，大刮民财，大事囤积居奇，狼肺狗心，可恨亦可杀”。他还提出，要实现中国工业化，“必须抛弃一切独裁的企图”，“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先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些意见和主张，出自马寅初这样一位无党无派的学者，更易于为中间阶层所接受。《新华日报》的版面上，还有以梁希、潘菽、金善宝和涂长望等中大教授为核心，吸引了李四光、竺可桢、任鸿隽、严济慈、丁西林等著名科学家参加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负责定期编辑的“科学副刊”，也有医学界的黄鼎臣、薛映晖、左昂等编辑的“医药问答”等专栏。通过这一途径，《新华日报》不断壮大了爱国民主进步力量的队伍。

《新华日报》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它通过自己的工作，推动和发展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运动。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以郭沫若这面光辉旗帜为代表的文化运动，是对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思



想理论和斗争策略越来越成熟，声势和规模越来越扩大，而国民党方面的文化界，却是灯火阑珊，萧条冷落，拿不出一丁点象样的货色。《新华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常常以它为中心，聚起队伍，向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发起冲击。1945年2月下旬，郭老拟写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提出了保障民主自由、坚持团结抗战的六项意见，贯彻了我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几天之内，就有300多位著名文化人签名，他们当中有茅盾、巴金、老舍、冰心、臧克家、曹禺等一批作家、诗人；有蔡楚生、焦菊隐、李可染、戴爱莲等一批艺术家；有马寅初、杜国庠、翦伯赞、顾颉刚、梁希、潘菽、金善宝、杨晦等一批学者和教授。名画家徐悲鸿也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民主党派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柳亚子、邓初民、陶行知、张西曼、郭春涛等也参加了签名。这份宣言连同这份阵容严整而宏大的名单，一经《新华日报》公布，轰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各界。这篇《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如今已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的宝贵文献。

要团结和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就必须给他们以真诚的关心和爱护。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知识界的朋友多半处于艰苦竭蹶之中，《新华日报》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实际的援助。像作家张天翼贫病交加，剧作家洪深处境惨淡，《新华日报》都通过新闻报道，造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形成了社会救援活动，使知识界的广大朋友切身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温暖。《新华日报》更注意从政治上给知识界朋友以关心和爱护。每当《新华日报》被迫秘密印发毛泽东著作或延安《解放日报》重要文章，都分送给知识界朋友，使他们



及时得到宝贵的精神食粮。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发表之后，很快由《新华日报》翻印成小册子秘密散发。当我去看邹韬奋先生，见他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新民主主义论》，他兴奋地对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头脑里许多长期搞不清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国民党遍布鹰犬，极力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阅读这些书报是有生命危险的。为了使朋友们既能收到这些书报，而又不发生危险，我们搞发行的同志真是绞尽了脑汁，从来没有在这个环节上发生问题。同样的，尽管《新华日报》所在地特务密布，也仍然阻止不了广大群众与《新华日报》人员的公开来往。报馆设在重庆民生路上的门市部、采访部和南方局青年组所在地“星庐”，是我们与各界朋友联络的地方，一些朋友常到这里找我们谈心，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其他负责同志也常在这里会见各界朋友。

《新华日报》与民族工商界的朋友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报纸热情地报道民族工商业者艰苦奋斗、自救图存的种种活动。报纸也多次发表许多代表人物的文章和谈话，抨击反动统治当局摧残民族工业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法西斯统治。至今仍在为祖国统一和四化建设服务的胡厥文、胡子昂等先生，都是当年《新华日报》的朋友、读者和作者。《新华日报》还大力支援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社会组织“劳协”的斗争，当反动派捏造罪名逮捕“劳协”负责人朱学范的时候，《新华日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救援活动，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新华日报》在重庆新闻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一个广阔而纵深的舆论阵地，每当遇到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进



步的新闻工作者都站在我们一边，给我们以同情和支持，直至和我们并肩战斗。1946年2月，重庆“较场口血案”发生之后，为了揭露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颠倒是非的报道，重庆各家报纸的42名外勤记者联名发表了一篇《给中央社的公开信》，据理驳斥中央社对事实真相的歪曲。不久，又发表了一篇《保障人权，忠实报道》的公开信，有211位新闻工作者签名。这样一来，中央通讯社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连反扑的气力都没有了。

在周恩来同志的长期领导和教育下，我们与国民党统治区各界朋友之间在争民族生存、争民主权利、争和平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确实建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党报与各界朋友之间始终保持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密切而深厚的联系。这一条宝贵的经验，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汲取。

四

《新华日报》是党报，又是一张真正的人民的报纸。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检讨与勉励》这篇编辑部文章中指出，《新华日报》“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这些论述，揭示了《新华日报》的一个鲜明特质，概括了它的办报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华日报》经常征求读者的意见，每逢创刊周年纪念，还进行读者意见调查。从大量来信中，我们强烈地感到，人民群众要求党报能够给他们讲清许多重要道理，启发他们的



认识，指明他们的前途；要求党报能够讲出他们的希望，讲出他们的痛苦，讲出他们想讲而讲不出的话。这两条，《新华日报》在长期斗争中是做到了。对此，人民群众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说，对《新华日报》的社论、专论、短评、时论，都“喜欢看”，能“得到许多好处”，而且特别喜欢看《新华日报》转载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谈话，以及《解放日报》社论。他们还要求增加“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经常登载“解放区人民生活的典型特写”。事实证明，人民群众渴望党报启迪他们的思想，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同志当时指出：“能激发人的并不是抽象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新华日报》在宣传中，总是注意从国民党统治区群众的实际觉悟程度出发提出问题，在报纸上尽量避免使用那种向群众发指示、下命令的语言，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生活实际，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求生存、反迫害这个最普遍最基本的问题入手，运用广大群众最切身、最易感动的事实，去引导和教育群众，把对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宣传具体化。

《新华日报》为了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做了许多独创性的努力。报纸开辟了“读者园地”专栏，刊载读者的来信来稿。工人、农民、下层公教人员、城市贫民等群众，通过这块园地，直接向整个社会倾吐他们的悲惨遭遇，控诉土豪劣绅、特务、宪兵、警察、兵痞、流氓等恶势力对他们的摧残迫害，揭露国民党统治的种种黑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新华日报》还开辟了“生活的海”、“生活一角”、“生活线上”等专栏，在第四版则有“劳动人民生活专页”。在这些专栏或专页上，大量发表本报专访、特写和根据各地报纸的



材料编写的地方通讯，以具体的事实，反映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每一篇报道，几乎都是血泪浸染的文字，向黑暗腐朽的社会进行激烈的斗争。一群工人来信说：“我们在以前简直没有看到过这样合我们口味的报纸，所以我们大家都把它看做工友的唯一消息机关，不，简直就是我们的耳目口舌啊！”

报纸要教育人，就必须吸引人。《新华日报》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对象，坚决屏弃了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流行的文白夹杂、不伦不类的“新闻体”，而采用通俗浅近的白话文，使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使不识字的人都能听懂。在报纸上，体裁多样，敢于创新。既有如匕首投枪、嬉笑怒骂的“司马牛”杂感，又有分析有力、议论风生的“综合报道”，还有笔端常带感情的“于怀”（乔冠华）的国际述评。真可谓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作为一张人民的报纸，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注意自己的榜样的作用。在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是要通过《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的具体表现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来衡量《新华日报》的新闻、言论的价值的。如果《新华日报》工作人员言行不一，不做出榜样，那么全部的报纸工作就会像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这样的政治工作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卖狗皮膏药’的东西了”，有谁还会相信呢？《新华日报》在政治上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毫不含糊；对待人民，对待读者和朋友，则是忠诚服务，像一团烈火去温暖读者和朋友的心；在反动派的横逆和压迫面前，则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始终在气概上压倒敌人；在工作上，做到精益求精。虽然《新华日报》印刷条件和其它方面的物质条件都很差，可是每天印得



最清，错字最少，出版最早。此外，在生活方面，《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从社长到报童，都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除潘梓年、熊瑾玎同志年事稍高之外，大多数人都在二、三十岁，充满了蓬勃的朝气，有很强的战斗力。

五

《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了九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也培养了一支能战斗的队伍，这支队伍曾被叫做“新华军”。

《新华日报》所处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使《新华日报》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获得正确的指导。这张报纸是在多数同志没有办报经验的情况下创办的，这就要求大家在办报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办报业务。《新华日报》一诞生，就面对国民党的压制和王明的干扰，九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斗争考验。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战斗，一面成长。这支队伍有理想，有纪律，能够团结战斗。在那个战斗环境里，人人都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大家都十分自觉而又主动地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特别是在整风改版之后，报馆建立了严格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制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报馆就成了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

报馆里，有着很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始终坚持进行党的理论和革命气节教育。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同志经常给大家作时事报告和党史报告。报馆几位负责人



曾向大家讲述他们在国民党监狱中坚持斗争的经历。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同志们随时准备像革命前辈和无数先烈那样，在战斗中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报丁、报童，这些来自穷苦人家的子弟，接受了党的思想哺育，在政治上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当中几乎每天都有人遭到特务、宪兵、警察和流氓的侮辱殴打，被打后洗去血迹，又背起报袋，重新走上街头。《新华日报》的人骨头很硬，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至今念念不忘当年报馆内部那种团结友爱的良好关系。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从无当时社会上那种尊卑高下之分。编辑与排字工人之间为处理好版面，常常互相商讨，一起动手。为了工作上的问题，或是在学习讨论会上，同志间有时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事后不留芥蒂。在这个集体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别特是严于律己、毫不自满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

《新华日报》能够培养这样一支队伍，是因为这个集体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社长潘梓年同志，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经过了多年铁窗生活，锻炼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报社同志所敬重的师长。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在报馆里不论什么人，包括那些小报童，都乐于和他接近。经理熊瑾玎同志，是一位最好的“家长”。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在湖南他就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战斗。在《新华日报》，他天天为报馆二三百人的生活和办报经费操劳。为此他要经常和社会上各色人物打交道，却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他能诗善文，却甘于做党报的后勤工作。他通晓医道，经常为大家诊病。总编辑章汉夫同志以对党的



无比忠诚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影响着周围每一个同志。他与同志相处，像一团烈火；而在反动派面前，他像一头猛狮。1941年1月17日的晚上，国民党当局发布乱命，诬指新四军为“叛军”。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局派人来《新华日报》坐镇，监视第二天报纸的版面，不准报纸刊登揭露真相的文字。章汉夫同志向这个家伙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一会儿晓以大义，一会儿藐视嘲讽，搞得那人狼狽不堪。由这三位优秀的共产党人所组成的《新华日报》领导核心，把全体同志紧紧团结在一起。

《新华日报》不但以浓彩重墨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而且为党的事业培养出了一大批干部。令我们永远怀念的是，在《新华日报》有数十位英勇顽强的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从武汉向重庆撤退途中遭日寇飞机轰炸而牺牲的项泰、潘美年、李密林等16位同志；有在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于“白公馆”的胡兰、何天泉同志；有在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战死沙场的张子英、李国卿、周畅文、王宇文等同志；党的优秀干部、《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惨杀于“中美合作所”。这些同志的英名，永远和《新华日报》的光荣历史联结在一起！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有很强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高度斗争艺术，这是它的历史特点。《新华日报》当年所起的重大作用，还可以引用蒋介石的一句话来从反面加以证明，蒋介石后来在台湾讲起这段历史时曾颓丧地说，允许《新华日报》出版是一大错误。而当时在重庆，许多人都知道蒋介石案头上每天放着的第一份报纸就是《新华日



报》，大家取笑说：“蒋介石可算是《新华日报》最‘忠实’的读者了！”

当然，《新华日报》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它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初创时期有过王明的干扰，后来有些文章和报道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和纠正。《新华日报》的同志们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在不断同自己的缺点错误的斗争中，一步步前进的。

《新华日报》的历史，不仅是在报刊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也是党史的一部分。它记录了一个伟大而艰苦的时代。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各方面的生动材料，特别可贵的是，可以找到广大人民群众在许多斗争实况的记载。

（原载《红旗》1983年第11期）



毛泽东同志与《新华日报》

抗日战争前，我有将近十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革命活动，曾经多次听说毛泽东同志的名字。而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事。1937年冬，我奉命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这才开始有条件学习。毛泽东同志给《新华日报》的曾经多次指示以及支持鼓励，都有力地鼓舞着《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奋发向前。

《新华日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经过中共中央派往南京进行和谈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同志的一再交涉和斗争，才得以在有关协议中确定下来，《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和公开发行的唯一的一份党报。当时党派到《新华日报》主持工作的同志，几乎清一色都是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而且十之八九都是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其中有社长潘梓年同志、总编辑华岗同志和章汉夫同志等，他们学识渊博，斗争历史长，经验丰富，党性非常坚定，这许多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是，他们也同我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并不了解毛泽东同志。像苏区的路线斗争，特别是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等等，当时我们都是不了解的。

非常不巧的是，当《新华日报》在武汉筹备的时候，刚从莫斯科飞回延安不久的王明，来到了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



作。王明的气焰真是不可一世，他仗着长江局书记的领导身份，挂着共产国际代表这个吓人的头衔，肆意推行他那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报社的同志对他和他的老婆孟庆树那套肉麻吹捧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庸俗做法，对他好出风头、好标榜自己的恶劣作风非常反感。而他则稍不如意，动辄将我们召到他的办公室长篇训斥，这种家长制的专横跋扈，更增加大家的不满。就在这种直觉的对王明作风不满中，同志们的心自然而然地向往毛泽东同志。记得有一天被王明找去训斥归来，大家坐在寝室的床上，不断叹着气，华岗同志突然激动地说：“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就在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华岗同志道出了我们的共同心声，可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既未真正了解王明的真面目，当然也谈不到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新华日报》创刊之初，在王明的压力之下，曾经宣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特别要提到的是在王明压制之下，《新华日报》竟不能刊登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后来只能印成小册子发表，使党报蒙受污点。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确定了抗日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思想，指明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在战区和敌后。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迁到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以很大的篇幅刊登了。当时我们虽然对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进行了学习。但由于传达中没有点王明的名字，所以对王明错误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后，《新华日报》的同志最高兴的是再也不受王明的气了，他再也不能来糟蹋《新华日报》了。从此，《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直接领



导之下了。《新华日报》同志们感到鼓舞的另一件事，就是党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指出要“更加改进《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的实际内容”，这对《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工作同志是一个巨大的鞭策，感到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给予的最大关怀。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重要发展而且成熟的时期。《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边战斗、边学习、边宣传，毛泽东思想哺育了党报的成长，也哺育了一批新闻战士的成长。下面我就毛泽东同志给予《新华日报》直接的教导、支持与鼓励等方面来作些回顾。

1938年9月，《新华日报》征集给前线抗战将士的慰问信，9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亲笔书写了《给前线战士》，寄送《新华日报》。当时，武汉外围战事激烈，不久武汉陷落，报馆迁往重庆。这封珍贵的信件，辗转于硝烟烽火中，直到12月间才送到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我正在江南敌后根据地采访，当看到毛泽东同志亲笔手迹时，心情非常激动。1939年秋我由皖南新四军军部返回重庆报社，担任编辑主任，恰恰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重申了党的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政治口号，这篇谈话在《新华日报》发表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紧接着不多久，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受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采访，提出了我党对待反共磨擦的主要原则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记者写好了报道带回重庆，谁也不敢登。《新华日报》则以宁受摧残必须把党的坚定立场宣传出去的决心，于10月19日以大字标题发表了这篇著名的讲话，并随文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照



片。这篇讲话像一颗炸弹，震动了整个重庆，并引起外国记者的极大注意。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当局，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沿街到处搜抢当天的《新华日报》，并且下令罚处《新华日报》停刊一天。可是，不论国民党当局如何残暴，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身处斗争环境中，处处令人感到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多么强大。《新华日报》创刊后九年多时间中，总计发过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有30多篇，如果连文电、题词等算在一起，就有七、八十篇之多。

皖南事变以后，《新华日报》处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的高压，新闻检查机关的横蛮，使得《新华日报》不得不从1941年2月1日起，发出“本报因奉令免登之稿件过多，难于编排，若勉强维持原有篇幅，既虚耗同人之精力，更难副读者之雅望”，而改出半张。就这样，国民党当局压迫摧残还是日甚一日。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不仅有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着我们战斗，而且从延安传来了毛泽东同志对《新华日报》的关怀。中共代表以参政员名义向国民党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的第三条，就是“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这不仅是党的领袖的关怀，同时也代表了全党和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对《新华日报》的支持。

作为一张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在我看来，1942年的整风改版，不仅是延安《解放日报》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分水岭，同样，在《新华日报》的发展历史上，这也是标志着这份党报走向比较成熟的一个开端。《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毛泽东同志从一开始就给予重大的关怀。1942年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3月14日他



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谈到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一位党外人士的文章已在《解放日报》转载，指出这位党外人士提的“希望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是很对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都应该实行。电文中还特别提到：“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毛泽东同志这个号召推动了《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

《新华日报》的同志自1942年年初起到9月止，全力从事于整风改版工作。除掉组织大家学习整风文件，检查总结自己思想和工作外，广泛地征求读者意见和批评，进行读者调查，包括研究英美法各国共产党党报和《真理报》的编辑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报纸于9月18日起进行了版面改革。在改版的第二天，创办了《团结》专刊，周恩来同志亲自写了发刊词《“团结”的旨趣》，指出：“最近我党中央号召整顿三风，便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和巩固基础上，认真地做反省的功夫。《新华日报》的改革就是响应这个号召和在事实上执行对抗战对人民的负责的义务。”明确地指出了《新华日报》改版的重大意义。

《新华日报》经过改革，调整了专刊，减少了一些联系群众面不广的专刊，着重办好联系广大群众的《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和《工人生活》，更加重视“友声”专栏的工作，吸收更多党外知名人士、学者在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创办了综合性的《新华副刊》，使之更具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其它还有许多新的措施。总的来说，灵魂还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改版的成果，也可以说《新华日报》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它坚强的党性



具体体现在最广泛地与群众血肉相联上。在广大读者眼里，《新华日报》是他们自己的报纸，是他们的代言人，是人民的真正代表。

《新华日报》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的评价。1945年1月，在我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影响下，民主同盟发表了时局宣言，拥护我党主张。《新华日报》刊登了民主同盟的宣言，引起山城轰动，舆论沸腾，国民党当局抓人扣报，《新华日报》的报童英勇顽强地完成了当天报纸的发行任务。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很快知道了这场斗争，怀着欣喜的心情，赞扬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飞临重庆谈判，《新华日报》的同志有机会面聆他的指示和教导，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新华日报》的工作情况。他在回到延安以后曾经说：“新华日报有那样多的读者，足见人心所向；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我们充满胜利信心。”陆定一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对《新华日报》的“最高赞扬”。（见《新闻研究资料》第19期）

在毛泽东同志90诞辰的时候，《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也即将出版，缅怀往事，更感到毛泽东同志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让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思想理论，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作出更大的努力。



周恩来同志与《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于武汉和重庆的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共党报。由于远离党中央，《新华日报》先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后来长期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而周恩来同志可说是从筹办到报纸被封为止，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导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高涨的1946年春天，《新华日报》决定将总馆迁往上海，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晚刊，重庆的《新华日报》则改为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党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上海、南京都无法出版，重庆新华日报也于1947年2月遭到勒令封闭停刊。留在上海、南京、重庆三地的大部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分别撤回解放区。《新华日报》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曾奖誉过《新华日报》的工作，被称为一支“新华军”，称许它完成了党交给的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新华日报》九年多的战斗历程中，结交了新闻界同行许许多多朋友，建立了广泛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和

*，本文是作者1985年8月20日在北京全国记协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回顾抗日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生前未发表。



合作，共同战斗。当此，庆祝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时候，新闻界的老老同志欢叙一堂，缅怀当年战斗的友情，自然心情激荡。

《新华日报》九年多岁月的战斗历史，是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把它写出来，也是我们党的新闻史上的一笔财富。这件事情，《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抓，可惜进展迟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周恩来同志对办好《新华日报》曾耗费无限心血，作过大量指示。他经常跑到化龙桥来参加报馆的各种会议，也经常把报馆的负责干部找去汇报和讨论报纸工作。他审阅和修改报纸的重要稿件，并亲自撰写文章、代论。对于报纸的编辑、印刷、发行以及其它管理工作、干部培养等等，几乎没有一项不曾作过重要而中肯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跟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一样，都是善于领导报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有关办好报纸的指示和他的新闻实践，实在值得发掘研究和发扬。可惜由于当年环境特殊，周恩来同志的许多教诲，已经找不到系统的文字记录，就是片言只语的文字材料也发现很少，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但是，也正因如此，就加重了至今健在的《新华日报》和南方局的工作同志们发掘这一重大财富的责任。其实，《新华日报》史能否编写得好，其中关键之一，恐怕就是编写者对周恩来同志的有关办报思想的体会、表达得如何来衡量。

我作为《新华日报》的一兵，有幸听到周恩来同志的许许多多教诲。事隔40年，当年的音容笑貌还隐约记得，可是具体讲的内容，就十分模糊了。今天我愿意来讲一讲印象比较深刻的、长期留在脑际里的周恩来同志的几点教诲。若讲



错了，或者理解得太肤浅，这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周恩来同志常常告诫《新华日报》的同志：必须把党报办成为人民的喉舌，为人民的响导。本来党报就是党报，就是党的喉舌，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周恩来同志老是向我们强调这方面的话呢？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一次干部会上有一篇重要的讲话，他说：“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话透露了消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宣传工作，都要做到使广大群众不感觉我们党在领导而实现党的真正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也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同志就要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应作为人民的一员来工作，不是站在高于人民的地位，来自封领导，来摆领导架子。我们的报纸当人民群众看作是代表他们讲话的，讲他们要讲、想讲的话的时候，真正起到了人民喉舌、人民响导的作用，党报的工作自然也做好了，党性也强了。

正是在这个人民喉舌的思想指导下，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后最困难的日子里，提出要《新华日报》开辟“友声”专栏，吸收统一战线中的许多朋友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的倡议并付诸实施。当时确定的方针是：这些文章和作者，只要总的倾向上站在人民一边，是进步的而且有一定代表性的，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即使与党的主张不尽相合，也允许见报。这恐怕是党报史上的创举。

让党外人士在党报上讲话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完全与周恩来同志一致。1942年毛泽东同志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他（指张申府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都应实行。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草案)中,进一步提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态度,须受到批评。”(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这里毛泽东同志把吸收党外人员写文章、参加编委会与提高党性,批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联系起来。

周恩来同志一直到1947年1月,为《新华日报》九周年的题辞上,还殷殷期待着:“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响导,继续努力坚持不屈来迎接民族民主的新高潮。”那是《新华日报》濒临被封前夕,战斗十分艰苦的时候的周恩来同志的题辞,实在值得深思与回味。

第二个印象极深的观点,就是周恩来同志经常教导的:“事实第一,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把结论放在后头”的教诲。这个实事求是的观点同新闻必须真实的观点,都是周恩来同志经常讲的,很多次是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强调的。我们报纸也曾经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多次教诲,用社论、专论等多种形式来阐述这一思想。《新华日报》曾多次指出:“报纸要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凡是真理要我们说、要我们写的,就不顾一切的说,不顾一切的写。”另一方面:“凡是不合真实、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者前面引诱



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假借，也不容有丝毫含糊。”“宣传而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等等。周恩来同志是把报纸的真实性原则同是否违反民意这个重大问题联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大概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减轻对党报的意义吧！

第三，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的观点和具体指导，这也是周恩来同志教诲很多的。当时的环境也逼得《新华日报》去密切联系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新华日报》的“信箱”、“社会服务”等栏目，周恩来同志都非常关心，并具体加以指导。1942年整风，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把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作为最重要的方面进行检查。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新华日报》办出了自己联系群众的特色，取得了团结群众、吸引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成功经验。

第四个观点是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观点。这是周恩来同志勉励在大后方工作的共产党员努力的目标。对《新华日报》的同志来说，周恩来同志勉励大家作“多面手”，一个编辑干部不仅会编，而且会写，会跑外勤还会印刷等等，反过来别的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正由于这个号召，报馆同志学习成风。周恩来同志总结了报馆同志的话，提出报纸要“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战斗口号，并促使其实现。《新华日报》远离市区，印刷、交通运输工具都十分落后，可是每天早晨六时，《新华日报》报童在重庆市喊出第一家最早的卖报声，始终如此。

在学习上，周恩来同志特别提倡反省功夫。他在一篇文



章中写道：“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的力量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就不免于失败。”在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教导下，《新华日报》每年在庆祝出版的周年纪念日前后，总要公开号召读者对报纸提出批评建议。经过一个时期的搜集研究，正式作出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登在报上，一年一度，年年如此。至于勤交友，在周恩来同志的言教与身教下，《新华日报》做得也是很认真的，是团结面很广的。常常出现某一非常人士的文章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使那些脱离群众的国民党官方感到十分吃惊。

最后，就是言行一致的观点。周恩来同志十分强调党报工作者的言行一致，凡是报上宣传要群众去办的，自己就应首先做到。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乃至整个党的形象的命脉问题。《新华日报》在大后方就是党的一个窗口，报纸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管你是否中共党员，群众总要把你当作衡量中共宣传的真实价值标准。在党的教育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经常教诲之下，《新华日报》的工作和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言行，一般总是被人感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且平等待人，亲切可信的，他们从中感到党的温暖。这就与那种“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绝”的官僚政客风气，划清了界限。

我讲这五点，只是常常在自己头脑里浮现起来的几点，当然是挂一漏万，不成系统的。然而我觉得这些也仍有现实意义。



《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序^①

《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一书公开出版发行了。

应该感谢重庆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们，经过他们辛勤搜集编选，这部记录国民党当局迫害《新华日报》的档案史料书得以问世。他们为广大读者，特别是为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新闻史的人们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史料。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回顾中外历史，官方用种种无理手段，摧残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事实史不绝书。其钳制的严酷、镇压的残暴，有的也令人发指。然而，读者通过本书不难看到，从1938年至1947年这九年多岁月中，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压迫摧残，其动员之广、检扣之厉、迫害之暴、手段之毒、花样之多、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这本书中的档案史料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当局迫害《新华日报》的自供状。作为历史见证，使我们的后人看看什么叫摧残新闻言论自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又是怎样在与这种迫害作坚定而又曲折的斗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又是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好教材。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初期诞生于武汉的中国共产党党

① 《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一书由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报。它是由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经同意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中共党报。没有十年内战的结束，没有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可能有《新华日报》的公开出版。

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搏斗，牵涉全体人民的命运。究竟采取什么途径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之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可以说从抗日战争之初起，就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和斗争，擦、冲突、镇压从未间断，反共高潮接二连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新华日报》就是奋斗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置身于这样一个形势险恶、斗争复杂的艰难环境之中。它排除一切困难，以最大的热情宣传了全国军民英勇抗敌的动人事迹，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团结抗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坚持党报又是人民报纸的信念，不断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大力报导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国民党内上层开明人士的正义主张，与大后方人民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它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同一切或明或暗的投降勾当，同那些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而仍抱着以反共为其第一职志的顽固派，以及同那些热衷法西斯独裁，害怕民主、进步的思想行为，作了持续的斗争。这本档案史料书将教育正在建设祖国的人们，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老一辈曾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民主权利，为人民的新闻言论自由，作了多么英勇的斗争。我们应该发扬这一光荣传统，为建设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为办好社会主义的新型新闻事业而奋



斗。

由于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由于依靠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南方局强有力的直接领导，加上报馆同人的辛勤耕耘，《新华日报》在大后方人民群众中影响越来越大，很自然地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中钉”了。由于形势所迫，国民党当局不能不违心地勉强允许《新华日报》出版。尽管国民党当局恨透了《新华日报》，尽管一纸命令或几个军警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封闭报馆，可是，他们又不能这样痛痛快快地做。因为勒令《新华日报》停刊，实际上就是表示国共合作的破裂，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民党还不敢贸然下手。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压迫《新华日报》：对它实行最严厉的新闻检查，任意涂改和检扣它的新闻和言论的内容；毒打和逮捕它的报丁、报童，阻挠和破坏它的发行；调查和迫害它的读者、投稿者；严密监视它的工作人员和干扰破坏它的正常新闻采访报导工作；制造暴力事件，纠集流氓特务捣毁报馆，破坏它的正常营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自国民党最高当局，下至三教九流的各种黑社会力量，包括侍从室、军委会、中执委、中宣部、内政部、社会部、战时新闻检查局、宪兵司令部、军统、中统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市党部、重庆三青团、重庆市政府、重庆新闻检查处、重庆市警察局以及诸如重庆市报业同业公会中的御用流氓团伙，还有《新华日报》分销机构所在地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统统动员起来，摧残它、压制它、破坏它，使它有名无实。换成另一种说法，就是：“允许《新华日报》出版，但要封住它的嘴巴”，或者是：“只准《新华日报》印，不准《新华日报》卖”，企图使它成为只剩躯壳



没有灵魂而且割断了与读者联系的一份无用的废报。国民党当局“机关算尽”，创造了迫害一家报纸的世界记录。但是，文网虽密，挡不住真理的传播；权重如山，扭转不了人心的向背。《新华日报》在反对这无理压迫中更加光彩夺目，更加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国民党当局唯一的收获就是留下这一份旷古未闻的迫害狂的记录。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无情。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却永远值得记取。今天，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已成为炎黄子孙顺应时代潮流的共同心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凡是亲身经历过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人们，尤其是30年来隔绝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党员，该怎么办呢？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张，台湾国民党当局当如何自处呢？

这本书的出版，我认为还有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这意义不在于暴露国民党的历史劣迹，而在于有利于正确吸取历史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凡是违背民意，压制人民的新闻言论自由，顽固坚持开倒车的做法，最终总是行不通、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如今顽固坚持那不得民心的违反潮流的“三不”政策，使海峡两岸骨肉长期分离不能团聚，经济上不能互通有无，人为地隔绝大陆与台湾的一切联系，这样下去能够行得通吗？违背民意，最终要自食苦果。殷鉴不远，应当猛醒了！读读这本书不妨说是一剂清醒剂，它或许能发人深省，使人清醒，因而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益。

这本书选录的档案，大都是当年国民党当局的往来函电



和内部情报。这些函电和情报的炮制者有他们自己的立场；文内所提到的事与人，有的很难一一查证；有些重要事件的材料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还不齐全，等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应该注意到的。我赞成编者保持档案原来面目，内容文字不作任何改动，尽量少作注释的编辑方针。这些颠倒是非的文字所涉及的事例，有的是有出入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文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错误的整体，而这个错误的整体，又恰恰是一部客观存在的真实史料。它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1986年7月1日



关于《新华日报》放在 南京出版的决定问题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向中国国民党当局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提出，最后经国民党最高当局同意，于1938年1月在汉口公开出版。中共中央还为《新华日报》的公开出版，向全党发布过《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指示中指出：“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因此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一）《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

我引用中央文件，是要说明：《新华日报》是党中央办的党报。尽管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原先的《解放》杂志在延安改为《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可是，常见有人



说《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关报，这并无根据。《新华日报》当年在国内国际所起的宣传作用，也显然与解放区各中央局的机关报有所不同。

在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决定将《解放日报》（因自卫战争中，党中央撤出延安）停刊。中央到西柏坡以后，逐步形成以原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为党中央机关报，这个有光荣历史的报名，用于解放后中国最大、最有革命光荣历史的上海市。将在国内国外有很大影响的《新华日报》报名用在原国民党政治中心的南京市。这一精神，我是从周恩来同志1949年4月底（南京刚刚解放）某日，招待一批知名文化界人士的谈话和宴会上，听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当时被邀请的人，都是马上要南下去上海、南京工作的文化界人士。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是否周恩来同志曾交待我将这个决定直接向刘伯承、宋任穷等同志汇报。而后来主持上海《解放日报》的范长江同志，是我们一起参加谈话和宴会，一起乘饶漱石的专车南下的。

我的记忆相信不会错。事实上，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两个报名同时放在上海、南京，这本身就证明：只能是党中央的决定。

1986. 9. 26于北京



关于新闻写作问题

——在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
全军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我对新闻写作的体会，是很不够的，今天还是一个小学生。过去做了十几年新闻工作，平时也不大注意这个问题。在最近三四年，特别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总社工作时期感觉比较深刻。在延安撤退后，那时新华社总社远离党中央，我们对土地改革的报道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报道，产生了不少错误，显出我们政治水平很低。1948年夏，我们同党中央又会合在一起了，中央和中宣部领导同志对新闻内容和文字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所写的稿子，常常经不起严格推敲，连文法都不通，标点也错误。胡乔木同志常像国文教师一样的给我们改正。起初大家都吃了一惊，想不到做了这么多年新闻工作，读了多少年书，现在还得从头，从文法标点学起。因此不少同志信心甚是低落，我自己也是一个，觉得做一个记者的起码条件都不够，想改行。乔木同志知道这事只是笑笑说：“我完全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要如毛主席所说的：‘不要知难而退，而要知难而进。’不行就要学，就要下苦功。”后来我们知道，乔木同志文章写得那样好，就是苦练出来的。要做好新闻工作，只有下苦功，除此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的深切体验。



我们新闻工作的任务，是用文字来表现现实生活，各位同志在部队中，就是要用文字来反映和表达解放军指战员的战斗和生活。经过我们记者的笔把人民军队的英雄主义，他们特定的风貌、色彩，特定的性格表达出来。我们写一篇消息或通讯，就是要起这样的作用，说明一个问题或解决一个问题。

如何能够把我们这支笔，这件武器的威力发挥得更大，能够很好地反映伟大的现实生活，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最感困难的。根据我自己工作中的体验，我们报纸上许多新闻，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往往缺乏一种力量，就是“没有劲”。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写的文章仅是一种记录、照像。主题是什么？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都不明确。往往是一笔总帐，平铺直叙，样样都说到，什么也未解决，因而思想性很差，很多是纯客观的反映，缺少生命力。这是因为在反映现实时，没有首先将自己的观点、感情、希望和要求，与客观事物结合起来，起点化学作用。“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过雪山本是一种痛苦，但毛主席却能写得这样雄壮愉快，这就是因为这里边已经加上毛主席的伟大的思想与感情了。不仅如此，我们在反映现实时还要注意提炼主题。如果是不管主要、次要，一大堆都罗列起来，就会思想庞杂，万花撩乱，思路不清，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一定索然乏味。这正如加里宁所说，是“没有灵魂的”。加里宁说：要使通讯能感动人，首先要自己能感动，在你的作品中要有你的公民、共产党员的感觉、思想在跳动。这样就有灵魂。我们有些记事新闻写作实在要不得，其中甚至连一个人物都没



有，不要说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了。

第二，一套公式，新闻写成八股，只有几根骨头，许多会议新闻都是千篇一律，换几个名词下次还可用。社会中许多事物的现象是复杂的，但在我们笔下却简单化了。有些问题，原则方针虽然相同，但一切事物的具体变化过程是不相同的，而我们的写作，对于这些事物的反映常常很武断、很主观，没有揭示出事物内部矛盾统一的斗争。如一个人赞成某件事情与其他人赞成某件事情的思想变化是不同的，我们往往疏忽了这些，这样的新闻就缺少血肉。有些报道是很不近人情的，如营业税问题，我们有些新闻把工商界描写为“一致满意”，“觉得很轻松”，实际上不见得人人都那么满意。就是都满意，也各有各的满意法，所以这样的写法不能真实反映此时此地的实际。这就是没有深入去认识一切事物的本质，反而把问题简单化。这比照像还坏，照像即使照得差，总算像个人，可是公式化的新闻，结果是什么都不像。

第三，语汇贫乏，文字不生动。中国语言文字本来很难学，不认真去学，就不能准确生动地传达与表现新的感情、新的事物。《新华日报》副刊，知识分子的气味很浓厚，有些工人的作品经过我们编辑一修改，就成了知识分子的口气。有些新闻记者还欢喜用陈腔滥调来表现新的现实，不善于学习人民活的语言。

第四，我们新闻报道中常常不说明背景，或者不善于概括，就是概括了也不能与典型事实相结合，这也是我们的缺点。新华总社曾介绍毛主席亲自写的新闻，要各地新闻工作同志学着写综合报道。在那几篇综合报道中，不仅深刻地说明了事实，而且说得清楚有力，全篇新闻枝叶并茂、花影扶



疏，配合剪裁都很好，所以很生动，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以上几点是我感觉较深的缺点，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困难。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呢？我现在根据自己的体会，说一点供大家参考。首先声明，这是很不完整的。

首先，要学会怎样观察、辨别、研究问题。社会中许多事物的现象是复杂的，我们如不以大量现象作为根据，通过现象来研究事物的本质，就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会被个别现象所迷惑，就会经常犯片面性错误。古谚说：“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这说明认识人的本质是不容易的，需要下苦功研究。马克思把握事物，不但看到表面而且深入事物深处，从各种事物的互相作用中考察它们，还要追寻每一组成部分的发展历史，然后又放下事物本身去研究它的环境，观察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与影响，然后又回来研究所检讨的事物本质，考察其经历的变化，最后甚至追到相距甚远的作用。马克思就是用这样超群的思想力去研究问题的。这也就概括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方法。古话说熟能生巧，不经过对大量现象的反复研究，就不能巧。我们常说：“这个人很通”，这可以解释为就是能在大量现象中自由来往，做到触类旁通。要做到这一步，非下苦功是不行的。王国维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古以来成大学问大事业者都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说必须先了解许多错综复杂的、没有头绪的现象。（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害了相思病，人消瘦了，他也不管，他不怕艰苦拚命研究。（三）“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说害了相思病拚命寻找、



研究，终于一旦豁然开朗，找到了事物的本质。我们写东西所以没有生命力，没有感情，其中毛病之一就是没有深入研究，把问题搞清楚，就是没有花工夫去想。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报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句名言：“思索，思索，再思索，否则值不得写，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写下来的东西，本身就一钱不值。”这句话实在值得我们当座右铭。马克思写东西就是想了又想，找大量材料，经常推翻自己以前的肯定。学习之道要从这里开始。我们新闻工作者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是不深入，有的应该说是深入了，但感不到新鲜事物，发现不到什么材料，深入宝山，还是两手空空，生活在那里久了，觉得平淡，一般化。这是缺少对新鲜事物之感觉力，自己思想就像枯井，这样写东西无论如何是不会生动的。这是只深入了事物的一部分，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整个事物中去。只有深入的观察、辨别、研究问题，对克服第一个毛病才有帮助。

其次，是要学表现。文字工作就是表现，许多文章的毛病就是表现不出来。要表现人民生活与语言本来是不容易的，如果不下苦功，表现就会更差。马克思把思想与现实材料结合得很好，但他经常不满意自己的文章，他说：写作一方面要有超人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也要有同等的超人力量才能表现出来。我们怎样学呢？毛主席说：文章要写得好，一个是要有逻辑的力量，一个是文字要生动活泼，文句恰当。逻辑力量就是说明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其道理要条理分明，事实确凿，无懈可击。许多伟大的革命领袖都会掌握这点。列宁演说总是要对演说的内容和形式，津津有味地加以研究，因此他的逻辑力量能抓住所有听众。斯大林初听列宁演说时，就被他的逻辑力量所吸引住了。斯大林的



写作也是简明有力，条理分明，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一点不含糊笼统，而我们却常常用了千言万语还漏了许多道理，最后就只好靠武断。我们有许多文章往往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强词夺理，逻辑力贫乏时即加武断，甚至是想当然下结论。但我们看《资本论》只是心平气和地在说理，并无张牙舞爪或是用三个惊叹号的地方，然而却指导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连敌人对《资本论》也感到无懈可击。所以，鲁迅说：“辱骂不是战斗”。逻辑力量是表现中的第一要素。

第三，是要学改文章。自己的文章不但自己改，还要请人改，这是一个作家所常常不能做到的。但人民的作家却应当作到，因为我们并不以为“文章自己好”，而是我们还希望人人都能写，写得好。别人改好办，难办的是自己如何能修改。有些人自己改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不愿割爱，不愿花苦功。自己写成的东西首先应当自己多看几遍再多改几遍，这是提高写作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鲁迅都是主张文章要反复修改的。把他们改过的文章原稿拿来研读，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个人写文章不仅要在写出之后改，写之前也要思想上多酝酿，多与同志们商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欧阳修写文章起先也不好，后来看到韩愈写的文章原稿改得一塌糊涂，才恍然大悟，最后终于写好了。

第四，是学习人民的语汇。我们对于推敲字句一般是不大注意的，有的还发生反感，认为是“吹毛求疵”，认为是想做章太炎。以前发现中国古代人对推敲文字很注意，但他们往往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所以对它不十分重视，后来发现外国革命领袖也很注意这点。加里宁说：要用自己思索过的



语句。列宁为研究文学可以连续几个钟点查字典。高尔基不但随时记下所见的生动事迹，并把生动的群众语汇也记录下来，想不起时就去翻翻。我们在写作中往往字句死板，含混不清，陈辞滥调，词不达意，甚至用错，成了相反的意思。我们有许多语汇，都不是直接从实际概括得来的。有些成语与典故早已不适合现在需要了，但仍是程咬金十八斧，常常请出来，弄得文章面目可憎。与此相反，另一个毛病是字句雕琢，堆砌辞藻，“眼睛吃冰淇淋”，只求文字的美丽，但内容却很贫乏。再即是洋教条，不会活用，这表明思想上不认真研究，平时不很注意记下群众语汇，不很注意文字的推敲。中国古文学家为文章而文章是不好的，但他们推敲字句的认真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从上面看来，我们新闻工作者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学习辩证唯物论，要学习政策，要学习文学，要学习语言……但首要的问题还是要下定决心，长期献身于人民的新闻事业，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要搞通思想，安心工作。做新闻工作就是要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新闻工作者的前途就是如何做好一个人民的记者，通过自己的笔很好地来报道与指导人民的斗争；要做一个名记者，这个名是必须由人民来批准的。这当然很不容易，但只要专心致志下苦功，工作总是会逐渐做好的。天才当然有，但真正的天才应该是从专心致志下苦功夫得来的，绝没有天上掉下来的。不花力气，不下苦功，决不能成为天才。

（原载南京《新华日报》1950年3月9日）



增强党性 深入群众

——学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出版，实在是我国新闻界的一件大喜事。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将通过学习这本书而吸取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增强品德修养和才干。如果学习是联系自己的实践的，经过反复探索和体会，收获一定会更大一些。可惜我脱离新闻工作实践太久了，不太体会今天新闻工作者的苦辣酸甜，恐怕话说不到点子上，《新闻业务》编者来约稿，我是很有点胆怯的。

当然，联系实际，缺少今天的实际经验，也还可以回顾一下历史经验；既可以联系成功的经验，也可以联系犯错误的教训。我这里就联系犯过的错误来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我读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后印象最深刻的，是1942年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给周恩来同志电文中的那段话：“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这寥寥数语却提出了党的新闻工作者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这就是“增强党性，反映群众”八个大字。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这本文选里的一个中心思想。

党性这个词，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增强党性也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可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努力去正确地



宣传党的政策，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见《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不就是党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吗？毛泽东同志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的：“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党报要“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些话，不就是反映群众的最好说明吗？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是密切相联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但是，要正确宣传党的政策，确实也并不简单，我就在这个问题上犯过很大的错误。那就是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一文中所指出的那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还在陕北，我工作的所在单位新华社总社和陕北广播电台远在晋冀鲁豫边区。总社的同志在廖承志同志领导下，一边工作，一边以远离中央为苦。我自己感到，在时局变化如此重大的时刻，难以经常请示党中央，犯错误几乎是难以避免。可是错误犯得那么大，实在也出人意料。当时的震动、内疚以及严肃检查写出书面检讨等等情景，如今记忆犹新。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特别令人难忘，真可说是得益不浅。我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做新闻工作的，解放战争中三年的新闻实践，对我真是最好的学校。解放后，我看到有些没有到解放区仍然留在国民党区域或海外工作的同事，总感到自己这三年实在幸运，起码是开始懂得正确宣传党的政策是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半点不能



掉以轻心。

当时为什么会犯错误？原因虽然很多，我觉得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是一个大原因。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同志都知道，1947年到1948年之间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在解放区内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整党都在开展。1947年下半年是反右倾斗争如火如荼，到了年底与第二年初，群众运动中的“左”的毛病出现了。在这种形势转变关头，固然容易犯错误，但是思想上的片面性限制或闭塞了自己的聪明，不能正视现实，及时发现和指出问题，而去传播错误的言论，这就势必远离党的路线政策。

比如拿我自己来说，1947年下半年在一次行军途中，看到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斗争地主，最后把一家中药铺分掉了，你拿一个抽屉，他拿一个抽屉。药柜子这么一分掉，药店自然不存在。我看了心里有些怀疑，觉得这样干，农民所得无多，而损失很大，病了没处抓药，到头来还是农民吃亏。

我这个怀疑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当时不敢想下去。因为我一脑子反右倾斗争的思想，认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大原则，群众运动中即使出现某些缺点偏差，也用不到你去指手划脚，要靠群众自己认识、自己去改正。以这样的片面性来看待运动，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片面性的毛病是每一个新闻战士都需要认真对待的。不仅解放以后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出现过这方面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也曾经对这作过严厉而又深刻的批评，而且我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过去有过、将来也会碰到“左”或右的干扰，党也曾经或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提出反对并防止“左”倾或右倾的斗争口号，以保证党的政策贯彻执行。所以每一



个新闻工作者任何时候都要想到，提防片面性作怪。

片面性是形而上学。如果采取开中药铺的办法，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不突出事物的矛盾，不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字不鲜明，不泼辣，不尖锐，那又要变成八股调了。这决不是医治片面性的药方。医治之道，除了学习理论之外，我看还是必须像毛泽东同志一再教诲的那样：深入群众，参加实践斗争。不能了解群众的真实心情、意见，任何高明的记者也无法防止倾向性错误。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的了。

正如1948年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忘记了……就会迷失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批评，同样是针对着我们那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研究中央政策，纠正错误观点》一文，是另一个具体批评实例。如今谈起来已成为历史。然而，为了实现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十二大所确定的总的方针任务，依然需要我们时时重温这些经典性的论点。党的十二大所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受到全国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和政府制定了许多具体政策，都要依靠我们新闻战士来宣传。比起战争年代来，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各种“左”的和右的干扰不可避免。因此，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政策宣传中，一度忘了总政策总任务的教训，也同样值得新一代记者的警惕。

最后，我认为新闻工作者永远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战士。我们党的宗旨，党的新闻事业的任务决定了这一点。我认为，一个具体的衡量的标准应该是：凡是向群众宣传的道理和导



召群众去做的事,自己要首先做到,作出榜样。去年有一个地区报社的同志要我为他们的报纸复刊写点什么,我写了三点希望,其中一点就是上面讲的这个意思。那位同志后来给我来信说,你讲的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还是有意义的。现在,我仍然拿这个老生常谈来结束这篇文章。希望新闻界的同志们在研读毛泽东同志这本新闻文选之余,读一下《周恩来选集》(上)第94页《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的一段话:千万不能把神圣的真理宣传,“变成空谈”,变成“卖狗皮膏药”。

让“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永远放射光辉。

(原载《新闻业务》1984年第2期)



缅怀邵飘萍 学习邵飘萍

——在邵飘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能与金华的新闻界、文化教育界的同志，一起来缅怀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邵飘萍烈士，缅怀他的卓越贡献，感到很激动。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来纪念他、学习他，并发扬他的可贵精神，继承他在新闻事业上留下的宝贵财富，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认为对邵飘萍烈士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还要重新进行估价。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旧民主革命时代和新民主革命的开端时期，他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无畏战士，又是传播马列主义、介绍新生的苏维埃的先驱者。他一生忠于真理，在当时全世界都在痛骂“赤祸”的逆流中，他坚强不屈，坚持真理，勇于斗争，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以身殉报，继续战斗，一定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邵飘萍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在封建军阀的屠刀下威武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志气。我们金华地区在历史上的光辉人物不少。古代的不说，就近代来讲，邵飘萍就是其中之一。我趁这个机会，建议他的故乡——金华，可以塑造他的塑像，甚至半身铜像，使金华人民，特别是后代人，知道在我们的故乡，曾经诞生过一位优秀的文化战士、杰出的新闻记者。



今天，我们新闻界纪念他，缅怀他，更要学习他。邵飘萍是一个非常才华的新闻记者。就新闻工作本身来说，他是一个多面手，善于写新闻、通讯、评论等各种文体。他又是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的新闻著作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对推动和革新我国的新闻事业起了积极作用。我们更要学习邵飘萍的高贵人格，学习他坚持真理、勇于开拓的精神。他最喜欢这几句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以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是身体力行的。他不仅为真理而献身，而且是真正为了人民，引导人民前进的先行者。

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还要继承他的宝贵财富，整理和出版他的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著作。现在北京也在纪念他，但据我所知，解放后还没有出版过他的书。我建议不仅北京、杭州的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著作或文集，金华也可以考虑。他的政论文章和新闻学理论尽管某些观点有些陈旧了，然而仍然能给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以丰富的营养。对封建社会的一些书我们都要批判地继承，加以出版，对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有贡献人物的文集更应出版。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邵飘萍烈士既要出他的书，还要加强对他的研究，我们过去对邵飘萍烈士估价不够，研究不够。希望在纪念他的同时，把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起来。

（原载《金华日报》1984年11月2日）



纪念《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①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殉难五十周年，我这个当年《申报》的工作人员能够参加上海举行的这个纪念座谈会，与大家一起缅怀这位对人民做了好事的新闻事业家，回顾当年种种，自然心情激动，感慨系之的。

50年过去了。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每逢量才先生忌日在《申报》楼上举行悼念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而史量才先生的一生，却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更加显出他的光辉，更加值得后人的纪念。

1934年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先生于杭沪公路途中，这充分暴露了反动势力的残暴和丧失理性，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又冠冕堂皇地追悼如仪，甚至玩弄含血喷人，企图嫁祸于人的勾当。这残暴与虚伪表现到了顶点。当年种种政治丑态，如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欲呕。

史量才先生从清末经营《申报》以来，使《申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份大报。《申报》实在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宝库，是史学工作者非常宝贵的资料之海洋。史量才先生就是这部史册的主持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史量才先生本着

^① 本文为作者1984年11月在上海新闻界举办的史量才殉难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



爱国热情，愈益与人民大众的感情相联系在一起。他热情支持上海的抗日战争，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申报》上出现了《自由谈》副刊，创办了《申报月刊》和其它许多文化事业。著名思想家和文豪鲁迅以及茅盾等人的不朽杂文和作品出现在这些刊物中，这是中国进步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是《申报》对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功绩。

也正是由于史量才先生生前不断进步的遗范，使《申报》同人在他殉难以后，在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时刻，能够高高举起全国团结抗战的旗帜，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动员作用，在抗战初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凡此等等，都使我们由衷的尊敬这位爱国的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史量才先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值此量才先生殉难50周年的时候，我们庆幸《申报》的影印本已经出版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工程。我在这里还希望上海新闻界的同志们，能够组织力量进行《申报》的研究，并且组织力量发掘《申报》当年留下的宝贵资料，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以收集整理，有条件的则编辑出版。我想这也将是一份留给后人的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党的好朋友——俞颂华先生

算起来已有40年了。当我在解放区获悉俞颂华先生逝世噩耗时，心中非常难过！俞先生若能活到解放后，他的朋友很多，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使他能如愿地继续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我想到我真正从事新闻工作，开始于1936年1月在上海《申报》担任《申报周刊》编辑的时候。

当时的《申报》，是由史量才先生出资办的一家著名报纸，社会影响颇大。《申报周刊》是《申报》的一个附属刊物，由俞先生主编。开始是月刊，1936年初改为周刊出版，每期随报附送，不另收费，也可单独订阅。暑假两个月内，任何学生只要函索，均可寄赠一份，所以该刊发行量是很大的。

我进《申报》，完全是偶然的。1934年到1935年，我因察北抗日同盟军失败而回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不知怎么，有一篇稿子投到《申报月刊》，竟为俞颂华先生所赏识。他那时正在物色编辑人员，就把我约去谈话。当场找了一篇文章叫我翻译。来往了两次，居然很快决定要我去任编辑。

就在我去《申报》工作的前夕，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下影响到了上海。大概在12月25日，上海各界也举行了盛大的反日爱国游行，我也参加了。队伍在南京路上受阻，这时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把队伍带到宝山路



东方图书馆广场(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开了大会,接着继续游行。在经过北四川路时,遭到事先布置的租界大批巡捕及乘三轮卡车的气势汹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殴打、冲击,不少人受伤,队伍无法通过,只好被迫折回宝山路,高呼口号而散。恰好《申报》也有记者参加了这天的活动,并拍摄了照片。

1936年1月,我去《申报周刊》就职那天,新的一期刚刚出版,我看见在封里的时事照片页上,赫然刊登着我的一张照片。我站在两个受伤的青年中间,正在振臂高呼抗日口号。我心里想,这下,我的饭碗要“砸”了。三四天后的一个下午,俞颂华先生在编辑部其他同人下班后,把我约到他办公桌前,指着那本周刊上的这张照片说:“石先生,这是不是你?我要早知道,真不敢请你来工作了。”他还说了《申报》《申报周刊》影响很大,在这里工作,特别要谨慎等语。我以为要被辞退了,结果并没有。自这次谈话后,俞先生一直没有再提这事。对我的工作却是信任有加,并曾约我同去广西等处采访。1937年,“八·一三”抗战开始没有几天,俞颂华先生就离开上海赴广州,后又转到汉口,参加《申报》汉口版的筹备工作。那时我尚在上海申报馆。10月上旬,我接到他的来信,要我也到汉口去一起参加筹备工作,我万万没有想到俞先生对我竟如此的关怀和信任。当即极其兴奋地在苏州河边搭上了一只15世纪式的运输木船,其中满载着准备运到汉口供《申报》汉口版所需要的新闻卷筒纸。开船后,整日在敌机的威胁下,经历了五个昼夜的航行,逃脱了几次的危险,终于到达了西行第一站的苏州,使我脱离了将沦为“孤岛”的上海。

在《申报》汉口版即将要出版时,想不到俞先生因故离开



了汉口。不久，我也转到武汉《新华日报》去工作了。

今年是俞颂华先生逝世40周年，我至今还是非常怀念他。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典型。他平时谈话不多，遇事稳重，操守甚严。1919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汹涌澎湃的思想、政治巨变。他长期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也曾在大学任过教。从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开始，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在主编《申报月刊》与《申报周刊》时期，就我所知，他发表了不少介绍苏联建设和蔡元培、胡愈之、竺可桢、俞寰澄、马寅初、金仲华、马星野、鲁迅、茅盾、巴金等的文章。尽管他不是那种激昂慷慨的人，但他有自己的见地。在《申报周刊》期间，他与文化界许多著名进步人士，包括邹韬奋在内，都很熟悉，有交往。我和他共事的近二年时间里，他不仅热情地支持宣传绥远抗战，关心爱国运动，也支持编辑部写同情农民痛苦遭遇的文章和短评。他自己还在1937年4月去陕北访问，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

当时《申报月刊》《申报周刊》有一个经常撰稿的托派分子郑学稼，以日本问题权威自居，作风恶劣，写的文章浅薄无聊。我们向俞先生说明了情况后，俞先生从善如流，终于把这个托派分子的文章排除出刊物之外。

抗战后期，俞先生的生活十分坎坷。他在重庆担任《国讯》主编时，我们常有会见面。他身体虽已病弱不堪，然而非常关心国共谈判，关心民主运动和国内和平。他经常鼓励我为《国讯》写文章，我用笔名曾在《国讯》写了好些时事评述（从那时的情况，可以看到俞先生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好朋



友了)。

1946年9月，我因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南京版不成，前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请示南京报馆人员撤退事宜；我也曾到江苏路俞先生的家中探望病中的俞老和他夫人。我们对国事的恶化，谈了很多；我告诉他，我将要回解放区，他非常关心中共的主张和今后的时局变化，情绪有些低沉；但并不失望。那一次的谈话，就成了最后的话别！

我和俞先生的短暂相处，使我得益很多，不仅帮助我学到了编辑业务方面的知识；更有意义的是：从他的为人，使我认识了在性格、行事上有别于邹韬奋、章乃器等人的一类正直知识分子，感到尊重和了解这种朋友，团结他们共同奋斗的重要。同俞先生相处的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生活，特别是对我解放后在与知识分子相处时应该如何待人接物方面得到很多教益。这位默默地为中国进步文化工作做过贡献的、正直的、清贫自守的爱国爱人民爱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今年纪念俞颂华先生逝世40周年之前，我早就听到俞先生的《文集》正在搜集中。我希望这本《文集》能早日问世。以便使更多的新闻界人士和新秀，知道这位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了解他为中国新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且从他的为人方面获得教益。近闻新闻界有不少人还希望举行一次“俞颂华先生学术讨论会”，如能实现，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原载《太仓文史资料辑存》第4期，1987年10月)



潘梓年同志与《新华日报》

潘梓年同志是我们党内的知名学者，也是新闻战线的一位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他一直担任《新华日报》社长职务。我们和他一起在报馆工作了9年多的时间。他是《新华日报》同志尊重的领导人，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潘梓年同志逝世10多年了。对于那些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存亡危急的关头，在革命事业异常艰苦的时节，挺身而出，做出过贡献的人，人们总是怀着深深的景仰，殷殷念记着他们。正是在这种感情的催促下，我们写下这篇回忆的文字。

大布是其衣 一生只服务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成为我党在国统区从事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斗争，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的有力舆论武器，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37年10月，由党中央营救出狱不久的潘梓年同志，从周恩来同志那里接受了筹办《新华日报》的任务，他与章汉夫等同志先在南京，后在汉口，四处奔走，找房子，搞设备，办交涉，经过艰苦努力，克服了国



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报纸终于在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梓年同志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任命为社长。他同大家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同志们都亲昵地称他“潘老总”。由于他善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一张新型的党报在国统区影响越来越大。1938年10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战事危急，《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坚持在武汉出版到最后。同时为了筹备报纸在重庆出版，梓年和李克农等同志，奉命率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乘江轮向重庆撤退。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附近，突遭日机轰炸，轮船被炸沉，25名同志（《新华日报》16人，八路军办事处9人）遇难。烈士当中就有梓年同志的兄弟潘美年。他压下失去亲人的悲痛，带领同志们徒步行进，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辗转，终于抵达重庆。第二天，他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梓年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党报事业，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他是报馆里主要负责人，但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新华日报》的干部实行半供给制，梓年同志每月的津贴才比我们多两块钱。他和报馆全体同志吃一样的伙食，毫无特殊。他本来是吸烟的，后来有了孩子，负担重了，就改抽卷烟为烟斗。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总是着一件灰布长衫，与国民党那些衣著华贵的“新闻官”一比，更显出共产党人朴素、廉正的本色。邓初民先生曾经赞誉梓年同志“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是说得形象，很恰当的。

在《新华日报》这个充满了革命情谊的集体里，梓年同志的年龄仅次于熊瑾玠同志，是一个宽厚的长者。他戴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总挂着笑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连报童们



都喜欢和他摆龙门阵(四川话，聊天的意思)。这些报童，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报馆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建立了这支自己的发行队伍。梓年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报馆在重庆时，编辑部设在化龙桥，而报童多数住在城内民生路营业部。梓年同志经常进城，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系，开展工作，每次都要在营业部会客，晚上就住在那里。他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报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组织他们学习文化，教给他们革命道理和斗争方法。在严酷的环境里，这些报童得到很大的锻炼，在党报和千万读者中间建起了一道无形的桥梁。现在，这些当年的报童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其中许多人担任了中层领导骨干。每当回忆起当年这段生活，他们总要深情地谈到“潘老总”。

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办报，梓年同志不但要尽心处理报馆内部的各项任务，而且常常要不避艰险，与国民党的特务、警察打交道。每当发生报馆工作人员和报丁、报童被抓被打事件，他总是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有关当局据理交涉。1940年特务在成都制造了“抢米风潮”，借机逮捕了罗世文同志(当时公开身份是报馆的成都分销处负责人)。梓年同志奉南方局指示，赶往成都营救，返回重庆途中，险遭戴笠派遣特务的毒手。就这样，在9年多艰难的岁月里，他竭尽全力，辛勤工作，没有辜负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

如君党性实堪钦

梓年同志待人谦和，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他在日常的一些



事情上，有些近于一团和气。但是，在重大的问题面前，他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在武汉时期，王明以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宣称“要按欧洲的经验来抓报纸宣传工作”。王明经常要求把自己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和讲话刊登在报纸显著位置，标题字号要大，署名也要醒目，还常常要求配发他的“标准像”，又要在报面上大捧蒋介石、宋美龄。对于王明这套做法，梓年和许多同志很不满意，作了许多抵制，所以他就成了王明的重点打击对象。有一次，王明为一点事由，把梓年和我们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横加责骂，临散会时，王明要梓年同志表示态度，他当面顶了王明。王明咆哮起来，又骂了两个多小时。不久，王明准备从组织上开刀，用调离的办法，除调出一批人作战地记者外，还企图把梓年调回延安。但是，他没有屈服于王明的打击和排斥。后来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一企图才没有得逞。

1938年10月报馆迁到重庆以后，他就一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正如梓年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当时“在工作中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不论在形势多么险恶的情况下，梓年和大家都保持了乐观精神和旺盛斗志。记得周恩来同志45岁生日时，梓年代表报馆全体同志写了一篇祝词，里面有“严若师，慈若母”这样的话，不仅说出了大家的爱戴和崇敬，也表达了梓年同志的深挚感情。对于周恩来同志交办的工作，梓年总是全力以赴地做。周恩来同志曾指示他通过报纸在文化界、学术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就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郭沫若、马寅初、邹韬奋、陶行知等社会知名人士中间，与他们交换意见，邀请他们为报馆撰稿，后来连冯玉祥将军也经常把诗作交给我们发表。



为了团结学术界进步力量，他发起组织了“学术研究会”，使一批倾向进步的大学教授和许多埋头书本的学者，投入了抗日民主斗争的洪流。《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就曾聘请他们中的一些专家代为编辑。《新华日报》每年举办创刊纪念活动时，都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这正是检阅统战工作的时机。在创刊7周年联欢会上，梓年同志兴致勃勃地同沈钧儒老先生赛跑，由李公朴先生裁判，一时传为佳话。这些工作和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各界人士与党的关系。1942年《新华日报》整风改版之后，周恩来同志建议，报馆内部制定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以巩固和扩大整风成果。梓年同志和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建立了工作人员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对办报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梓年同志心胸坦白，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同志向他指出，他的战斗性还不够坚强。以后他很注意增强自己的斗争精神。有一次，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几个家伙，突然闯到报馆营业部，检抄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七百多册。梓年同志闻讯赶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痛斥了这种无理行径，把书全部取回。那几个家伙向上报告说，潘梓年“态度甚为强硬”，并哀叹“今后对该报检查困难必定增多也”。

周恩来同志对潘梓年这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不但严格要求，而且也表示了极大信任。人们都熟知“皖南事变”中《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和题诗的故事。就在那个气氛紧张的夜晚，周恩来同志要梓年等同志马上到几家影响很大的民间报馆去，揭穿国民党歪曲真相、发布命令，封锁《新华日报》，妄图一手遮掩天下人耳目的阴谋。在如磐



的夜色里，梓年同志手提一盏八角灯笼，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崎岖的山路，走访了《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报馆，沉痛说明“皖南事变”真相，阐明我党立场，希望他们在舆论上主持公道。进步的报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向我表示同情和慰问。随着形势的恶化，《新华日报》由200来人疏散到只剩80来人，而且准备着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留下工作的人员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如报纸被封，人员被捕等。而梓年则是周恩来同志指定留下来坚持到底的人。这是《新华日报》创刊以来最艰难的时期，梓年和留下的同志一起顽强斗争，坚守住了党在国统区这块唯一公开的舆论阵地。董老曾以“如君党性实堪钦”的诗句赞扬梓年同志。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不倦的学者与战士

梓年同志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在狱中，他曾潜心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当时，叶青（任卓宣）打着“理论家”招牌，以研究逻辑学的名义，歪曲辩证法，贩卖唯心论，欺骗向往进步的幼稚青年。一些反动政客也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些都是配合蒋介石剿共行动的反动谬论。1937年6月，梓年同志出狱，他很快写出了《逻辑与逻辑学》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本论著答复了反动派在理论上的挑战，系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书中的许多论述，与毛泽东同志当年8月发表的《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完全相符。梓年同志怀着对领袖的深挚感情，将此书寄赠毛泽东同志。不久，毛主席复信，表扬了梓年同志在哲学领域做



出的成绩，并勉励他在哲学特别是在逻辑学方面继续努力。我们和梓年同志的兄弟潘菽同志当时都看到过毛主席的来信，并向他祝贺。梓年同志却从不以此炫耀自己。该书初版时，他在《弁言》中希望读者多加批评，以便据以进行修改。解放后再版时，他在前言中表示，在重写之前此书照原版重印，是为了“敬请批判”。这种学人的好学风，在梓年同志身上是非常突出的。这本著作，在今天看来，虽然还有个别论点不够正确，某些论证不尽精当，但在30年代，实开我国辩证逻辑学研究之先河。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哺育了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遭到国民党的严厉查禁。

在《新华日报》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办好党报，梓年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但他并没有放下战斗的笔。在繁忙的公务中，他挤出时间写社论，写专论，写长枪大戟式的理论文章，也写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御用文人陶百川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嚷“三民主义革命成功了，马列主义只有失败到底”。梓年同志针锋相对，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一文，痛斥陶百川的胡说八道，热情洋溢地宣传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的真理。在《新华日报》上，几乎每个月都有梓年同志的文章，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竟有十来篇。这种榜样的力量，带动了编辑部的同志们。

抗战胜利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南京等地创办《新华日报》，扩大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1946年5月，梓年同志奉命去上海，与章汉夫等同志准备出版《新华日报》和主持《新华日报》总馆的工作。抵沪不久，全面



内战即告爆发，国民党百般阻挠《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在这十分艰难的环境里，梓年同志仍然不断给《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撰写文章。1947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前夕，重庆报馆的同志们收到了梓年同志寄自上海的稿件《九周年怀渝社诸同志》，读着这篇情深意挚的文字，大家不禁热泪盈眶，受到很大鼓舞。

1947年2月底，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强行封闭了重庆《新华日报》，并要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人员限期撤退。3月初，梓年同志随董必武同志等返回延安。到延安第二天，他连长袍大褂都来不及换，又随党中央机关干部徒步撤离。可以说，他是为《新华日报》奋斗到最后一刻。

十年内乱初期，潘梓年同志垂垂老矣，他受人愚弄，说过一些错话。但是他始终对党的事业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在他整个光辉的一生中，这不过是白璧微瑕。潘梓年同志生于1893年1月11日，1972年4月10日屈死于狱中。

在深切怀念潘梓年同志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他于1940年春发表在重庆《新蜀报》上的一首咏雪诗：

一片一片又一片，
飞上河山皆不见，
前消后继更凶猛，
终把河山全改变。

这首托物育志的小诗，是他在国民党狱中为激励难友意志而写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在今天向四化进军的历程中，不也



很需要这样一种勇气和信念吗？

(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2月25日，与徐迈进同志合署发表)



忆《新华日报》第一任 总编辑华岗同志

1937年11月，党组织分配我去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我便奉命到汉口大陆里的报馆去报到。出来同我谈话的是一位30多岁、看上去老成持重的同志，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华岗，现在用华西园这个名字。那次谈话就是我们相识的开始。

当然，华岗这个名字，我是早已熟知、久已敬仰的。在1928至1929年，我开始参加革命的时候，就读了不少他的文章，特别是30年代初期出版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火与剑的著作，使我或类似我这样追求真理的年轻人，受到了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他的那部书在今天看来，可以说尚有一些不足与缺点，但是在当时，无疑是黑暗中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明灯。我同这样有学识的革命同志一起工作，内心感到非常高兴。

在《新华日报》筹备以至正式出版那段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们日夜工作在一起。我是一个版面的编辑，他掌握编辑与评论的全面工作。工作完了，我们睡在同一间寝室里，那一段时间朝夕相处，我对他的印象也逐渐加深。首先是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谦逊的作风，给人以一个忠诚的老革命战士的形象。华岗同志刚从国民党的监狱被保释出来不久，5



年的牢狱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他的脸色苍白有些浮肿，神态凝重中也显露出遭受折磨的种种痕迹。可是对于繁重的工作，而且是不熟悉的编报工作，他是把全部精力都放进去了，从新闻和文章的修改到撰写专论、版面的编排，他都亲自动手和过问。他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华岗同志的好作风，很快地把编辑部的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实践中办起了一张与资产阶级报纸根本不同的、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的报纸。正如他后来说的：“起初我们担任这一神圣工作的同志和朋友，对于新闻事业都没有什么经验，也缺乏新闻学知识，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摸索中进行。”是的，中国人有“创业艰难”的说法，《新华日报》的诞生，这里面凝聚着华岗同志多少心血啊！

华岗同志做事踏踏实实，不喜欢哗众取宠的花架子。他待人十分诚恳，生活也很简朴。当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想把这张党报抓到他个人手里，报纸工作稍不如他的意，便把社长、总编辑、经理和我们几个主要编辑叫去训话，一训就是半天，不容任何人说一句解释的话。王明的家长作风和风头主义，引起我们的很大反感。我们当时在寝室里闲谈，便经常议论到王明的那一套恶劣作风。现在回忆起来，华岗同志比我们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更能从政治上来看问题。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这番话是1938年一二月间说的。那个时候，王明的气焰非常嚣张，共产国际代表这个头衔是多么显赫，特别是对白区的共产党员来说，连遵义会议以及有关党中央的许多情况都还不清楚，加上王明的如簧之舌也确实迷惑过一些人，而华岗同志不愧是一个优秀的革



命战士。正因为如此，他遭受了王明的排挤和打击。1938年春，他被派往东南战场作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写下了第一篇战地通讯：《活跃在东南战场的新四军》，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报纸上发表。华岗同志从东南战场回到武汉不久，又被派到重庆去筹办《新华日报》，准备武汉一旦失守，报纸不致中断出版。他率领一部分编辑、印刷、营业部门的同志，携带一部分物资，乘木船溯江而上。在重庆经过同志们们的共同努力，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的那一天，《新华日报》就在重庆出版了，一天也没有中断！

报纸在重庆出版以后，华岗同志写了不少战斗力很强的文章。如1938年11月，正值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开会，邹韬奋在会上提出要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的议案，《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也发出强烈呼吁，一时造成了巨大的声势，华岗同志亲自写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与争取抗战胜利》一文。由于《新华日报》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斗争艺术之一就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利用国民党一度有过的抗日言行，来反对它的妥协投降，利用国民党一度采取的某些进步措施，来反对它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掀起反共的逆流。华岗同志的这篇文章，正是在争取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具体表现我党这种斗争艺术的一个例子。

《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向报馆全体同志表示祝贺，表彰了报纸出版一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华岗同志那时担负着报社的总编辑，以他的名义，写了《本报一年来对于时局的主张》，从六个方面对《新华日报》一年来的言论作了概括和总结。他最后深有感触地指出：“过



去一年，是本报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一年。”

1939年的秋天，华岗同志因故不得不离开《新华日报》，那是国民党加紧限共反共的时刻，艰巨的战斗正摆在同志们面前，他的离去自然使一些同志感到依恋。后来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到西康、云南等地，为分化争取当地上层人物，团结教育各界民主进步人士做了大量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华岗同志虽然人离开了《新华日报》，但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1943年他还为报纸写了《整风一年》、《大后方农村经济的特质和改善途径》等文章。华岗同志对整风运动始终抱着积极热情的态度，他在《整风一年》中认为，党内存在的非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东西，“都是妨碍我们发现客观真理与团结革命力量的东西”，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革命，将肃清遵义会议以来仍然存在的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对党的建设十分必要。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有关整风的演讲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找出了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各种毛病的根本症结，击中了那些目前尚残留在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的致命要害，揭破了产生这三股歪风的社会思想的根源，并切实指示了改正思想及转变作风的道路和方法，唤醒了大家自觉起来参加整风学习，提高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地位”。《整风一年》是华岗同志的心声。华岗同志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从革命斗争实践和他渊博的革命历史知识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内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这篇文章是他一贯服膺毛泽东思想、反对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深刻体会的记载。

1946年华岗同志作为中共参加旧政协代表团的顾问，又来到了重庆，我们阔别多年又得以重逢。这期间他先后为



《新华日报》写了四篇专论：《简论所谓东北主权问题》、《论改组政府的主要关键》、《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道路》、《制宪奇观》以及其他一些文章。1946年夏，周恩来同志同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我奉命在南京筹备《新华日报》，华岗同志去了上海。后来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南京和上海的《新华日报》筹备工作无法进行，我即将返回延安。10月的一天，我在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还见到华岗同志。他当时约我到一家小小的罗宋菜馆吃饭，殷殷地询问在南京新华同仁的情况，并告诉我，他仍要为重庆《新华日报》写稿。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在内战烽火已起，它的光荣战斗使命即将结束的时刻，报馆隆重举行了纪念活动。这时华岗同志从上海写去了《坚持真理与为人民服务——为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而作》。他把《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总结为“坚持真理与为人民服务”，指出9年来的事业证明了上述办报方针是最正确的办报方针。华岗同志揭示了我们党报的最本质的特点，他阐述道：“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切实与群众结合，与实际结合，才能真正把握具体的真理，同时也要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来处理问题，做到真实的报道，把每一事件的真理所在提示读者，借以推动人民解放斗争，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最大要求。一个进步的人民报纸的特点，就是把这两者密切结合并统一起来，而这正是我们增进力量与克服困难及争取进步的最大保证。”可以说，这篇文章就是在今天，对于我们的党报坚持什么样的方针，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光彩。华岗同志虽然担任《新华日报》的领导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他对《新华日报》、对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华岗同志1924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共青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浙江省委书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顺直（河北）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兼《列宁青年》主编、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等职。1928年曾去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1932年在前往满洲省委工作时，中途在青岛被捕。1937年10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以后，由组织交涉出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云南、西康等地做统战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出席旧政协代表团顾问、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

解放以后，华岗同志到山东大学主持工作，我们天南地北，很少见面。1954年我到济南开会，恰巧碰到他，他又约我去一家饭店吃饭，相见甚欢。他仍然像一个兄长，对我问长问短，关怀之情溢于言表。他约我有机会时到青岛去，我答应第二年暑天前往。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955年秋天传来他锒铛入狱的消息，我不禁愕然……我不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不相信这位忠诚的老党员会犯下什么反党叛国的“罪行”，然而这消息毕竟是无情的事实。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每当我想到华岗同志，心中总是一阵隐痛。正当他年富力强之际，领导岗位在等待他发挥作用，学术领域在期望他贡献才智，他却蒙受了不白之冤，入狱长达17年之久。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时期，他更是遭受了不少苦难折磨，终于



在1972年5月17日含冤逝世。

一直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岗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他的一些情况我才逐渐知道。他在狱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谎言总是长久不了的。他写下了如此慷慨的诗句：“双膝未展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他的几十万字的著作《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试释》、《美学论要》、《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规律论》正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正是他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证明。华岗同志高大的形象，有如中外历史上那些备受摧残或在狱中十分艰苦条件下著书立说，留芳青史的英雄们一样，令人崇敬。

1980年3月28日，党中央作出为华岗同志平反的决定，7月5日在济南隆重举行华岗同志追悼会，邓颖超、彭真、胡乔木、王任重等同志送了花圈。25年过去了，我们曾和他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新华日报》老同志，心里才得到宽慰。当“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为一个贬义的历史名词时，我们才发现党和国家付出了无法估计的代价。华岗同志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说得多么好：“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像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我们要把华岗同志的这些话，连同深刻的历史教训一并牢牢记取！

（原载《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红色管家数此人

——怀念熊瑾玎同志

老革命家、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唯一党报——《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熊瑾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今年1月14日是他百岁诞辰。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在记忆中渐渐地模糊了。然而，熊老这位红色理财家的音容笑貌，总是那样栩栩如生地长留在同他共事过的战友们的脑际。在我们的眼前仿佛又呈现40多年前抗日战争年代，重庆化龙桥山沟里，一排排简陋的竹编泥糊的平房里的种种情景。

聚在化龙桥报馆的一大群二三十岁，有的只有十几岁的工作人员队伍中，有一个50多岁年纪，穿着一身半新半旧的长衫，头戴一顶小毡帽，手拎一个里面放着老花镜等物的布口袋，脚穿布鞋，面貌清癯，从平房的这头走到那头，频频地与人谈着话或打着招呼，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人，这就是同志们亲热地称呼为熊老板的熊瑾玎同志。别看他总是那样安详和从容不迫，在他的肩上担负着办报所有物资的供应和全报馆几百口人的衣食住行的全副后勤重担。在那战争年代，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经费特别是物资供应本来就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加上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经费，对《新华日报》视为洪水猛兽，时时处处横加迫害摧残之下，肩负《新华日报》



这副后勤担子确实是不轻呀！

《新华日报》在党中央的关怀之下，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之下，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冲破重重障碍，将真理的呼声，传遍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启迪了一代人。这是一段光荣的历史，永远值得纪念。回顾当年种种情景，更增加了对熊瑾玕同志的怀念。就是他勤勤恳恳而又默默无闻的辛劳筹划，使得报社没有一天因缺少纸张或其它物资而停止出版（当然被勒令停刊的日子除外）；尽管生活是艰苦的，可没有停过一天炊，不曾使同志们饿过一顿饭。熊老就是这样从物质上保证了全报馆的同志，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报道人民群众的呼声，而一往直前地进行战斗。我们的熊老为此真不知操了多少心血。可以这样说：在当年的报馆里，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就独是不能没有熊瑾玕同志。缺少别的同志最多工作上受些影响，而没有熊老，则《新华日报》不要等到创刊9年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封闭，可能早早就被反动派统治当局从经济上扼杀了。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办事业，在经济上要立定脚跟，确实需要有经营事业的突出才能，有联络经济实业界有正义感朋友的非凡本领。熊老经营《新华日报》就是靠这套本领。熊老的经营才能早在1928年，他们夫妇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会计，为建立党中央政治局秘密开会的机关，而以商人面目出现时起，就显露出来了。

熊老是一个读书人，1928年到上海工作之前，原是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当党需要他以经商来掩护党中央政治局的革命活动的时候，他真正成为一个人经商的能手。熊老夫妇在人地生疏的上海，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陆续办起好



几个商号、钱庄、大的布店、酒店、绸厂、印刷厂等。在他的掩护下，党中央政治局的秘密会议机关，在长达3年多的期间里没有被敌人发觉。当时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李维汉、任弼时、项英、彭湃、刘少奇等同志经常在那里秘密聚会议事。这个机关建立在现在的上海市福州路天蟾舞台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一直到顾顺章叛变，才不得不转移。熊老利用他的经商身份还为党建立了好几个联络站。

熊老以经商掩护革命的才能同他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本领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经商需要有才能，那末，善于结交党外朋友合作共事，就不仅需要才能出众，更需要有高尚的人品，在待人接物等多方面以美德感人，因而才能在艰难之际，赢得了友情。熊老在上海时，无论是独资经营或合伙经营，他都与党外的同事人或合伙者建立了深挚的友谊，有一些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朋友。1933年春，熊老担任党内交通，去当时法租界为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时，被坐探守捕，因叛徒出卖，被判了八年徒刑。他在狱中英勇不屈，当一次去法庭上得知他的夫人朱端绶同志也被捕时，他写过一首慷慨赴难的诗赠给他的夫人。其中有：“艰难应共任，患难喜同过。躯壳原无用，精神自不磨，愿持坚定性，战胜恶妖魔。”表现一个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革命家的气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的一位姓唐的房东，敢于毅然出庭为熊老作证。熊老的诗集里载有称颂这位友人的诗句：“……救护频输策，陈辞竟挺身。古言真不爽，患难见交亲。”

在抗战的艰难时代，熊老结交的一些经济实业界的朋友，成为秘密支持《新华日报》渡过一个又一个经济困难的重要支



柱。1939年春，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新华日报》在市区被炸得已无容身之地，需要在郊区找到出租的房子或出租的地皮来盖房子。在那个年头，把房子或地皮出租给共产党，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呀！依靠党的威信，也有赖于熊老的人格，终于得到了租地，赢得了友情，这个难题解决了。从此《新华日报》得以在化龙桥山沟里安下身来。象这样在困难时刻经过熊老的努力，由他的一些朋友来帮助《新华日报》渡过困难的事例是很多的。《新华日报》不可以一天断绝纸张的供应，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处处阻止《新华日报》采购纸张。熊老结识和说服了产纸地梁山县的一个本地人士，秘密派人去合伙创办了造纸厂。由于熊老的善于交友和经营，《新华日报》不仅自己不愁用纸，还能以纸张供应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出版社。最可笑的是，堂堂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有一次断纸了，一位姓张的经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来向熊老商借纸张。熊老不仅满口答应，甚至到期未能偿还也不追索，而是利用这样一种交道，使《中央日报》不得不为《新华日报》代铸一副标题字，这是一笔好交易。后来，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知道这一来往情况，认为有损国民党的声誉，把那位经理撤职了。

熊老的朋友中，在缓急时可以得到帮助的有当时开办酒精厂的老板，有银行分行经理，有国民党的炼油厂的厂长，有飞机修理厂的厂长等。他们不仅在经费的周转上帮助了熊老，而且供应了印报所需的油墨和汽油等。熊老对待他的这些朋友也处处待人以诚，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毫无保留地热心帮助他们。譬如上面所说的那位酒精厂的老板，就是听了熊老对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酒精业的重要意义和各种可能条件作了



分析之后，树立了兴办酒精厂的信心。在开办之后，熊老又派去得力干练的人帮助他办厂，而且接连办了几家厂，都生意兴隆。另外象那位国民党炼油厂的厂长，在经营管理方面熊老也给以有力支持，同样也派得力人员去作具体帮助，使得他那家炼油厂不仅业务蒸蒸日上，利润很大，而且被国民党评为甲等厂。诸如此类，可以看出熊老所交的朋友，都是既尊敬他的为人，也非常感激他的帮助。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这也可以用来说明熊老的交友之道吧。

当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很多同志，对熊老广交朋友秘密支持报社的种种情况，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这些是绝大的保密关系，只有南方局的少数领导知道。所以当年我们许多工作同志只管工作，从来不过问经济和物资的来源。直到全国胜利以后，才逐渐了解到一些情况，因而对熊老为《新华日报》所付出的辛劳和他高尚的人格，更增强了景仰。熊老可以说是执行党的“广交朋友”号召的模范。他对朋友一贯以诚相待，又忠实、又真挚。全国胜利以后，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当年好几个帮了党的忙的朋友，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打击时，熊老总是非常关心，千方百计去为他们奔走，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熊老平日工作一丝不苟。提早报纸的出版时间，这是《新华日报》争取多发行的一件大事。为了做好这件事，熊老亲自调查报馆有关各部门，从交通员取电讯稿到编辑部编稿，印刷部排字印刷，到营业部发行，一个一个环节，共同订下完成本工序的具体时间，制定条例严格遵守。《新华日报》尽管印刷设备差，报社地处郊外，离市区远，但是每天早晨六时，



重庆市区就有《新华日报》的叫卖声了。《新华日报》能够做到周恩来同志提出的：“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熊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熊老的领导下，报馆内部节约成风，不该用的钱，一个也不花，然而当工作人员患病需要住医院治疗时，那是不惜巨款一定要送医院治疗。熊老也非常关心大家的生活，提倡养猪种菜，尽可能改善一些生活条件。他自己一生朴素，烟酒不沾，除掉爱好写旧体诗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嗜好。他同大家吃同样的饭，拿同样微薄的津贴，从来没有特殊，也没有架子。他还擅长中医，经常在报馆为同志们诊脉看病。全报社上上下下都非常欢喜他，作为一个长辈尊敬他。熊老真是一个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模范共产党员。

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因为尊敬一位同志而称呼他为“老板”的大概是不多见的。对熊瑾玎同志同他的夫人朱端绶同志，无论在报社或八路军办事处，没有一人不喊他们一声熊老板和老板娘的。这不是哪一位同志的创造，而是他们夫妇俩当年在上海扮作商人掩护党中央机关的时候，党内就开始叫开这个称呼了。1966年春，当“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开始翻滚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在一份证明材料上写下：“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周恩来同志这个评语，实在可以看作党对这位红色理财家夫妇的最高奖誉，从这里也就透露了老板、老板娘这称呼的全部含义了。

全国解放以后，熊老已是高龄，仍然在救济工作和红十字会工作上孜孜不倦，是一位卓越的社会福利工作者。熊老出生于农民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满了同情。他早年受徐特立同志的熏陶，在湖南从事教育（从小



学教员、女师校长到大学的文字学教授)事业,曾是徐老在湖南教育界活动的助手,两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50年代末,熊老曾写有《徐特立老爷爷的故事》、《革命老人徐特立》两书,又应邀到处向青少年宣讲徐老的一生,有“徐老专家”之称。他还很早就认识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曾同是“船山学社”社员,又同是“新民学会”会员。在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的建党活动中,他曾给予多方面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创办“自修大学”,曾邀他担任教务长。他从1918年起就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当年在长沙召开的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会就是由他主持而由毛泽东同志作讲演的。1924年以后,他由毛泽东同志推荐,在党的领导下做国民党的改造工作。在湖南期间,他同毛泽东同志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共产党员受到大规模的屠杀,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受到国民党的通缉,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党的队伍。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曾三次请他到家里作客。从1928年到上海做掩护党中央机关的工作时起,他又同周恩来同志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周恩来同志曾在他80岁生日携酒到他家里祝贺。1973年熊老病危,周恩来同志赶到医院探望他,连问朱端绶同志“熊老有什么话没有?”朱端绶同志拿出熊老最后所写的送给周恩来同志的两句诗:

“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这是他最后的心声,表达了他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对党的领导同志的热爱和崇敬的心情。

熊老晚年也非常怀念《新华日报》时期的战斗。他在《新华日报》创刊20周年纪念时,曾写下如下诗句:



“新华日报廿周年，回忆当时味尚鲜……

何妨特务横行甚，不怕新闻取缔严……”

熊老年轻的时候就喜爱作诗，他旧学有根底，他的诗清新可读。他的诗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以《熊瑾玎诗草》为名出版了。这是老人留给后代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从他的诗集里可以读到他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几老的唱和，也记录了他战斗一生的侧影，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熊老与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尤其深挚，这都反映在他的诗集里。

熊老同我们是永别了。可是他那永不停步的革命战士形象，他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一生始终怀着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的风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被敬仰。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1月16日，发表时与张友渔、胡绳、熊复、廖沫沙联合署名）



学习恽逸群同志

年龄真是不饶人的，我日益感到记忆力衰退之苦。然而，有那么少数几位已故的新闻战线的老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是那样清晰、生动、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际。不仅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每每思念往事，对他们的人格和成就的景仰之感，则一天天加深。恽逸群同志就是这样被我思慕着的人中的一个。

恽逸群同志逝世转眼就要到6周年了。他是一个很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从事新闻工作20余年。他的一生历尽坎坷，然而自始至终，忠心耿耿，奋战不休，越到晚年，越受折磨，越显出他人格高尚。他的学识、眼光和胆量，都像耀眼的彗星那样熠熠闪光，而令人感到不可企及。我的头脑里时常浮现出将近半个世纪前我们初次相识时的种种情景。

1935—1936年之际，恽逸群同志在上海《立报》工作，担任编辑和主笔；我在上海《申报》工作，我们在这时相识了。那个时候，民族危机严重，救亡运动高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新闻界联谊会经常有许多活动，我们经常见面。恽逸群同志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诚恳热情，性格开朗，贬斥时弊见解犀利而又妙语如珠。总之，是一个可亲的长者。

由于大家都是在报馆工作，常常在深夜归家途中，在黄包车的车阵中碰到。记得就是在当时的爱多亚路（今天称延



安东路)上,大家不顾紧张工作后的疲劳,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仍然嘻嘻哈哈,放言高论。有次我们不期而遇。碰到一些舞场里散舞归家的舞女的黄包车阵,恽逸群同志向她们开玩笑说:我们都过夜生活,看来报纸编辑跟跳舞姑娘结婚最为理想,可以同出同归。说得她们格格大笑不止。我从这些方面发现恽逸群同志是非常善于同社会上各种人物交往的人,这大概是由于他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的缘故吧。能与多种人打交道,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素质。

我对恽逸群同志的尊敬,主要还是来源于《立报》的声誉。《立报》是一份四开的小报,要在当时的上海滩打开一条生路,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影响,在社会上能站住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立报》却做到了。它一出版,就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内容充实,文字简洁生动,编排也很精彩,非常引人注目。当然,《立报》办得好,也靠其他几位进步朋友的努力,不过恽逸群同志的劳绩,是特别值得指出的。1936年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一时震动中外。在这异常复杂的形势下,恽逸群同志接连写出好几篇评论,大胆地断言: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决不会成为西班牙第二(当时西班牙正在进行内战)。历史发展已证明了他这一判断的正确。恽逸群同志的胆识过人,怎能不使我赞佩之至呢?

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到,将《申报》与《立报》来比,《申报》牌子老、发行量大、篇幅多、实力雄厚等等,《立报》是没法与之相比的。《申报》中也有一些进步的朋友在作着种种努力,可是同《立报》的坚强精干比,《申报》显得多么苍老、臃肿、虚弱啊!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以



《申报》为代表的“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我认为这说明《申报》在进步，而《立报》办得比较好又确实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抗战爆发后，我们天各一方，长时间不通音问。后来，知道恽逸群同志到了苏北解放区，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随后内战爆发，他撤退到山东，主持《大众日报》笔政。这段时间大家都在从事新闻工作，可一直没有见面。他在苏北解放区写的《蒋党真相》，以及后来在《新民主报》编写的国民党战犯简历，我都是看到了的。我当时就很为他的博闻强记和才华横溢所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白色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新闻工作也有1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我绝对写不出《蒋党真相》那样的书。我在新华总社工作，经过我的手发出了第一次载有国民党战犯名单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也写不出恽逸群同志连夜赶写的那70多名战犯的全部简历。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缺少他那种功力。既比不上他的博闻强记，也缺少他那种长期积累资料的习惯。尽管有人指出，《蒋党真相》一书中所写战犯简历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都是恽逸群同志在战争环境中，在极度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呀。

学知渊博，勤于搜集资料，是一个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条件。恽逸群同志14岁以前就通读了四书五经、《史记》、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他喜爱历史但不泥古，而且非常重视当代军、政、经、文各方面人物和重大事件以及历史掌故的资料搜集。恽逸群同志主张在“通今”以“博古”的基础上，再做到“博古”以“通今”，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



我想：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特别要留心当前的国家大事，勤于调查研究，积累资料。在这许多方面，恽逸群同志确实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好榜样。如果像恽逸群同志那样惊人的记忆力也可以学习到的话，那更是如虎添翼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与恽逸群同志又在上海见面了。他主持上海《解放日报》，我在南京办《新华日报》，有时为了讨论宣传工作，我们在上海相叙，多年阔别，他却风采依然。万万料不到，不多久，在“三反”运动中，他受到了惨重的打击。身踞高位的坏人，抓住他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而且既不核实证据，又不允许本人答辩，就一棍子打下去，并开除了他的党籍。在他的案件中，记得其中包括一个解放前他认识的资本家的案情在内。恽逸群同志曾以解放日报社的钱借给那位办实业的资本家去经营矿业，后来失败了，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其实，这件事在恽逸群同志方面，丝毫没有不光明处。我记得那位实业家曾到过南京，也到《新华日报》找过我，他拿来了恽逸群同志的介绍信。恽逸群同志在信中说，他这位老朋友要在南京近邻一个地方办煤矿，希望我给予帮助。如果可能的话，也请我在《新华日报》设法在经济上支持他一下。

长期在白区工作过的人，自然知道，没有各行各业的朋友的交往和掩护，是一天也生存不下去的。困难时的朋友，总不能在胜利后一脚踢开吧，而且逸群同志信中流露他很热心发展工业。对具体情况不作具体分析，这是多么坏的作风。恽逸群同志从此就遭到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由于潘汉年案发， he 被抓进牢中，被判为“反革命”；10年后获释，又碰



上“文化大革命”，他被流放到江苏阜宁一个中学充当图书馆管理员，一直被作为专政对象。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获自由，不久就去世了。

恽逸群同志生前最后这20多年，是他最坎坷的一段生命史，而他的人格形象之高大，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以及他锐利的洞察力，无畏的战斗精神，都升华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实在值得后死者学习，也实在值得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学习，而首先是向他学习如何做人。

恽逸群同志身处逆境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平生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20年检验，幸未蹈虚愿。”我想，类似“不以物移，不为己忧”这8个字的名言，出诸我国古代好些书籍文章中，可是一经考核，真正做到的实在并不多见。恽逸群同志在另一封书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又说：“尽管被开除党籍，被打成反革命，我始终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工作，只是限于地位，使不上力的时候，无可奈何！”其实，后面这封信中所说的，恰恰是恽逸群同志高尚品质的最确切的自我介绍，也是他所以能善处逆境，做到他自律的8个大字的最好的说明。一句话，生命的意义，在恽逸群同志的心目中，只有为人民而活，为真理而奋战，其他一概不计较了。

具有这样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够目光如炬，像照妖镜一样，照出林彪、“四人帮”丑恶的原形，并且敢于撰写《平凡的真理》这样切中时弊的文章，尖锐揭露当时“造神”运动的本质。也只有具有这种为人民的忠诚和胆识，才能写出声讨“四人帮”及其北门学士的《论新八股》这类精彩的檄文。想想



“文化革命”时期，如果说到吃点苦头，我也并未少吃，然而在恽逸群同志高大形象前面，我只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乡愿，德之贼也”，实在感到有些惶恐呀！

从怀念恽逸群同志中，我想起了一些很启发人的名言、格言。西方人喜欢说：“不可以别人的过错来自己惩罚自己。”又说：“别人可以折磨你，自己决不折磨自己。”唐朝的韩愈也说：“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据说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喜欢这样的格言：“世界的一切，在我都不生疏。”恽逸群同志是真正体现这些美德的人。

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精神，使恽逸群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他的文集也已编出，他的事迹亦已为更多的人知悉了。恽逸群同志可以瞑目了。我回过头来看看现实，在这向四化进军的伟大时代，在这改革的号声响彻祖国大地的時候，新闻战线应该出现猛士，应该如历史上每个变革时代出现过的杰出新闻战士一样，并且要比他们更坚定、更深刻地去作真理的宣传者，作人民的喉舌，站在时代的前列，冲锋陷阵，从而作出自己的贡献。想到新闻战士这一崇高的责任，我更愿意向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提出：学习恽逸群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治学、工作、战斗和为人的光辉范例吧，切莫辜负人民的期待。

（原载《新闻业务》1984年第7期）



忆刘述周同志

刘述周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

这样一位先后共事近20年的友人的去世，自然使我思念不已。抚今追昔，也令人感慨万端。

述周同志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十分值得钦敬的革命战士和人民的勤务员。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担任过重庆《新华日报》的采访部负责人。那时他曾奔赴云南乃至滇缅边境，深入农村山寨，调查当地的民情风俗，以他生动的笔触为《新华日报》写了很多篇反映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通讯，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情景，我就是在读了他的这些通讯后牢牢地印在脑际的。我那时担任《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有条件最早读到他的稿子，并且把它发给排字房。述周同志后来是奉调离开重庆到前方去，到新四军去工作了。我当时感到很惋惜。因为，我至今还认为，述周同志当年如不奉调去参军，如果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是很可能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新闻记者的。因为他文字流畅，观察敏锐，见解深邃而又勤于自己的业务，这些都是作新闻记者的极好条件。

述周同志参加新四军，后来在华东野战军工作，同样受到同事们的爱戴与上级的器重。新中国成立后，我所接触过的华东野战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尤其是述周同志担任过副政



委的华东炮兵部队的将领同志们，他们谈起述周同志都流露出十分深挚的感情。可以说，述周同志是以他高尚的品格，赢得了战友们对他的爱戴。有一件事是可以说明一切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述周同志奉陈毅同志之命，到投诚部队郝鹏举部任政治部主任。自然，同郝鹏举这个奸险成性、反复无常的人共事，是一件很艰难的使命。自卫战争一爆发，郝鹏举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解放区，声势汹汹，便勾结南京当局策划叛变。述周同志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连夜槌墙而出。他在密集的机枪射击声中，在追兵的袭击之下，乘雪后的微明，边抵抗边撤退，虽然身负重伤，终于脱险归来。当年听他说这段经历时，宛如看银幕上一个个惊险镜头，至今还非常清晰。如今回味起来，更增加了新的感受。这就是：述周同志可贵的对党的忠诚，使他慨然受命于艰难之际，不说二话，冒着极大危险毅然向虎山行去；同时，当郝鹏举突然叛变，在重重包围监视中，他当机立断，选择时机出走，表现出他临事明察、机智、勇敢的优秀革命军人的本色。

解放以后直到十年浩劫前夕，我们先后共事在南京、上海，特别是他长期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科委工作，我主持宣传文教部门工作，在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工作相交叉，接触商量的机会很多。述周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如何，用不到我现在来多说什么。有很多的学者、专家和民主人士，至今在怀念着他，就是最好的回答。我现在想说的是在我印象中他的为人。在当年，无论是政治形势发生大风大浪的时候，或出现平静的时候，在无数次的会议桌前或个别交谈中，我深深地感到述周同志是一个深知自己责任的人，



是一个谦虚、稳重、踏实、诚恳的人。每逢论人论事，不论是对党内的干部或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都表现出他这种高度负责的品质和风格。他那一份操守和清澈见底的心灵，比起某些闻风起舞、见风使舵，轻率浮躁、见利忘义、官腔十足而又自鸣得意的人来，实在高尚得令人起敬。

我特别想起一件事，即是给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摘除右派分子帽子的事。把傅雷先生划为右派分子当然是划错了。当第一次有机会为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按照当时全国的规定，本人应在原单位的一定会议上作一次公开的检讨，表示悔改的决心才行。可是傅雷先生最怕开会讲话，也不愿意在会上公开检讨，他向友人表示，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把右派帽子继续戴着再说。我面对这样一件十分棘手的事。非常感谢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和述周同志，在他们完全理解应该为傅雷先生解脱这个严重的政治包袱的情况下，共同负责，终于设法排除了这个困难。述周同志为人的可贵之处，就是当他认为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而应该解决的时候，勇于承担责任。他正直无私，因此也比较容易看清事物的真相。当然，人无完人，述周同志在“左”的潮流横行时，有时也同我一样，有些糊涂，要犯错误。在大跃进时也曾被某些表象所迷惑。然而他品性纯正，确实不是那种“左”得可爱的人，不是那种喜欢搞什么扩大化的人。

述周同志曾备受“四人帮”的摧残折磨，一个平时生龙活虎的人，当他恢复自由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全身是病的病人了。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他仍然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全国科协的领导岗位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坚强奋斗不懈。他曾到过不少地方，了解很多遭



“四人帮”迫害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情况。他深深为与上海10多位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发自内心的谈话所感动。在科协干部会议上，他大声疾呼要全面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强调科协与学会要依靠科技知识分子，让他们当家作主。他竭力提倡科协的体制改革应走社会化道路。以科协工作的社会化来为祖国的四化服务。述周同志最后就倒在这个目标上。他给从事科协和科普事业的许多年轻干部，留下了宝贵的嘱托和楷模离开了人世。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凡是品德高尚的人，无私的人，勤勤恳恳为人民默默工作的人，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因为世界毕竟不是少数骗子和盗窃犯的世界。刘述周同志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高贵的品德是永存的！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86年3月23日）



悼念人民的新闻战士浦熙修

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同志，都熟知浦熙修这个名字。当时的许多进步的甚至是中间派的新闻记者，只要与她有过工作联系或往来，都会感到她是一个品质正直、富于正义感，忠诚于自己的职业，待人诚恳、性格爽朗、极可亲近的人。

浦熙修并没有受过新闻学的系统教育，但当她以偶然的机会上新闻记者的工作岗位时，很快就显露出她具备作为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才华。她有极强的新闻敏感，善于捕捉重要的新闻线索，有广泛的新闻联系，文笔犀利流畅，工作十分勤勉。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上层人物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使得国统区内民怨沸腾。在那浓雾迷濛的重庆，浦熙修的一支笔曾写出了不少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腐败透顶的新闻和特写。有一次她千方百计冒雨跑到重庆机场，采访了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从香港空运一条狗来重庆的真相。新闻一发表，社会舆论为之大哗。写这种“闯祸新闻”，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浦熙修毫无顾忌。她的新闻和特写，常常使国民党的一些达官贵人丑态百出，哭笑不得。

浦熙修是一个真诚的民主战士。她热情地采访和报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暴行。记得1946年初，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



后，国民党的喉舌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完全颠倒是非的造谣新闻。浦熙修当场目睹了国民党特务暴徒殴打郭老等著名爱国人士，破坏人民庆祝政协会议的真情实况，她对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感到义愤，对中央通讯社的血口喷人更感到愤怒。她四处奔走，团结了重庆各报一大批新闻记者，联名写了揭露事件真相、严厉责问国民党中央社的歪曲报道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刊登在重庆很多报纸上，使中央社狼狈不堪。事件发生后，浦熙修工作的那个报社的负责人忧心忡忡，因为中央通讯社的社长是国民党宣传方面的显要人物萧同兹，恰恰这个萧同兹又是该报的董事长，得罪了董事长可不得了。于是，在一次虽然没有说明、但实际是赔礼的酒席上，主人一再敦促浦熙修向董事长敬酒，可是有骨气的浦熙修无论如何也不举杯，不妥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浦熙修在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的险恶环境中，始终勇敢地斗争着。1946年著名的下关事件中，她积极进行采访报道，与上海来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马叙伦先生等一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打，被困在一间候车室中直至深夜。她为人民民主事业流了血。周恩来、郭沫若同志等都到医院去探望过她。郭老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慰问信（见郭老的《洪波曲》）。1947年初夏，她不顾种种压力与危险，坚持在报纸上报道国民党反动军警血腥镇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青年学生的“五·二〇”大血案，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因此，国民党的特务对报纸迫害越来越紧。到1948年，浦熙修工作的《新民报》终于被封。她已不能以记者身份公开采访，但她并没有停止斗争，凭着手中的一支笔继续为上海、香港的进步刊物写了许多歌颂人民斗争，揭露蒋



家王朝没落的文章。国民党当局对她的行动恨之入骨，终于，伪宪兵司令部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将她逮捕。在监狱中，她心胸坦然，置生死于度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关押7个月之后，蒋介石下台了，她被营救出狱，重新拿起笔战斗。不久她就在上海迎接了解放。浦熙修可以说是那个疾风暴雨时代进步女记者中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浦熙修始终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同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同我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与工作联系。她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监视，经常去重庆曾家岩和南京的梅园新村。她熟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我党的所有领导人，真诚地信任党，愿意向党倾诉一切，她也常常得到党的领导人的教诲和鼓励，得到党的信赖和支持。党没有把她当成外人，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亲昵地称她浦二姨，她同《新华日报》在新闻报道工作上密切配合，共同商量斗争方式。抗战胜利后，当南京和谈破裂，周恩来同志即将撤离时，浦熙修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处，依依不舍地谈到深夜不忍离去。周恩来同志热情鼓励她努力工作，同时也针对她的弱点，劝她以后要多读一些书。她在日记里记下了这宝贵的临别赠言。当她得知董老等同志最后全部撤退时，难过极了，感到自己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浦熙修对党充满了纯朴的感情，是一个无论在党处于顺利或困难时期都紧紧跟党走新闻战士。

解放后我与浦熙修很少见面，但知道她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还到新疆去作报告，并将她的感受写出两本小册子。我还记得1956年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见到她的那次谈



话。她仍然是那样天真、直爽地倾吐她对党领导下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赞美，热情地称颂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贤明。她信心十足地说：今后就是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去干……。人生的道路往往是崎岖不平的。1957年她在政治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她下放劳动，大概也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但她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在党组织与友人的帮助下，她慢慢摆脱了沉重的精神痛苦，重新开始追求政治上更高的目标——争取改造自己，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起她恢复了中断数年的日记，一直持续到1968年她生命垂危的时刻。感谢她的女儿袁冬林同志，使我有机会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这些日记，我一边读一边感慨万分。我尊敬这一位过去的新闻战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她一贯要求进步、一贯信赖党，然而她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产生过不幸，心灵上遭到严重的创伤。从她的日记里可以看到，她是那样倾心于党，无情地解剖自己，深悔没有好好听从周恩来同志要她多读一些书的劝导。她在日记里写着：“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奔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因此她不断勉励自己努力作好“文史资料”工作。她读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书，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党，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十年浩劫的前夕，她病倒了。而恰恰在这时候，政治上的迫害和严重的病痛一起折磨着她。尽管明知自己得了无法治疗的癌症，生命即将结束，在剧痛难忍的病榻上，她仍然以最后的一口气，一段一段地抄写了大量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诗词，以求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她多么希望能够从自己的挫折中得到一个新的生活。可悲的是，在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政治



骗子歪曲真理，制造现代迷信的时候，她不可能找到马列主义真理来解剖自己。她在难熬的病痛和挨斗之余，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最终喊出：“让历史说话吧！”她的逝世是很悲惨的，她所疼爱的子女和亲友都不可能来和她做最后的一别。一个有才华的著名女新闻记者终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演了一场悲剧，过早地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今天，“四人帮”被打倒了，浦熙修长期希望解除的加在她身上的政治包袱也终于解除了。如果她能够活着看到今天的一切，会是多么幸福啊！

作为一个人民的新闻战士，浦熙修热爱党，热爱人民，同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作为一个有才华的记者，她那种爱憎分明，为人民正义事业敢做敢为的强烈责任心，是值得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学习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8月25日）



悼念田伯萍同志

《新华日报》的老战友田伯萍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他还只有60几岁，一生却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正当他所有的委屈得到纠正，在重庆继续为党为社会主义文化出版事业奋勉辛劳，想把失掉的大好时光尽可能补救回来的时候，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令人扼腕痛惜！

当重庆的老战友传来这一噩耗，并且要我写点纪念文章时，我正被感冒发烧所折磨，心中的沉痛无力用文字来表达。我勉强拿起笔来写了一副挽联：

为抗暴，奋椽笔，坚操守斗横逆，任尔风雷弥天，巍巍“新华”留战绩

历沉冤，怀贞洁，扶病创注精力，何惜肝脑涂地，堂堂师表耀山城

文字粗拙，但可说是我对伯萍同志一生的景仰和评价吧。

我这里想借《新闻研究资料》的篇幅，再讲几句悼念的话。我和伯萍同志相识是在1946年。当他被党组织派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时，我已在准备交代工作，将到南京去筹备《新华日报》的出版。我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他却给我留下纯洁、坚贞、忘我工作的极好印象。在我们一大部分人离去后，重庆《新华日报》正处在和谈濒于破裂，内战烽火弥天之



际，面临着新的艰难的搏斗。这时记者手中的笔就是战斗的枪刀，这时的报道就是一篇篇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这时的《新华日报》就是鼓动和组织广大军民以实际行动反对和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号召书。在《新华日报》最后一段历程中，作为采访部的一个主要成员，伯萍同志不愧为光荣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在山城重庆，在首都北京，在许多地方，至今还常常听到一些身历重庆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暴行斗争的同志，以敬佩的心情谈到伯萍同志在采访报道这场斗争时的出色表现，谈到他作为一位党报记者对进步青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引导，谈到他与新闻界朋友的肝胆相照、并肩战斗。《新华日报》最后阶段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是中国报刊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田伯萍同志对《新华日报》怀有深厚的感情，因而他对编写新华日报史怀有崇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1980年底，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聘请为新华日报史的特邀研究员，从此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他为报史写作耗费心血，出力不少，曾往访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搜集了大量材料。《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成立后，他又是全国第一个分会——重庆分会的筹备人和主要负责人。他曾经一再向同志们说：“新华日报史不写出来死不瞑目！”我想到这里，心头万分沉重，感到我们这些后死者身上的重担。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在国统区创办的唯一的大型政治机关报，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实现和平、民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反动派，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发挥了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作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一代青年。在周恩来同志为



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的具体领导下，《新华日报》在长期实践中，确实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办报思想，其中许多方面，即在今天乃至今后都不失其借鉴价值。把这些内容通过报史的形式很好地总结出来，留交后人，实在是很有意义的。田伯萍同志的遗愿，深刻表明了他的目光远大，岂止是怀旧的感情而已。

接重庆友人来信，伯萍同志遗嘱不举行追悼仪式。但在送葬之时，不期而聚者达千五百人，足见人们的爱戴和哀思。

伯萍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新闻研究资料》总25辑，1984年版）



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①

我国新闻界的一批老战士、新闻研究工作者和各界来宾，今天欢聚在这里——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共同探讨战时我国新闻界艰苦卓绝团结奋斗的光辉历史经验，意义十分重大。在座的不少同志就曾战斗在重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如今都已白发盈颠。尽管历史在一页页翻过去，而新闻战士当年团结抗战的光荣历史和深厚情谊，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我们今天依然是豪情满怀，继续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迈步向前。

同志们，当我们的新闻学术讨论会开幕的时候，不能不首先想起那些在抗战八年中，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新闻界的烈士们。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场，在孤岛的上海和海外，……许多新闻工作者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新闻战士约有500人之多。他们之中有优秀的新闻战士、华北解放区太行《新华日报》总编辑何云同志，有从武汉向重庆撤退途中牺牲于敌机轰炸下的《新华日报》潘

^① 本文为作者1985年10月在重庆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美年等16位烈士，有著名的作家、诗人、新闻记者郁达夫，有坚持斗争在孤岛的爱国报人朱偕公等。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中国新闻界的骄傲。他们的业绩将永远激励中国新闻界的后继者奋发向前。

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是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祖国的纵深地区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破天荒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士兵、工人、农民发生血肉联系的时代。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也是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和新闻研究空前发展的年代。抗日战争的烈火锤炼出一大批新闻工作骨干。新中国建国以后新闻事业中的一大批干部，几乎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就是在海外各地的华人报刊和台湾的新闻界中，同样有许多抗战时期的新闻同行在发挥作用。回顾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新闻事业，上述几方面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

神圣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使得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新闻工作者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当台儿庄大捷，各报馆和通讯社的记者团，由战地采访归来、回到武汉的时候，我们新华日报的董事会举行过盛大而热烈的欢迎。抗战时期中共报刊的记者，国民党报刊和民间报刊的记者一道到前线采访，互相支援更是常事。在战时的重庆，新闻界的团结合作也是令人怀念的，新闻界同人的聚餐会，有一个时候是经常举行的。新闻界还不时举办体育比赛、排字比赛等活动。至于物资上的互通有无，更无须多加举例。单就《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之间，就有过《新华日报》支援《中央日报》以纸张，《中央日报》支持《新华日报》以铸字铜模



这样的交往。特别是为了推进抗战胜利而广泛开展民主运动时，进步新闻战士之间的肝胆相照、团结战斗，在抗战以前的中国新闻界很难有这样的规模和深度。这种在民族解放民主建国的共同目标下的大团结，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破天荒的事。今天，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诚挚寄语台湾和在海外的新闻同业，我们希望台湾的同行，尤其是当年在抗战时期共同团结战斗过的新闻界朋友，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大目标下，和我们一起再一次贡献力量。

抗战军兴，大片国土沦陷，中国的新闻事业从数量上说可能有所减少。然而，在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却正是中国新闻事业真正大发展的时期，许多沿海地区大城市的报纸相继迁移到了西南文化比较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大量报刊，办起了新华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解放区的报刊总数约计达到四百种之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第一次公开发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诞生了，好几个著名的进步报刊、通讯社创办了。同时报纸送到了前线而受到战士的欢迎。士兵们说：送一张报纸到前线来，比送一尊大炮更有力量。我国的报刊办到敌人的后方抗日根据地的农村中，办到离前线不远的地方，办到后方中小县城中等等。中国新闻工作者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我国原有的几所大学办的新闻系，继续在后方创办，敌后抗日根据地报刊培养新闻骨干的各种短期训练班更是不计其数。我们期待着新闻史学家们以详实的史实，勾画出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大发展的生动图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延安《解放日报》整风改版为契机，发表了一批光彩夺目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文章。接着，重庆《新华日报》也陆续发表了若干篇新闻理论文章。可以说，延安《解放日报》提出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提出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为中心的办报思想，和重庆《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报纸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等办报思想，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丰富了我国新闻学的宝库。在今天，这些宝贵财富又是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要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新闻研究，特别是战时新闻学的研究和各种新闻专著的出版都是值得重视的。

总之，大量的事实说明，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丰富多彩，成果巨大，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的一个尚待进一步开发的重要领域。它的经验，对于今天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对于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和进行着改革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无疑是有重要借鉴作用的。而当年新闻界的大团结精神，艰苦奋斗和为祖国解放事业，为崇高理想而不惜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将永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所学习和敬仰。



漫忆“国新社”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作为进步的新闻事业在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海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就报纸而论，我认为《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在通讯社中可说“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是绝无仅有的，是取得光辉成就的代表。它在重重政治压迫和经济困窘的日子里，艰苦奋斗，团结了一大批有名望的文化界人士和进步青年。它发出的新闻和专稿，大量刊登在国内和海外，特别是南洋的华文报纸上，起了团结抗战的喉舌作用。“国新社”的业绩是永存的，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应用浓墨重笔书写它所放出的异彩。

“国新社”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关系密切，而范长江同志是两者的灵魂。作为这两个进步组织，我自始至终参与了。“皖南事变”爆发，重庆的“青记”和“国新社”的许多战友都纷纷撤退了，是我从嘉陵江北岸一个小村子里，去接受了“青记”机关的全部档案材料和一部电话机，最后送走了当时唯一留在重庆“青记”工作的莫艾。随着时局恶化，我所保存的“青记”材料也全部丧失了。“国新社”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也是这时被迫停刊的，以后的战斗中心由桂林转移到了香港。

我参加了这两个组织，对“青记”与“国新社”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但讲起具体工作来，却是做得很少的，没有出太



多的力。这主要是由于我所从事的《新华日报》编辑主任的工作，使我天天得做夜班，白天要睡觉。特别是日本飞机不分昼夜疯狂轰炸的那些岁月，编报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加上每天晚上还得同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斗法”，有时气得令人火冒三丈，但仍须冷静战斗。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实在抽不出很多时间来为“国新社”写稿。能够回忆的东西，随着天长日久也渐渐地忘怀了。

我的脑际难以磨灭的一个记忆就是1939年秋，我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奉命调回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结束了我整整一年在武汉外围战线和敌后的战地记者的生涯。在归途中，路过桂林，小住环湖北路“国新社”砖房楼上的那一段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吃的是青菜淡饭，睡的是地板，大家相处，无论已识初识，都是亲亲热热的。那种如火的友情和以苦为乐、拼命工作的情景，至今仍令人神往。当年在桂林的短期逗留，与桂林教育、文化界以及朝鲜义勇队等的交往、座谈、作战地情况报告等等，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颇为忙碌了一阵。当然，我的这些活动，都是以“国新社”成员的名义进行的，也是长江、秋江等同志替我介绍安排的。今天讲起这些，倒也可以证明当年长江同志一遇机会就抓住社友为“国新社”做工作的优良作风。

岁月无情，当年几位亲如兄弟的战友长江、秋江、农菲等同志，还有我在上海救国会时期就一直很尊敬的胡俞之、金仲华乃至恽逸群等同志都先后逝世了。而其中多数人是在十年浩劫中不甘受辱或被陷害，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他们留下的凛然正气，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看到黎澍同志回忆“国新社”文章中末尾对范长江同志的



那几句话，触使我对亡友的无限深思。在新闻战线上，长江同志当年写的《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等，曾震撼了多少中国人的心！凡是与他相处过的人，不仅钦佩他的才华，同时也情不自禁地被他那待人真诚，热情豪放的性格和水晶一样透明的感人品德所吸引。抗战爆发前，他才华横溢，写出了那样气壮山河、震聋发聩的通讯，当时全国没有第二个人。

抗战爆发后，他的最大贡献，已经不是文章通讯，而是他那种为进步新闻事业开辟阵地，为培育青年新闻战士而作出的业绩。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领导组织才能，并且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国新社”的青年记者，今天活跃在各个岗位上，为新中国新闻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他们无不衷心感激长江同志当年的循循善诱。

解放战争时期，我和长江同乘飞机从南京撤退到延安，同在新华总社工作。胡宗南进攻边区时，他奉命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坚持在陕北，新华总社的大队人马撤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恢复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和长江同志只有在电讯上打交道。经过一年时间，党中央搬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新华总社也从武安迁移北上靠近党中央。我又同长江同志聚首了，而且在西柏坡同住一屋。我们在工作之余就聊聊别后的情况。特别当我叫他讲在陕北跟随毛、周等领导与敌军周旋的种种情况，是那样生动吸引人，我当时就想：长江依然还是抗战前写《塞上行》等文章的长江。他观察敏锐，见解深刻又豪气横溢，如果能够用他那枝传神之笔将这些写出来，将不是又一本脍炙人口的作品吗？可是在当时，大概是由于



新华社总社远离中央，在宣传上犯了几个错误，被中央来电批评过，虽然已作过检讨，我的内心那时有点灰，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因而不敢多嘴。长江同志似乎也从没想到要用笔将它写出来，不知是什么缘故。在发稿工作中，我感到他也显得有些拘谨。是老成持重？似乎又与他的性格不合。今天回想起来，大概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新闻工作，内心都有一些“改造”的紧迫感，而似乎又没有找到一个门径与所以然，因而有点惶惑感吧。

北平一解放，我们回到了这座古城。不久，又同时乘火车南下，我到南京，他去上海，干的还是新闻工作，当时他还是神采奕奕要大显一番身手的姿态。后来他又回到北京主持《人民日报》。我们天各一方，极少来往了。我只知道他离开新闻工作岗位时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去科委工作，我感到惊异。十年浩劫竟以身殉难。凡此种种，令人不胜感慨、悲痛。

（原载《国际新闻社回忆》，湖南
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祝《金华报》复刊

在遥远的北京，读到《金华报》试刊号，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我是金华地区的人，从小就在金华念书；我又是一个多年办过报的人，至今也未曾与新闻事业断过联系。因此一张新报的诞生，特别是家乡报纸的恢复出版，自然感到格外亲切。我祝贺《金华报》健康成长、壮大，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区报中，开出鲜艳的花朵来。

办报纸，首先需要锻炼出一支朝气蓬勃的，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旺盛的新闻队伍。没有这样一支过得硬的战斗队伍，就谈不到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这些年来，常常听到一些新闻工作者叹苦说：报纸难办，吃力不讨好，上下两头挨批评，等等。这种话确实有它的一定道理。问题就在这个“难办”中，是萎萎缩缩，精神不振，还是顽强战斗，知难而进，这是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有作为的新闻战士，一定会从重重困难中，去找出战胜困难的途径，并以此为乐，而且乐此不疲。这是一个精神状态问题。我希望《金华报》的同志，人人都成为一个富有旺盛进取精神的、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人民群众的幸福充满激情的新闻战士。

我祝愿《金华报》的同志，永远与群众心连心，成为群众最知心的朋友。一张报纸办得如何，以什么作检验的标准？我说只能以群众是否关心、热爱它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共



共产党人办的报纸，历来有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光荣的传统，保持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需要办报的人经常检点，经常思索的。由于地位的变化，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偏差，常常容易使我们脱离群众而不自觉。这方面的教训很多。盛气凌人，与读者不平等相待，甚至强加于人，是十分有害的，也是与群众的心格格不入的。希望《金华报》的同志一刻也不要忘记倾听群众的呼声，把报纸办成群众爱看的人民自己的报纸。

末了，祝愿《金华报》有一个好文风。地区报要办得通俗而又丰富多彩，使群众爱看。文风是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所进行的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我们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一切假、大、空的现象，应在我们的报纸上完全消灭。

我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就上面几句老生常谈，来勉励同志们努力前进吧！

（原载《金华报》1982年7月1日）



祝贺与希望

——为《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而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新闻研究资料》，已经创刊五周年了。我首先要向《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的同志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中国报刊史料的搜集，在中国新闻界人物介绍和新闻界重大历史事件，乃至新闻工作业务经验探讨等方面所取得的可贵的成绩。你们五年的辛劳，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这个刊物在我国也是创举。我祝贺你们的成功，也期望再加一把力，办得更精彩些。

我希望你们今后能更有计划地刊登一些值得今天借鉴参考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站在时代最前列、推动时代前进的报刊和新闻人物的历史经验。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时代，我们历史上有许多为推动国家改革而作出重大贡献的报刊和著名的报人，他们的光辉业绩和经验教训，很值得今天新闻界同人学习和效法。他们所写文章对当时人民思想影响的强烈，对推动社会历史前进所具有的理论威力，就值得在改革声中今天报刊的同人深思。在文风上，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要克服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的“钝刀子割肉”的毛病，我看也很需要向民主革命时代的那些著名新闻斗士学习。你们如果在这方面做出好成绩，是会有助于新闻工作的进步的，也是对当前任务的最好服务。



我还希望你们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的工作中，更加重视真实性原则。资料要力求立准、立确，因为这是研究的基础。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新闻界的许多老战士提出这个需要经常而且要十分重视的问题，在动笔之前之后都能想一想这个问题。有许多事情年代一久就会记忆失真，往往出于无心，而在某一史实上作了错误的记叙，这是要尽力避免的。

最后，我希望你们要贯彻好双百方针。本来，新闻研究资料，好像只要把资料立准确就行了，其实并不尽然。客观材料，特别是事实是要立准确的，绝不能无中生有，小大由之。然而任何人不论写什么，观点与材料总是统一的，就是一篇重点是介绍史实的材料，也不可能没有作者的观点在内。至于资料研究和新闻业务工作研究，更不可能不是观点与材料统一的东西。因此，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看法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应允许而且要鼓励这种不同的观点在刊物上争鸣，这是推进研究工作所必须的，也是办好研究资料刊物所同样应该注意的。这个意见不知对不对，提出供你们参考。

我想你们再努一把力，应该更多地争取新闻战线的从业人员、新闻系科的师生来作为你们刊物的读者和投稿者。这个群众观点是应该经常留心的。你们的刊物应该吸引更多的读者，有更大的销路，不应成为少数人孤芳自赏的东西。

（原载《新闻研究资料》第27辑，1984年9月）



祝《世界经济导报》诞生五周年

《世界经济导报》诞生五周年了。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和《导报》的忠实读者，发自内心地向《导报》的同仁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喜爱阅读你们的报纸。你们是四化建设热情的鼓吹者，也是遍燃全国的改革之火添柴添油的战士。

报纸是时代的号角，是人民的喉舌。你们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努力。你们的版面上总是那样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吸引人看。你们的报纸没有八股味，也少官样文章。报纸要有声音，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有主见，态度鲜明。在这方面，你们的报纸也逗人喜爱。在你们的版面上充溢着声音。

报纸毕竟不是《圣经》，也不能句句都是真理。世界上也没有人规定过：凡报纸讲的都得照办。办报人更不会有这种妄念。然而报纸应成为读者的良友，让读者从中得到营养。报纸办好了，可以成为人民群众的向导，这是报纸的一种领导作用。而这种作用，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总之，办报的责任是重大的。报纸办得如何，在今天大量公费订报的中国，主要不能看销数，而是要看办得是否受读者欢迎。希望你们永远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打成一片。



看来，你们的报纸是重视发扬民主革命时代留下的办报好传统好作风的。你们人员精干，工作有效率，新闻敏感性强，干部作风朴素、民主、上下团结一心，为共同事业奋斗，这些都是值得祝贺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把《世界经济导报》办成千千万万人民爱看的利国利民的人民报纸。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6月24日）



祝《文汇报》五十寿

经历几多风风雨雨，《文汇报》走完了半个世纪的不平凡岁月。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作出过种种贡献，至今仍被人们所景仰和怀念的报刊，有一个特点，即大都是短命夭亡的。《文汇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有光辉历史的报纸，在解放前它屡受迫害，屡扑屡起，它的50寿，标志着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报刊，不再短命而亡了。历史的逆境成了过去，这是首先要庆祝的。

作为老读者而且有幸参与解放初期《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的我，放眼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前景，觉得《文汇报》有些宝贵的东西值得新闻界同行的重视和发扬。

《文汇报》在长期办报历程中，经常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紧紧的依靠读者，尊重读者，因而赢得了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信任和爱戴。《文汇报》每日一百几十万份的发行量，很大部分是靠读者自费订阅的，这就是读者信任最有力量的证明。报纸能获得广大读者的信任，标志着报纸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这对办报的人该是最高的奖赏也是最大的安慰了。《文汇报》在这里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发掘。

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和富于革新精神也是《文汇报》突出的方面。上海的报刊竞争意识很强，《文汇报》办事敏捷和较高效率也是被同行所称赞的。《文汇报》的艰苦奋斗精神也很突



出，凡是亲眼看过它的工作环境的，都为他们狭窄拥挤的工作场地发出由衷的感叹。《文汇报》却在这样艰苦的磨练下，出报出书出杂志而且还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新闻闯将。总之，《文汇报》的工作效率、革新精神、艰苦奋斗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效仿称道的地方。《文汇报》的工作人员以自己的辛劳和顽强奋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丰富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宝库。《文汇报》不仅有历史的光荣一页，在解放后也为新闻同行树立了多方面的楷模。

《文汇报》在它诞生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也将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大变革、大发展的一个伟大新时代，是中华好儿女大显身手的伟大时代。我祝贺《文汇报》的健儿再接再厉，斩风劈浪，永远站在时代前列，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永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青春。

（按：此文系石西民同志在病危时的文稿1987年8月）

（原载上海《文汇报》1988年1月26日）



缅怀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日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苏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举行了投降的签字仪式，中国军民经历8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苦难的祖国，从此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独立国家，使历尽苦难的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可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内战的乌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

国民党当局首先是想垄断全部对日寇的受降，居然下令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准接受日寇投降；相反却要那些为虎作伥，罪恶累累的汉奸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与此同时，为了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大批国民党部队，杀气腾腾地开始侵入解放区。国民党正在磨刀霍霍，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于8月28日应邀由延安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共商团结建国大计。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43天谈判，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非常光辉的一页。现在回忆这近40年前的往事，重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几篇文章和讲话，心情还是一如既往，激动不已。

8月28日那天一早，我当然是分外的忙碌。外地有几个民间报纸的特派记者，他们要采访毛泽东主席来渝的消息，



等着我去帮助安排，与重庆市的各报进步记者也要进行有关宣传业务上的联系。我安排好了这些事，就坐上一辆吉普车去迎接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郭沫若和他的夫人于立群一同去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28日那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中午1时许，机场上已开始聚集了许多欢迎的人，大家的脸上都显得喜气洋洋，民主老人沈钧儒先生更显得活泼开朗，像个青年小伙子一样。下午3时飞机降落，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人物，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中外新闻记者等一下子拥向机旁，毛泽东同志手拿着软木帽步出机舱，向欢迎者频频招手，接着是下机后的握手寒暄摄影，整个机场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28日一早，《新闻日报》刊登了预告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的消息，当天下午5时又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到渝的号外，这使得整个山城沸腾了起来。“毛泽东来了！”成为街头群众议论的中心。

9月1日傍晚，坐落在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酒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参加了这个盛会，会场里外乃至附近马路上，都挤满了人群。在会场里面的楼上，传出了一阵阵兴奋、热情的欢笑和掌声，一大批人围着毛泽东同志热情地握手碰杯，冯焕章（玉祥）将军、覃理鸣（振）院长，都激动地甚至流着眼泪与毛泽东同志碰杯。冯将军更是深情地说：“你来了，中苏同盟条约签了，让我们为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干杯！”，这真是历史性的握手。当毛泽东同志将要参加这个酒会的消息传出不久，会场外面街头上就渐渐聚起了人群，一辆参加酒会的汽车驶来，更引起了围观者的注目，大家互相关心地询问：“看到毛泽东没有？”街头聚集的群众，一直到酒会散会才陆续离去，他们都想看一看为



争取和平建国而来重庆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丰彩。会内会外种种，都说明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肩负的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他真的是一身系天下安危。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在日寇宣布投降以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非常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讲话，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号召全党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来对付国民党的内战，警告党内同志不要像陈独秀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我们党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清醒的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能够驾驭一切复杂变化的形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革命历史剧来。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政治决策。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内战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冒险犯难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践，至今，仍然是每一个革命同志学习的丰富宝藏。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的前三天，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国内斗争的策略，发出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为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为此向国民政府提出应立即采取的6项紧急措施。毛泽东同志来渝商谈



团结建国大计，就是为了制止内战，促使国民党政府接受这个和平建国的方针，促进紧急措施的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到达重庆本身，就使国民党连日制造的许多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等等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谣言，如同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日子里，他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现国内和平的主张，深深地传达到人民的心坎里。全国人民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张治中部长举行的欢迎会上“和为贵”的激动人心的讲话，而且通过国共谈判，更加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让步行动，如撤出8个解放区，在整编军队上也只要求占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等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毛泽东主席以自己冒险犯难亲历重庆的所作所为，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主张国内和平的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后来挑起内战，很快丧尽人心，这个民心向背的政治基础就是在重庆谈判中开始建立起来的。这是毛主席在重庆所获得的最大政治成果。

为和平与为民主是必然相联系的，正如反内战与反独裁有必然联系一样。毛泽东主席的到达重庆，经过43天谈判，最后产生一个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出现和纪要本身都说明：这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一次重大胜利。通过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地位争取到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只好承认了。党派平等合法，也写在协定之中。中共中央所提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成为共同的方针终于被肯定下来，有关政治民主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等问题，在国共两党会谈



纪要中都肯有所肯定。这就是后来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基础。

至于谈到团结，毛主席在重庆逗留的43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广泛地接触了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从当政的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党政军负责人到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新闻界、实业界、戏剧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不是亲自登门拜访就是亲切热情接待或约谈。此外，与驻重庆的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各国新闻记者也都有多次接触。当时上清寺的桂园和特园就是这许多交往的重要活动场所。桂园是张治中部长寓所，腾出来供毛泽东主席下榻的。其实毛主席住在红岩，这里成了他会客招待各方代表人物的聚会场所。特园距桂园不远，这是鲜特生先生的家。这个家真可说是民主之家，一直是民主党派著名人士聚会之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后的第三天就在特园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等先生见面叙谈，随后这里也成为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的场所。这相比邻的两座房子里，曾经聚集过许多风流人物，议论过关系国家命运的种种大事，是很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接触的人是非常广泛的。也正是由于他通过这样广泛的直接接触，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十分显著起来，而且也使毛泽东同志直接产生了如下强烈的印象：“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见《关于重庆谈判》）中共领袖根据亲身体会得出如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结论，看清楚民心的向背，这无疑对此后的政治与军事两条战线斗争的进行和战略策略的



制定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也标明着毛泽东同志重庆之行的重大成果。

使我长期感到受益的是从毛泽东同志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他的言谈中所给予的高水平的政治斗争的深刻教育。比如毛泽东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过陈立夫这样一伙反动透顶的国民党人士，这在当时就引起某些进步人士的惊异，他们奇怪为什么毛泽东先生要去访问 CC 头子陈立夫这号反共头子。其实毛泽东同志想的恰恰相反，越反动的头子他越要去拜访，越要去做工作。毛泽东同志这样做，自然主要不在于以一次谈话来改变那些花岗岩头脑的反共分子的观点，而是表示着中国共产党对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共同协议基础上团结的诚意，以及对争取广大中间分子，分化顽固右倾分子将起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毛泽东同志来到重庆，自然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他的安全担心，对国民党愿意实现和平民主缺乏信心，因此也很为国共谈判的前途担忧。也还有许多中间分子不相信国共能谈判解决问题。因此社会上对国共谈判充满担心与怀疑。这也是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最高的政治家风格，即以他的鲜明坚定的态度和语言来回答这方面的疑虑和问题，表示和平谈判一定成功，或则说和平的希望很大，国共这次谈判一定可以解决等等。当路透社记者问：假如谈判破裂时……？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我还回忆起当时有一段非常生动的对话。这是沈衡山（钧儒）先生与毛主席的谈话，沈老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朋友，他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生怕中国共产党上当受骗，一再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同志表示要当心骗局，流露出对毛泽东同志安全的关切和对谈



缺乏信心。可是毛泽东同志却非常耐心地用乐观的口气风趣地向他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章程（即指一半成功的希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国共谈判犹如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这不是一开头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等等。以上我回忆的当然不是原话，只是谈话的大意。从这些细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水平。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这种种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要激励各党派以及所有有识之士来向国民党反动势力争取和平民主。是鼓舞大家努力去促使实现，去斗争。如果一个领导者对所奉行的使命表示犹移，这怎么行呢？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讲的有些话，侧重点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有若干不同。这就是最值得学习的斗争艺术。而且以毛泽东同志的身份在重庆谈判时一再说和平谈判一定成功，只能使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家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和民主的诚意，大大显示于天下。

我记得1946年1月12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同志向会议作了有关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可是周恩来同志介绍了9年来国共谈判的历史经过之后说：“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从痛苦的经验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周恩来同志接着详细说明了四点经验教训，尽管周恩来同志谈到的那些具体事例与做法，作为历史已经是明日黄花，现在重提它也没有什么价值，可是，他所讲的四点经验教训即“第一点要相互承认，



不要相互敌视；第二点要相互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要相互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相互竞赛，不要相互抵消。”周恩来同志深情地说，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却是一种由衷之言。”周恩来同志所概括的这一段话，与毛泽东同志有理、有利、有节的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完整地表明这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政策的精华所在，也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经过自身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乘飞机回延安。在重庆工作的所有同志的心头顿时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平安回去了，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回顾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那段日子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等所有党的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紧张地围绕着国共谈判在进行工作战斗，这里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同志们对领袖无比关怀的同志情谊。

毛泽东主席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从最细小的地方都可以看出红岩村的同志们对领袖的爱护。炊事房的同志想方设法要给毛泽东同志吃点爱吃的东西，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午间的休息，办事处年轻同志们的球也不打了，谈话的声音也低了。同志们念念不忘要创造一个很安静的环境，让工作劳累的毛泽东同志休息得好。《新华日报》的同志最主要的是要把毛泽东主席来重庆的政治意义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出去，还要多方想法在报纸宣传上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并且通过各种适当方法，把谈判中存在的问题或国民党方面的有意施延，以及国际上



希望我们和平民主，不赞成内战的舆论等等，在报纸上适当反映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新华日报》在这方面是配合了谈判，工作是做得有声有色的。

特别值得缅怀的是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的辛劳。在谈判紧张的关头，有一天我从红岩办事处走下山坡，恰恰碰到周王两同志从马路上下车走上山坡来，我看到他们走得那么气喘嘘嘘，再看到他们十分疑重的神色，心里油然而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是的，在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日子里，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真是心力交瘁的。他们的身上担负着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具体谈判的重担，同时又承担着毛泽东主席的安全的重大责任。我从他们的神色中看到这两位我党的领导人是怎样紧张地在从事着关系中国人民命运的这场复杂的谈判。

使我最不能忘记的是10月8日傍晚张治中假军委大礼堂举行招待会上的情景。这是一次欢迎毛泽东同志并宣布国共会谈结果即将公布，张治中本人将奉命送毛泽东同志回延安的酒会，有500多来宾参加，招待会后是看京戏。参加的人们都为国共谈判获得成功而庆幸，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招待会上发表了“和为贵”，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等动人心弦的讲话，他的讲话一再被听众的掌声所淹没。总之，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夜晚，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噩耗传来：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同志遇难了！李少石同志是先烈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婿，他平日脚不出户，从不公开以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的身分参与对外联系。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会场经龙飞虎同志走到剧场的前面第四五排轻轻告诉正在看戏的周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当然会感到有如晴天霹雳。我当时正坐



在他的身旁，而前面一排坐着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严肃地站了起来，我也跟着走出了剧场到一间休息室坐下，详细地听来人的汇报，他非常激动悲愤地说“少石同志是为我而死！”我当时明白，因为李少石同志非常像周恩来同志，那些破坏国内和平的反动派完全有可能要对周恩来同志下毒手。打电话找来了国民党政府宪兵司令，周恩来同志与他一同到市民医院。周恩来同志对着已经逝世的李少石同志的脸，失声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杀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

我提上面这件事，为的是要说明我们永远怀念的周恩来同志的高贵品德，不是来说李少石案的详情。事实上李少石同志的遇难，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这正如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谈话所说：“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周恩来同志从医院归来，除在军委礼堂休息室要求国民党宪警认真查明凶手案情，并把应安排的事情安排之后，又轻轻走进剧场，仍然坐在原来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到京戏演完散场。直到散场，毛主席向主人道别上车为止，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同志不曾将这个当时尚未查清又非常震撼人心，也使他本人悲愤欲绝的惨案向毛主席透露一个字。毛主席始终坐着看戏，不曾知道曾经发生这个大事故。我目睹此情此景一直怀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每当想到这里，头脑里就出现周恩来同志的高大形象。是他在这个悲愤痛苦感情激动而又情况非常复杂的险恶的情景下，像一棵苍松，像一个大大理石塑像那样坚定镇静。周恩来同志场内场外显然成为两个人。如果这不是他对形势的高度警惕和对毛泽东主席安全的出乎赤诚的关怀，怎么能够当场如此镇静呢！恩来同志的



品德，怎么不令人永远崇敬！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这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人们的回忆和纪念。

(原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第12期，1983年12月)



南罗两国之行

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两国记者协会的邀请，我同其他四位同志前往作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访问。走马看花，不无所感，愿借《解放日报》副刊的一角，写点零星的观感，以飨某些读者，同时也是对副刊编者长时以来约稿的还愿。

既然叫杂感，那就是信笔写来，有感就发，无感就停。这是首先要作交代的，免得读者失望。

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我一向很感兴趣，总想亲眼去看一个究竟。说实在的，几十年来的波折，我虽非当事人，但都是亲自经历有所接触的，回想40年代初，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当编辑部主任。当时的《新华日报》利用解放区包括延安在内不可能有的对国外新闻联系的方便，曾经满腔热情地报道了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战争，刊登过长篇的铁托传记和他的木刻像。铁托这个沿用到现在的汉文译名，他是首先出现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毛泽东同志晚年赞誉铁托是铁，使我不时思念已经逝世的当年报馆的工作人员、译者任以沛同志。

我这次有机会去南斯拉夫，就想到带一件礼物去，这就是当年《新华日报》大量刊登的南斯拉夫游击战争和有关铁托



同志的宣传报道的一套照片。南斯拉夫记者协会的同志看到这些材料，感到非常有兴趣。他们虽然不懂中文，可是看到非常生动的铁托木刻像，一经翻译解释就完全明白了。记协的秘书长几次要找我谈一个问题：问我这些新闻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他的潜台词是，当时的南斯拉夫有以国王为首的流亡政府的军队，他们不抗击德国法西斯，并与南共闹磨擦，而英国、苏联都承认那个政府是正统的，还有伪军打起各种旗号，破坏革命斗争，当时连苏联都不肯大力支持的南共游击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是如此明显、坚定地支持它，宣传它？

由于南斯拉夫记协同志们的好奇、惊异，使我又想起1949年南京刚解放，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苏联大使馆的管文化新闻的一个外交官。他在重庆时与我相识，一天匆匆跑来质问为什么南京《新华日报》上刊登南斯拉夫的新闻的情景，以及后来的种种大事。当然，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成了陈迹。

一到南斯拉夫，总感到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中国来的访问者非常亲切。中南两国距万里，语言和生活习惯非常不同，这种亲切的感情来自他们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敌人、获得解放这一历史事件的崇敬。也来自他们与我国相类似的革命战斗的经历和对他们自己革命成果的骄傲。这种感情，可说是“惺惺相惜”。

我的心情很自然地想到了国内：当前在万里以外的朋友们尚且如此尊重钦敬中国的伟大革命斗争，我们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把它忘掉。曾经参加过这场壮烈斗争，而且做出过贡献的老干部们，也希望珍惜它，千万不要糟蹋它。“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要有这样的高尚的情操，做一个堪为年



青一代楷模的老革命家。这可并不容易啊！

—

由于自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以来的几番波折，使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真实情况的认识不堪了解。这些年来情况完全改观了。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不久前访问了这个国家。远在1977年，85岁高龄的铁托总统前来中国访问，揭开了中南历史上的新篇章。现在的情况令人高兴，也令人更想亲眼看看这个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我们曾热情歌颂过的英雄国家，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它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等等。所以，我这个年逾70的人，一有机会就欣然道来了。

贝尔格莱德这个城市，从表面看来，尤其是从来自东方的远客的眼光看来，简直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几乎没有差别。西方的城市建筑风格，人们的穿着和生活习惯，街头的繁华、汽车的众多以及报亭上形形色色的外国报刊等等。然而，稍微接触了一些情况，通过自己的眼睛又看到它们的区别，而且是根本的区别。

我们初到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党政与新闻方面的负责人相继地接见了我们。每一次接见，他们都要谈到社会主义自治，并向我们介绍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他们有一整套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治理论，有各种独创的自治体制。有的具体做法也很繁杂，对一个外来的人，不可能一下弄得非常清楚。我是从看到的一个个印象中，织成了我头脑中的一幅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蓝图，内心好像解决了一个什么重要疑惑似的，



感到说不出的满足。

首先，南斯拉夫对自己的革命历史、革命先烈非常崇敬，到处都有纪念设施，从纪念碑、博物馆到纪念公园，每天吸引着大量的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我们访问了贝尔格莱德铁托同志的故居，瞻仰了他的坟墓。那坐落在一大片丛林里的宏大建筑，南斯拉夫各地来瞻仰的人包括一些外国人，每天有近万人。这么多的瞻谒者不论年老年轻，都是非常有序地、肃静地排着队或坐在草地上，静候前面的人依次进入房屋，真可说是秩序井然，而没有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或纠察人员。从他们的表情中处处可以看到人们对南共党和铁托同志的敬爱。他们在参观了铁托的故居之后，默默地从用大理石筑成的非常朴实的铁托同志墓前经过。这种情景再加上南斯拉夫人民对革命老战士的尊敬，这不是处处显得与资本主义本质不一样吗？

使我十分感动的一次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煤矿发生事故，有数十人伤亡。电视屏幕上出现现场镜头，同时报道了全国风起云涌的募集救济金的活动，联邦政府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对一个矿工遇难事件，会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的国家，我们还须再说什么呢？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民族团结是南斯拉夫立国的三项原则之一。南斯拉夫的立国三原则是：一、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二、各民族团结；三、不结盟。这三条是任何人不能反对的。南斯拉夫在铁托活着的时候，为民族的团结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就拿办报来说，不要说较大的民族，就是只有2万左右人口的一个小民族，都有自己文字的报纸、书籍。由于发行民族文字的书报销路有限，国家每年都花很



多的钱来支持，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说，这个代价是必须的，是为了民族团结所必须的。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各个领域，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在民族问题上的成就确实是惊人的，这种成就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当然，我们同样要指出，民族问题在南斯拉夫仍然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期奋斗的工程。正如南斯拉夫的人们坚定自己对社会主义自治的信心，但同时他们也很清醒地指出：“我们没有抱这样的幻想，似乎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可以一下子为理想的自治社会定一个公式。”“自治的发展与实现，要求进行整个一个时代的战斗和努力。”（爱·卡德尔）南斯拉夫的同志非常坦率，他们从不向客人，当然更不要说对本国人民来隐瞒自己的缺点。他们总是说到他们自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陈旧的事物。我们在接触南斯拉夫报纸同行的时候，他们的许多做法说法，在我们听起来确实有些“海外奇谈”之感。譬如他们说：成就不讲，人民也知道，而错误缺点报纸却要大讲特讲，以引起人们重视才行。这样说，当然与我们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南斯拉夫人民不怕讲出自己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这种坦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自信。

—

南斯拉夫人崇敬铁托显得十分自然而又真挚，这一点只要稍加留神，随处都可以看到，上篇写到排队瞻仰铁托墓的情景是这样，从挂像方面也可以看到是这样。我们曾走进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办公室，看到有的办公室将铁托的像挂在墙壁



的边边上，还看到各种不同的挂法，我感到别致，也油然而生地感到人们对领袖感情的真挚，不会给人有奉命行事的印象。

铁托在世的时候，不仅南斯拉夫的人民，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家、记者也都承认：“没有他就无法想象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和它取得政权的道路。”因此，铁托确有权威。

作为一个党与国家的领袖，铁托为缔造南斯拉夫所作出的贡献之大，甚至是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的。把铁托设计的现实的南斯拉夫加以抛弃和摧毁，只能把巴尔干这个素来有名的火药库再陷入被占领与分裂的状态，这是洞若观光的。当我默默地站在铁托墓前凝视着那玉润的大理石棺时，我想到这个人，在那样风涛险恶的年代，他不曾大骂过中国，不曾大骂过中国党。这个人的远见卓识和他非凡的策略与机敏，怎能不使人感动？在他死后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和生卒年月之外，没有刻上任何一个字。平凡与伟大，在这里，也在我的头脑里、感情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西方有过非常众多的文章，分析过铁托以后的南斯拉夫。有些人关心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这条航船会驶向何处，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如今铁托去世3年了。铁托生前为之奋斗而且已经取得了光辉成就的三项立国基石：社会主义自治、民族团结、不结盟，已经在各方面经历考验。经过3年考验，不是起码可以说，南斯拉夫这条航船，在风浪中正沿着自己的预定的航向行驶吗？

我想起了在贝尔格莱德南共联盟中央那座高大楼房中的一次接见。我的耳边好像还在响着那位中央书记的一段谈话。我十分欣赏他的那番很有自信的话。他告诉我们：“新南斯拉



夫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能不顾过去而只看今天和明天。”“南斯拉夫当前主要任务是为稳定经济而斗争。这个斗争要靠劳动人民在自治关系中去求得解决。”他还说：“南共联盟十二大的召开，是第一次失去铁托、卡德尔等杰出人物之后，而我们为独立为自主为社会主义自治而斗争的决心绝对不会动摇。”他又说：“南斯拉夫的反革命势力还在西欧活动，东西方争夺巴尔干也不会停止。同时，我们是开放的国家，各种思潮都会有影响，我们要长期进行斗争。”

当这位书记同志说到南共中央最近开了一次全会讨论新闻工作时，我们问他：当前主要是同什么思想倾向作斗争呢？他回答说：“思想斗争很复杂，很难说什么是主要危险倾向。有的向往西方议会制，有的要恢复国家社会主义，还有西欧极左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真是形形色色，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反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我们就是要扩大而不是缩小，是竭力去完善社会主义的自治来与各种反对思想作顽强的斗争并战胜它，也要用法律来制裁破坏。”他的话说得果断有力，说明要撼动铁托生前早已确定的根本方向，是不很容易的。

四

从南斯拉夫到罗马尼亚，隔着像黄浦江那么宽的一条多瑙河，我们晚上坐火车，没能饱览闻名已久的河上景色，第二天一早就到达布加勒斯特。

南罗两国接壤，山河一样秀美，但风土人情，国情却有显著的区别，一个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组成的国家，一个是与



拉丁民族有亲近感的自称为达契亚人的民族国家。南斯拉夫人表现得较为随便不拘，而罗马尼亚人则比较严肃自律。他们相同的是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建设成就感到自豪，两国人民都对中国的来客友情真挚。

我们在罗马尼亚乘汽车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多次穿过横亘全境的喀尔巴阡山脉，访问了10多个县城（他们的县在建制上等于中国的省）。沿途随时可以看到宏伟的现代化工矿企业，矗立在原野上。10多年来，罗马尼亚建设的速度是惊人的，虽然现在有一些困难，但人民正在节衣缩食为偿还外债，为克服因高速发展而出现的暂时困难而战斗。

罗马尼亚的同志同我们谈话时，常常会说与中国比他们是一个小国，这当然也是事实，罗马尼亚只有2200多万人口，23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可是我的感受却是从这个小中看到大，看到广博，也看到殷实以及很高的文明水准。

先说城市和城市建设。布加勒斯特与贝尔格莱德一样，城市中有大片的森林，绿化面积之大，使人羡慕不已，这两个国家的首都，马路上汽车喧嚣，然而坐在旅舍房间里，却终日可以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街心公园点缀着三三两两的老人与小孩，玫瑰花红得十分寂寞，更显得林木幽深。傍晚散步林荫道上，菩提树的花香一阵阵沁人心脾。把一个大城市衬托得繁华中有宁谧，喧嚣中有幽静，怎么不逗人喜爱。

罗马尼亚的城市建设，规模一般都是10万人口左右的县城和一二万人口的县属城镇，建设得各具特色，街道宽敞整洁，旅馆餐厅都盖得华丽舒适，处处可以看到执政者关心人民生活的匠心独运。整个罗马尼亚竟有400多个博物馆。

我们在参观访问他们的旅游胜地时，看到很多本国与外



国的旅游者、休假者在那里漫步或运动。他们旅游设施的完备，服务的周到，环境的幽美，都是令人神往的。雕塑以及假熊、假马等供人欣赏与拍照的设施，触目可见。这里有许多花草园林，却没有见到一个小孩去破坏践踏，游人尽管来去不绝，可周围环境始终保持着清洁和安静。

文明与不文明是相比较而言的。当我到处看到整洁，看到秩序井然，看到人与人相处彬彬有礼，而看不到破坏公物吵架等野蛮举动时，怎能不由衷地称赞这高尚的文明生活呢？

末了，我还想借此向新闻界的朋友们传达一点信息。南罗两国发行的报纸，就人口比例看，发行量都大大超过我国。在南斯拉夫，几乎没有公家订报的。每天早晨人们围着街头报亭买报纸。南罗两国报纸的编辑部都很精干。南斯拉夫《战斗报》社每天要出3份日晚报，还要负责编3份周刊和3份半月刊。光是《战斗报》每天要出14版，星期六出20版。一份晚报每天要出12版。《战斗报》编辑部包括驻国外记者，总共多少人呢？一共600人。这要算是最大的编辑部了。

在罗马尼亚，党中央机关报《火花报》的编辑部一共只有130个人。罗马尼亚党中央有个新闻部，管全国的新闻、广播电视工作，这个部一共只有13个干部。我们沿路问每个县报，他们大体都是日出四开一张，日销五六万份，编辑部最大的也不超过18个人。我们走到报社去，看不见在我们这里常见的那种忙乱景象。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83年7月21、27日，8月18日9月22日）



旧梦偶忆集^①

大跃进与搬到工人新村住

1958年大跃进，不仅生产事业上大搞主观狂热，即在思想、意识、生活诸方面，斗争也甚激烈。所谓大扫官、暮、骄、娇诸气，一时狂风四起。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带头，立即搬家，从洋房搬到东庙新村与江南造船厂工人住宅联在一起的工房中去住。第一书记带头，书记紧跟，我等自然不敢落后。东庙新村在市南郊，我早出晚归，住了几个月，从未交上一个工人朋友。有时清晨向东走去散步，经过许多工人同志的住处，因无熟人，也是看看穿门而过。这说明住房搬到一块去，生活仍然没有联系，反而多了每天上下午二次上下班的长车队风驰电掣而过。

陈毅同志来沪，曾在几次闲谈中表示对上海做法有不同看法。但是他说得很委婉，说：你们搬去与工人同住，我看值得研究，不过，我不愿来干预你们的内政。他不赞成这种形式主义做法，是显而易见的。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干部大概

^① 石西民同志在1984年秋开始写作《旧梦偶忆集》。从题目看，作者是计划以笔记体写出自己一生中值得回忆的所见、所闻、所感，实际上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经验总结。可惜只写了三则，即因病辍笔。这是作者的一大憾事，也是读者的一大损失。



在东庙住了一年多，到1960年又搬回市内住了。

大跃进风刮起来的一点体会

1958年的大跃进飓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在上海是在领导人已瞭然于党的领袖有鼓动性的一些言行之后，即由在家看守的书记发通知部局干部，于是日晚上12时开会，作传达部署。为什么要深更半夜开会？这就有一点妙用在里面，真是所谓先声夺人，制造紧张局面。

另一个更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号召各机关各工厂学校干部群众写大字报，一个人写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张，报纸上宣扬全市大字报已写了多少亿张来加以煽点。据当时经验介绍，一个人写几张大字报，则不触灵魂，不痛不痒；连夜写下去，写了几千张几万张则头脑越来越热，劲头越来越大，越写下去，本人就狂热起来了。过去不敢想的事，现在真的是敢想敢说敢做了。由于人一旦狂热起来，毛泽东同志的片言只语一下子就变得有神效起来了。敢想敢说破除迷信，确实起了一些创新的作用，但是更大更多的是害人的浮夸风与劳民伤财。写大字报写出一个干劲，倒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所谓“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例，要使一些年轻人狂热起来，手法确实是很高明的，可惜于事无补而多害呀！

陈毅同志路过涉县西戌

1947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前往参加。会后陈毅同志途经涉县西



成新华社总社与陕北广播电台所在地参观并作了一次报告。陈老总妙语连珠，性格坦率，他当时讲在山东战胜蒋介石重点进攻的艰难情景，至今历历在耳。敌人围剿，天又下雨不停，大小河流涨水，战士指挥员都是艰苦万分。山区房屋木板烧尽，湿衣长穿不换，一位司令员骑马过河，因无裤而无法行动。其狼狈如是。从中亦可见粉碎重点进攻之不易的了。

陈毅同志谈到12月中央会议的精神在纠“左”，他传达中提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有不到半年，仅一河之隔，没有报告一声，20万人头落地（华北各解放区土改反右中的过火斗争）。又说，鱼骨尚可雕花，就是废物难道也一点不能利用？陕北边区有个李鼎铭老先生，当然是一个大地主，他一向拥护土改，长期与共产党合作。抛弃这样的朋友，是不得人心的（大意）。当时我记录了陈毅同志的传达，可惜后来记录稿被迫毁掉了。



附录一

石西民诗抄

《文教资料》编者按：石西民同志不是诗人，亦无意做诗人。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到晚年，抒怀明志，时有吟哦，其中颇多佳作。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其生平，思想，本刊特选载他的一部分诗词（大部分生前未发表，系根据手稿整理）。

赠 别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时作）

莫道深情似醉，
除夕恰逢离别。
万里云山，
何处是甜乡乐阙？
夜正黑。
但长虹在手，
壮志不灭。
看中华儿女斩荆棘，
热血头颅抛掷处，
旭日东升急。
待重逢，
共饮三百杯，
试比谁英杰！



〔自注〕

送别毕期望。皖南事变后，（重庆新华日报）报社同志纷纷离去，期望将远行。我们同在编辑部工作，夜深纳报之余，写下这一首首诗《赠别》。

（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月30日。

为作者后来整理诗稿时所加）

访友人

（一九六四年广州梅花村）

畅谈不觉日迟迟，鸟唱梅花窗外枝。
闻道每惭胸臆塞，听歌犹觉壮心驰。
文章事业如鹏举，风雨姑苏入梦思，
沉醉江南云外客，红楼依旧昔来时。

〔自注〕

一九六三年三度赴粤，访王匡寓东山梅花村。

狱中吟

之一

消息无端久失闻，何曾垂老畏风尘；
方思秋壑开红叶，定卜春郊遍绿茵。
此际胸怀尤胜昔，当年战友倍相亲；
两间劫历三千数，始见金刚不坏身。

（一九六九年）

之二

酷喜悲歌慷慨声，龙泉三尺夜犹鸣，
意横敢顶千钧压，霹雳应效万蛰惊。
富贵浮云难入梦，江山妩媚总关情；
欢娱每自沉哀始，此意从来未易明。

（一九七二年）



酬“古稀余孽”^①

(一九七八年九月朝阳医院)

住院四月，一旦分别，承赐玃珠，岂可不答。胡诌数语，共此相忆。

燕岭不能歌，晚话不准说；
寂寂黄叶村，零落剩余孽。
江湖多风波，十年久隔绝；
珍重更加餐，走路勿迷失。^②
“随心所欲”翁，童心不可灭。

[自注]

①廖公沫沙自称。

②同住医院，常一起外出散步。廖公常常迷路。

赠别南京诸友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

秣陵风雨忆华年，卅载重逢发已斑。
往路崎岖盐车负，征程绵邈铁肩担。
中流慨慷歌祖述，椽笔酣挥补旧天。
且喜金陵才俊健，晚晴人重劝杯干。

谒红岩纪念馆

(一九八〇年夏初)

(一)

似梦当年事，今朝入眼帘；
哲人虽云逝，遗范在红岩。

(二)

千古奇冤句，一歌敌胆寒；
金声振霄汉，亿万奋无前。



(三)

吾党长征路，文军共武军，
功业自彪炳，天下颂声腾。

(四)

江水依然碧，青山耀眼明；
丰碑留万世，千古一完人。

(五)

重仰巴山道，而今白发新；
依依昔日训，刻骨导师情。

贺新郎

赠广州战友(一九八〇年秋)

往事从头说。卅年来，云天相隔，几番风雪。握手羊城
诚非易，相对苍颜话咽。举樽酒恰黄花时节。激荡胸怀难尽
诉，喜丹心热血肝如铁。狐鼠辈，已沦灭。今春有幸红岩
谒，虎头岩，纵情歌唱，当年雄杰。山径依稀仍可识，景物
惆怅非昔。立碑碣，是吾曹职。美哉新华留伟业。更紫回，
雨露恩师德。重振翻，海天阔。

[自注] 此词为平生第一次尝试，不协韵。心情激动，不能已，就不管这许
多了。

访日口占

(一九八一年秋)

岚山周诗碑

东渡求真识，周碑哲理浓；
娇妍诚胜迹，苍翠显雄风。
功业自千古，岚山迪一宗；
卅年重教德，高仰永无穷。



赠创价学会池田会长

翠嶂丹枫人语哗，深情如海胜归家，
烟波无限东来意，为颂吾公金桥架。

〔自注〕 池田大作、竹入义雄均有促成中日复交之功，日人云“架金桥”。

乡 情

（一九八二年春）

（一）

漫步东山塔影明，依稀往事梦难成，
欣闻生计初见春，乍遇乡音倍觉亲。
雾障仙华岗滴翠，车回花树鸟鸣晴，
今生南北行多路，迟暮犹燃赤子心。

（二）

白首归家处处情，儿时踪影渺难征，
田园景色迷人眼，耄稚欢颜醉客心。
云拥峰峦愁不见，车驰杜宇笑相迎，
壶源水过金坑岭（注），喜报当年愿竟成。

（自注）余幼时常听父老言，昔日陈公，欲于金坑岭作坝，令壶源江水折向东流，灌溉丘陵地段，惜未成而罢。此等传说，实乃千百载农民之愿望表现也。余少年时每过金坑岭，见两岸陡壁，一水中泄，即兴何日得遂父老宿愿之愿。今白首归家，参观发电站，目睹昔时人民梦想，已成现实，安得不为之狂喜耶。

留白沙（建德县城）

（一九八二年春）

（一）

高坝烟波淼，峰青水更蓝，
剧怜杜工部，不得泛新安。



(二)

白沙人物美，岂独景色妍；
我梦登舟去，追留孟浩然。(注)
(自注)孟浩然诗有：“建德非吾土”句。

(三)

西子三千个，江城无数山，
愿种千树桔，终老在新安。
【按】“西子三千个”为郭沫若咏新安江句。]

戏题陶白莫愁女装照片

(一九八二年春南京)

细辨分明老莫愁，冰心结伴作春游；
无多前路应乘兴，因怕观棋懒上楼。

【按】莫愁湖有“胜棋楼”，传为明太祖与徐达对弈处。]

中宣部见赠两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

京华咫尺久相疏，喜得南针两册书；
知止求真须自励，悬鱼不羨淡清居。

〔自注〕①两书为《中外古今年轻有为的政治人物选辑》、《外国一些政清要人退休后的社会活动》。

②《汉书》载东汉庐江太守羊续拒下属送鱼，却之再三，送者如故，乃将鱼高悬屋檐下，直至晒成鱼干成臭，送礼之风乃息。余意如作长安布衣，即无此劳矣。

重刻雪岭

(一九八三年秋)

吊叶挺

将军跃马江南叶，壮士横戈陕北钟；



未许白头输劲节，青春弋水皖山松。

参观新四军军部旧址

云岭风云会，功勋万代新；

沧桑几过客，秋色醉行人。

上 黄 山

应庆七一上黄山①，挥汗攀登秋风绵。¹

峭壁苍松堪赏目，翻怜碌碌是人间。

【自注】七十一岁也。

重上清凉山

（一九八四年五月）

策杖上清凉，故地依然在；

老乡笑脸迎，夸我老犹迈。

回首卅年前，心情激难抑。

俯视延河川，混浊不胜昔；

城市多高楼，且喜见殷实。

哭陈其五同志

（一九八四年秋）

愿倾银河水，洗君芳洁身；

情由憾作起，愤仄左炎深。

“文革”共罹难，时危共见真；

灵前凝立久，风雨一昆仑。

无 题

一九八七年春初一，重读去年

初一所录诗句，感极口占



去年春节尚临诗，今岁筵前谢酒卮；
老病已枯忧国泪，韩非朱子不能师。

〔附〕

一九八六年春节录顾况淡泊自甘诗遣怀，
并颂改革开放盛世来临也
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
还丹寂寞羞明镜，把手屠苏让少年。
(原载南京师大《文教资料》1988年第6期)。



附录二

石西民年表

1912年 1岁

11月4日(农历九月廿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长源乡石宅村,原名石士耕,父石树勋,母赵春收。自幼过继给叔祖父石聚兴为承重孙。石聚兴青年时代为贫农,中年后经商致富,而成地主。

1917年 5岁

入石宅村、茶山村私塾读书。

1922年 10岁

入金华浙江省立第七师范附小读书。

1925年 13岁

到建德县,考入严州中学初中部。

1928年 16岁

初秋,初中毕业,由老家到上海,入群治大学高中部读书。

从这时起,开始认识社会,寻找自己应走的道路。课余,贪婪地阅读创造社、太阳社出版的诗歌、小说。诵读郭沫若的《女神》,如痴如醉。

开始养成每天翻阅大量报纸的习惯,以后终生不变。从这时起,立志做一名新闻记者。

10月,经中共党员蒋治介绍,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



1929年 17岁

2月，经蒋洽同志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共党员。

1930年 18岁

3月，调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干事，在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同时兼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沪东区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写有关沪东工人运动的通讯报道。此为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的开端。

春夏之交某日，在公共租界五马路一家旅馆里，参加《红旗日报》各区通讯员会议。会议由潘汉年主持。潘为创造社成员，石在书报上早已知道他的名字，这是第一次见面。

1931年 19岁

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江南学院政治经济系。在校与同学王某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并在学生会中担任宣传工作。

本年春，党的四中全会后，因沪东区委分裂，一度对党失去联系。5月，参加“五一”示威游行，碰见党员李某，始接上党的关系。

7—8月，暑假回浦江，策动浦江、诸暨地区武装暴动。

9—10月，开学后回上海，适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两次组织并参加了上海学生赴南京抗日请愿团，并参加上海学生营救北平学生的请愿示威，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1932年 20岁

2月，转入上海中国公学学习。

夏，因策动浦江、诸暨地区暴动，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张榜通缉。

9月，离沪北上。住北平和平门外浙江学会，先后在北



平大学、民国大学学习。

经石凡夫(石础)介绍,在北平继续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

1933年 21岁

5月,经反帝大同盟支部批准,去张家口,参加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军部政治处任政治宣传干事。参加收复多伦、宝昌战役。

7—8月,察北抗日同盟军失败,化装潜回北平。

11月,因北平宪兵追捕,潜回上海。

1934年 22岁

返沪后,化名石耕夫(又名石东夫)。参加了由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骆耕漠、徐雪寒、姜君辰、秦柳方、朱楚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情报社”,潜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成为这些团体的骨干之一。

在9月5日、12日上海《中华日报》和《中国经济情报》1卷20、22期上发表经济方面的评论文章;《亢旱后的浦江农民生活》。

1935年 23岁

参加创办“新知书店”。

经钱俊瑞介绍,在日本当时颇有名望的刊物《中央公论》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

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12月25日,参加上海各界为响应“一二·九”运动而举行的反日爱国大游行。队伍在南京路上受阻,自告奋勇把队伍带到宝山路东方图书馆广场,召开大会,继续游行。

本年起改名石西民,此后一直沿用此名。



1936年 24岁

1月，因投稿为《申报月刊》总编辑俞颂华所赏识，被聘为《申报月刊》编辑。从此，正式踏入新闻界。

不久，《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在该刊封里时事照片页，刊出了上年12月参加反日爱国大游行照片（石站在两个受伤青年中间，正振臂高呼口号）。俞颂华看到后，约石谈话，嘱在《申报》工作要特别谨慎。石以为要被辞退了，结果并没有。此后俞一直未再提此事，对石信任有加。俞颂华先生私下曾对家人说：“在我编辑部的同仁中，将来最有前途的是石西民。”

本年，勤于写作，著述甚丰。除继续撰写经济评论外，又开始发表有关日本问题的时事论文，颇受读者注意。本年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日本往哪里去》（《生活知识》1卷7期）、《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书》（《时代论坛》1卷2期）、《“开发华北”问题的检讨》（《申报周刊》1卷16期）、《为什么川越会升任驻华大使》（《申报周刊》1卷24期）、《一笔总帐》（《现世界》1卷3期）、《我国田赋的积弊与整理》（《中国农村》2卷11期）等。

1937年 25岁

“七七”事变爆发，由《申报》派往华北战地采访。7月31日午夜，与一位摄影记者同行，从上海乘车北上。经郑州、石家庄抵保定。在保定，采访了国民党华北军政负责人孙连仲、撤至保定的宛平县长王冷斋等。又几经交涉，获准至琉璃河车站最前线采访。

在8月份的《申报》上，发表此行通讯三篇：《北行途次》（8日）、《国防线上的石家庄》（13日）和《平津失守与平汉前



线》(22、23、25日)。

从保定返沪途中，8月12日在南京下关车站见到由沪来宁商谈国事的沈钧儒、黄炎培，说了几句话，匆匆分手。火车遇到空袭，折转苏嘉路到达上海南站，正值8月13日上午9时，炮声震耳，“八一三”战争爆发。

上海战争开始后，《申报周刊》停刊。《申报》总经理马良派俞颂华去汉口，参加《申报》汉口版筹备工作。俞去信上海，请石西民也去汉口。石冒着日机空袭的危险，押运一批汉口版所需卷筒纸，于10月乘船抵汉口。

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创办党报《新华日报》。12月，奉组织之命离开《申报》，参加新华日报筹备工作。

1938年 26岁

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华岗(华西园)、吴克坚。石为二版(要闻版，以国内新闻为主)编辑。

5月，参加由范长江、孟秋江等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6月，出版《国防经济讲话》一书，由各地生活书店发行。

因与新华日报其他同志一起抵制王明(时为长江局领导人)右倾路线，受王明排挤，6月份离开编辑岗位，以战地记者身份去江西采访。

由汉口抵南昌后，住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认识了当时主持分局工作的曾山、黄道以及朱镜我、薛尚实、陈丕显、黄知真等同志。

其时，各方记者云集，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等都在南



昌。石经常与长江、秋江等在夏征农、孙席珍住处纵谈国事。在南昌东湖边还一起与蒋经国作过一次长谈。

7月，随记者群到九江采访。时九江最高指挥官为张发奎。前线无大战事，几个记者闲闷无事，相约上庐山。在牯岭度过“七七”周年。未几，九江陷落。

在南昌时，曾出席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记者招待会。在赣北战场，又和其他记者一起采访了薛岳、吴奇伟、李汉魂、王耀武、冷欣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一时期写作的战地通讯，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刊出的有：《熊式辉之言——江西省的动员民众办法》（7月31日）、《记九江姑塘战事》（8月7日）、《赣北战地见闻》（9月14日）、《战地访问李汉魂将军》（10月4日）、《大战火烧山》（10月5日）、《庐山脚下游击战》（10月11日）、《金轮峰歼敌记》（10月14日）等。这些通讯，对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有表扬和鼓励，也有善意的批评，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报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读者中留下强烈印象。

11月，离南昌，去皖南新四军采访。

由南昌先到金华，暂停，住友人骆耕漠、邵荃麟主编的《东南战线》编辑部。其时，金华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曾应邀与省主席黄绍竑谈话。金华为少年时代读小学的地方，此次重来，已相距14年矣。

由金华搭新四军军车，到皖南岩寺。改步行，经黄山脚下，沿青弋江向泾县。同行有黄源、邵荃麟等。经过长途跋涉，于12月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村。

¹1939年 27岁

1月，接受新四军军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建议，筹组并主



持出版《抗敌报》(编辑数期后,因去前方,未再过问)。

2月,在云岭章家渡,参加欢迎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军长大会。会后,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周指示:早点到前方去,多向大后方读者报道新四军战斗和工作情况,特别是江南敌后的斗争情况,以鼓舞大后方人民,提高胜利信心。

2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出石西民到皖南后采写的通讯:《一年来的新四军》。3月3日,又刊出《江南游击区横断面》。

3月初,根据周恩来同志建议,动身去苏南陈毅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采访,与在一支队从事宣传工作的徐平羽同行。

在一支队司令部,访问了陈毅同志,畅谈达3小时。又陪陈毅去东坝,拜访新到任不久的国民党行署主任冷欣。经过多方面接触,对陈毅有了较深入了解,撰成《陈毅将军访问记》一文(载本年4月5、6日《新华日报》)。

为了报道江南敌后斗争,掌握第一手材料,曾随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一支部队,夜袭日寇据点。又夜过三条封锁线,到丹阳访仙桥,访问管文蔚同志。采访后,写成通讯《越过江南敌人封锁线》(刊于本年6月出版的《群众》周刊3卷4期)和《地方游击队是怎样产生的——记丹阳游击队》(载8月20、21日《新华日报》)。石西民是抗战开始后第一个深入江南敌后采访的战地记者,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读者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英勇事迹,以铁的事实回击了国民党散布的“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新四军的半年多时间中,还发起出版《新四军一日》。



为培养新闻工作干部，又在新四军教导队创办新闻训练班，亲自为学员授课。

7月接新华日报社来电，催促返渝。月底动身，经金华、赣州、吉安、衡阳、抵桂林稍作逗留。在桂林，参加国际新闻社。

8月，受李克农委托，押运六辆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卡车，由桂林去重庆。翦伯赞夫妇同行。

9月初，到达重庆，住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任新华日报编委、编辑部主任。

1940年 28岁

本年，继续负责新华日报夜班编辑工作。国民党政府对新华日报的压迫日益加剧。上年10月19日，因“违检”刊登毛泽东同志的《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被强令停刊一天。本年5月13日，又因在一条报道河北灾情的消息前，加上《衮衮诸公竟坐视》三栏大标题，再次被勒令停刊一天。

11月，为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撰写《战时粮荒问题的关键》一文，在“送检”时为国民党审查机关扣发。“免于刊登”的理由，是所谓“过于暴露我政治上之弱点”和“有碍军誉”云云。

从本年起，一面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一面继续致力于以日本问题为重点的国际问题研究。本年在《新华日报》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清算一年来的日寇》（1月1日）、《悲惨的日本劳动者》（2月29日）、《论米内内阁》（3月25、26日）、《黯淡的近卫内阁》（12月28日）等。

1941年 29岁



1月11日，在新华日报社职工纪念创刊三周年的集会上，周恩来同志宣布“皖南事变”发生。12日，《新华日报》透露了这一消息，举世震惊。18日，刊出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报社实行大疏散，仅留下80人坚持作最后斗争。石西民为其中之一。

在1月30日《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新诗《赠别》。

本年继续在《新华日报》发表的国际问题论文有：《近卫内阁改组的意义》（5月27日）、《为美国借箸一筹》（9月21日）、《由近卫到东条》（10月19日）、《日寇所谓“临战体制”》（11月23日）等。

1942年 30岁

从本年初至9月，参加新华日报整风改版工作。5月28日，报纸发表社论，公开征求批评意见。5月24日，又以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特别启事》。经过整风改版后之《新华日报》，面目一新，受到读者好评。

1943年 31岁

本年，在《群众》杂志发表政论两篇：《日汪关系演变的新阶段》（8卷6—7期）、《法西斯荒谬的国家理论》（8卷1期）。为《新华日报》撰写的论文有：《论慎独》（5月29日）《人类命运之键——纪念罗邱联合宣言三周年》（8月14日）、《爱祖国》（10月3日）、《清朝文化思想统治兼记明末清初几个有操守的学人》（12月31日）。此外，还经常针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为《新华日报》撰写短评、社论。

1945年 33岁



改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和报社同志一起通过各种方式，在重庆新闻界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记者，在国民党统治区逐步形成一个广阔而纵深的舆论阵地。

8月，毛泽东同志飞临重庆谈判。28日中午，石西民驱车接郭沫若夫妇、《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和贵阳《大刚报》副总编辑王淮冰等去九龙坡机场，迎接毛泽东同志，并协助各报记者顺利完成这一重大采访任务。

1946年 34岁

2月，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在2月11日《新华日报》上迅速发表报道《较场口事件目击记》，揭露事件真相。同时申连重庆各家报纸的42名外勤记者，联名发表《给中央社的公开信》，驳斥中央社对事实真相的歪曲。

3月，随周恩来同志去北平、采访军调处活动。

4月，奉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之命，与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龙飞虎等同志一起飞赴南京，负责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经数月奔走，冲破重重障碍，在中山路260号成立了筹备处，后因国民党政府拒发登记许可证，未能出版。

从7月至10月，与新华日报鲁明同志合用“怀南”笔名，在《群众》周刊(11卷10期—12卷9期)连续发表《南京通讯》和《南京一周》。此外，还以“明石”为笔名，为重庆《新华日报》撰写《时局的激流》(8月19日)、《“拖”“骗”已到尾声了》(9月9日)、《南京之秋》(9月28日)、《和平——已经死了》(10月18日)等通讯，完整地记录了国共谈判时的一部分珍贵资料。

9月，周恩来同志在上海约见，告以中共代表团和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的同志撤回延安的决定。



10月，随中共代表团部分同志由南京飞回延安。同机有范长江、龙飞虎等同志。

抵延安后，任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社委兼副总编辑。

1947年 35岁

本年春，胡宗南军进犯延安。石西民随新华社总社撤往晋冀鲁豫边区河北省涉县，继续工作。

1948年 36岁

毛主席由延安到河北平山县，党中央迁至平山县西柏坡村。5月，新华社总社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编辑部，由石西民、梅益等率领，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西戌迁至西柏坡村党中央驻地，在中央负责同志直接领导下，日夜紧张工作。

1949年 37岁

4月23日南京解放。翌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准备南下工作的党内外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范长江、石西民等参加。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把具有光荣历史的两张党报的命名《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放在上海、南京。并宣布范长江去上海筹建《解放日报》、石西民去南京筹建《新华日报》。

4月25日卸命南下，26日抵达南京。27日起，以军代表身份负责接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及中央广播电台。在地下党员和广大职工协助下，接收工作顺利完成。

4月29日，南京《新华日报》创刊。石为该报首任社长。新华社南京分社同时成立，石兼任社长。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立后，又兼任该台台长。

5月，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

6—9月、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南京分社联合创办新闻



训练班，招收学员369人。石兼任班主任，并亲自授课。这批学员毕业后，大部分随二野进军西南，逐步成长为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

1950年 38岁

本年起，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3月，出席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全军新闻工作会议，发表讲话《关于新闻写作问题》。这是一篇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探索党报新闻写作规律和文风问题的重要著作，在南京《新华日报》发表后受到新闻界普遍注意。

7月8日，以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身份，出席《南京人报》复刊周年纪念会。

7月16日，在新华日报社组织的“新华之友会”，作专题演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1月26日，在《新华日报》“时事一周”（第3期）发表时事论文：《反驳几种有害观点》。

12月30日，出席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及通讯员新年联欢会，号召党报通讯员成为新经验、新创造的传播者。

1951年 39岁

《毛泽东选集》出版。11月20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学习笔记》。

1952年 40岁

10月，南京市和苏北、苏南合并，成立江苏省。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兼任江苏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 42岁

2月，调往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1955年 43岁

5月，调上海，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 常委 兼宣传部长、市委书记、中共华东局委员兼宣传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6年 44岁

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出版工作会议，石西民作总结发言。通过会议明确了出版社的方针和专业范围，提出了改善党对出版事业的具体办法。

5月9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举行十六次系列时事报告会，石西民作首场报告，题为《为争取和平方法解放台湾而努力》。

5月24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上海市委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文。

7月7日，在上海市政协召开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关于“百家争鸣”问题的讲话。

7月11—25日，在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和出席党的八大代表。

7月下旬—8月下旬，参加上海市委宣传部就报纸、出版工作贯彻双百方针问题举行的座谈会。

9月15—27日，赴京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返沪后写了3篇阐发党的八大方针、政策的文章，发表于《解放日报》。

1957年 45岁

2月，参加上海新闻界座谈会并发言。

11月，参加以刘宁一为团长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访问苏联。

本年，毛主席接受舒新城先生建议，把修订《辞海》的任



务交给上海，由石西民直接领导此项工作。他顶住“左”的思潮，提出撰写释文的三原则，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动员了全国数千名专家学者参加这一工作。

本年，主持创办了上海舞蹈学校、电影专科学校等艺术院校，并大力支持上海戏曲学校的发展。此后这些学校为上海和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不少人后来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家。

1958年 46岁

从1957年下半年至本年上半年，在“反右斗争”中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批党内外知识分子。如复旦大学，按比例要划一批，石听了十分着急，向市委第一书记提意见，结果少划了一大半。上海美协对刘海粟、吴海帆是否划为“右派”意见分歧，石亲自参加美协党组会议，对刘的问题说：“艺术上的问题可以允许有不同见解。刘海粟不喜欢苏联的绘画风格，不等于就是反苏嘛！”一席话说服了大家，一致同意不给刘、吴戴“右派”帽子（刘海粟后被江苏错划“右派”）。他极力想保护著名翻译家傅雷“过关”，曾请傅的挚友楼适夷、柯灵等劝说傅雷，只要在检讨中承认错误，即可免戴帽子，结果为傅雷谢绝。直至晚年，石每提及此事，仍深感内疚，说：“我后来才懂得，知识分子没有廉价的检讨！”

6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经济研究所在沪联合召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理论讨论会”，理论工作者245人参加。周扬代表中宣部出席，石在会上作了发言。

6月25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市委、中央宣传部作《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在石主



持下写成。

10月，参观上海庆祝建国十周年美展后，建议上海博物馆精选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收藏。在石支持下，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画集》、《永乐宫壁画集》等，在国内外影响颇大。

10月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岁！》一文。

10月17日，《上海新儿歌选》出版，石为此书作序。

12月，中苏友协上海分会举行代表会，石当选为会长。并任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1960年 48岁

2月，上海市委召开宣传、文教工作会议，石在会上作题为《宣传、文教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结束时并作总结发言。

10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石组织了一批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分组学习，定题撰写文章。

1961年 49岁

10月，随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1962年 50岁

3月31日，根据石西民的提议，上海市委宣传部检查了大跃进以来宣传、文化工作中若干不确切和片面性的口号。

11月，率团访问日本，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和平大会”，林丽蕴同志等同行。

1963年 51岁

3月18日，上海市委思想工作会议开幕，石在会上作报



告。

1964年 52岁

2月6日—11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举行扩大会议，石出席讲话，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学风。

1965年 53岁

2月，调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4月，石西民领导修订的《辞海》(未定本)三大册完成，在内部发行。此书费时8载，工程浩大，名为修订，实为重编，为以后《辞海》的正式出版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6年 54岁

4月，代表文化部向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做工作汇报。翌日消息见报后，康生从钓鱼台打来电话申斥，并勒令做书面检讨。石如坠五里雾中，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不能不表示检讨。

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在北京被批斗，后又被绑架到上海“游斗”。

1967年 55岁

7月，第二次被“揪”回上海批斗，同曹荻秋等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关押在一起。

1968年 56岁

2月被押回北京。此后，被非法囚禁达七年零两个月，身心遭受极大摧残。

1975年 63岁

5月，获释回家。在家深居简出(后住院治疗)，对外界情况极为隔膜。



10月，任国家出版局局长，致力《鲁迅书信集》的编纂出版以及《鲁迅全集》的校订和出版工作。

1976年 64岁

身体日趋衰弱，住院治疗疗养。

1979年 67岁

10月20日，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忆荻秋同志》一文

1980年 68岁

年初，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分管科学研究规划局、文学研究所、新闻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又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聘，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4月9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对刘少奇同志的怀念》一文。

5月，由京去成都，赴乐山沙湾谒郭沫若故居。

6月，抵重庆，凭吊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旧址，对建立红岩纪念馆等事，提出许多具体建议。此外，还在当地同志协助下，召开座谈会，会见新闻界旧友。此行对推动新华日报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又积极推动有关方面，为一部分蒙冤多年的新华日报老同志（包括当年报童），平反昭雪，落实政策。

7月，由渝乘船东下，参观葛洲坝、武钢等现代化建设，由武汉飞返北京。

8月2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悼念人民的新闻战士浦熙修》一文。

1981年 69岁

自3月份起，以较多的精力分管郭沫若著作编委会的工



作。

3月9日，在南京《新华日报》发表《政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生命线——学习《周恩来选集》上卷的一点体会》。

5月24日，在《浙江日报》发表《寄语故乡》，呼吁重视对地方志的编写工作。

11月2日至19日，率第三批学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创价学会负责人池田大作等人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被授予创价大学名誉教授。在上智大学作《中国农村当前所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演讲。听众反响热烈。

12月6日，郭著编委会召开第二次委员会会议。周扬主任宣布石西民为编委会副主任。石在会上作工作汇报。

1982年 70岁

4月20—23日，回浙江浦江县探亲，看望离别数十年的家乡父老，并特地去母校严州中学看望全体师生，受到热烈欢迎。返京后作《乡情》诗二首。

6月，在《江海学刊》第3期发表《学者与战士——回忆潘梓年同志》。

7月，专程去大连，拜访郭沫若同志的日裔夫人郭安娜（佐藤安娜寓子）。返京后，向中央书面汇报，提出了有关建议。

10月，郭著编委会召开部分委员会议，周扬主持，石西民作工作汇报。会议着重讨论了郭沫若故居筹备事宜。

11月16日，郭沫若诞辰90周年。郭沫若故居举行揭幕仪式，石西民主持，方毅揭幕。同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纪念座谈会，石参加会议。



《郭沫若全集》开始出版。石负责文学编和历史编的终审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上海《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纪念郭老，学习郭老——郭老诞辰90周年感怀》一文。

12月，在北京竹园宾馆宴请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井上靖。本月，还前往广州参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文艺论著部分的编辑注释会议。12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郭老与〈十批判书〉》。此文引起文化新闻界瞩目。羊城晚报于12月12日发表《郭沫若等怎样评价孔子》和《给孔子平反好》两文，予以响应。

本年底，撰成《忆〈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华岗同志》，刊于1983年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1983年 71岁

2月，由石西民、范剑涯编辑的《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出版。

4月，在京主持《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创刊45周年纪念活动。会后成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石当选为副会长。

5月23—27日，在京主持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作了题为《学习郭沫若，研究郭沫若》的报告。会上成立了“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石当选为副会长。在石倡导下，该会编辑出版了《郭沫若研究》丛刊。

6月，率中国记协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回国后，撰文三篇介绍此行观感，刊于上海《解放日报》。

8月，北京酷热，去银川小住。

9月，赴无锡参加“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作题为《孙



治方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面镜子》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无锡会毕，与陶白夫妇重访泾县云岭，参观新四军军部旧址。外出一月始返京。

11月，《红旗》刊出石的论文《党报史上的光辉一页——纪念新华日报创刊45周年》。

1984年 72岁

1—5月，在京编自选集《时代鸿爪》。因贫血住医院10余天。

3月，抱病主持“郭沫若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讨论会开幕式。

6月，去陕西，重访延安。和夫人吴伟，爬上延安清凉山，看了他们过去在此工作过的新华社总社和解放日报社办公和居住过的窑洞。窑洞依旧，但祖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诗《重上清凉山》一首。以感怀。

7月，在京出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自传部分编辑注释会议。

本年夏，发表《毛泽东同志与新华日报》和《增强党性，深入群众——学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两文。均刊于1984年《新闻业务》第2期。

10月，去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在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又去金华、衢州等地，出席邵飘萍、史量才纪念会，并参加《金华日报》创刊35周年纪念活动。11月下旬返京。

撰成《学习恽逸群同志》一文，发表于《新闻业务》第7期。

上年曾为安庆陈独秀修墓事上书，本年成为事实。

1985年 73岁



6月4日，赴南京参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言：《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响导》。

6月25日，再次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

由石西民终审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于6月全部出版。

7月，自选集《时代鸿爪》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收近60年作品102篇，包括：经济研究、新闻通讯、日本研究、专论杂文、政论回忆和新闻研究等内容。林放(赵超构)为本书作序，题为《应似飞鸿踏雪泥》。

8月，在京接见并宴请日本亚非文化财团理事长、亚非语学院院长、建设郭沫若文库委员会理事长菊地三郎。

8月20日，出席首都新闻界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40周年集会，在会上发言。

8月28日，在京参加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

9月底，去重庆，参加纪念抗日胜利40周年的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作大会发言。

10月13—18日，由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中国文联等发起召开的“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在石西民主持下于重庆举行。石致开幕词：《总结历史经验，深化郭沫若研究》。会后去贵阳参观访问。

11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悼念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女士的文章。

1986年 74岁



3月2日，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忆刘述周同志》一文。

5月10日—14日，赴沪参加“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发表题为《文化发展首先要研究新思潮》的讲话。

7月，为重庆出版社出版《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一书作序。

9月15日，被聘为华岗研究学会顾问。

11月，在石西民与日本亚非文化财团理事长菊地三郎反复洽谈的基础上，决定组成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研究学者代表团访问日本，调查研究“沫若文库”的资料。原定石西民为代表团团长，后因病未能成行。

1987年 75岁

1月，由石西民终审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出至第10卷。

身体极度衰弱，渐成不治之症。2月，赋诗一首：“去年春节尚临诗，今岁筵前谢酒卮；老病已枯忧国泪，韩非朱子不能师。”此诗竟成绝唱。

3月，任中国社科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新闻学重点项目评议小组组长。

4月，将自藏近3000册各类书籍，赠送故乡浙江浦江县图书馆，供老家青年和爱好者阅读。为此特函中共浦江县县委书记赵毅通，表达自己的心意。

5月，被聘为中国社科院第三届学位委员会委员。

7月，被聘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委、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

10月17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11月1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李鹏、胡启立、姚依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宋平、习仲勋、陈丕显、彭冲等700余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石西民传》写作组）



后 记

本书书名为《报人生活杂忆》，实际上是一位老报人以回忆录形式写成的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

石西民同志自1936年在上海投身新闻界，至50年代初，辞去南京《新华日报》社长职务，直接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长达15年。以后，他虽然离开新闻岗位，但始终关怀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并长期与共同战斗过的新闻界朋友们息息相通，保持密切联系。到了晚年，他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并被推举担任《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副会长。积极参加、热情推动革命报刊史和新闻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诚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一生中，与新闻工作可算是有缘的。”

作为一代名记者，他曾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通讯和评论。作为一名报纸工作的“多面手”和党报领导人，他既有采编工作的经验，又有领导党报的经验；既有长期在国统区办报的经验，又有在解放区从事报纸和通讯社工作的经验。从30年代至50年代，阅历像他这样波澜壮阔的老报人，在我国近代报刊史上，特别是党报史上，是为数不多的。

西民同志早年撰写的有代表性的通讯和评论，大都已选收进他生前手订的文集《时代鸿爪》中（已出版）。收入本书的文章，大都是他晚年撰写、散见于各种报刊的作品。内容可分



为三类：一类是他个人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录（可惜只写到1947年）；一类是忆述武汉和重庆时期《新华日报》战斗历程的文章；再一类是对新闻界前辈人物和亲密战友的悼念性文字。晚年，作者通过这些深情的回顾，总结自己在党的新闻战线上所走过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既有真情，又具实感，可谓虚实结合，情文并茂。

为有助于对作者生平的了解和研究，我们把《石西民诗抄》和《石西民年表》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中，供读者参阅。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目前活跃在新闻战线的年轻同志们，提供一些前人的宝贵经验；对从事新闻理论和报刊史研究的同志，提供一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愿，编选这本集子的。我们认为，这一愿望如能实现，就是对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最好纪念。

在编选中有不当之处，请西民同志的生前战友和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姚北桦 王淮冰

1989年3月于南京